

## 苏共二十大日记

[意]维托里奥·维达利著

黄雪辉译

田雨光校

《苏共二十大日记》，系从维托里奥·维达利的遗作《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的英译本中摘译的。此书意大利原文本于一九七四年问世，一九八四年又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苏共二十大日记，第二部分为莫斯科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日记。

维达利(1900—1983年)系有一定影响的意大利政治活动家。一九二一年加入意共。一九二三年因受迫害流亡国外，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从事政治活动，并多次遭到逮捕和驱逐。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曾受共产国际派遣赴墨西哥和西班牙工作。西班牙内战时期，积极参加国际纵队的组织工作，是马德里保卫战的指挥者之一。战后，担任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的书记。一九五六年六月，该党并入意共后，改任意共在该地区的省委书记，并担任意共中央委员。此外，曾几度当选为意大利众议院议员。

这里选登的日记，如实地记述了作者赴莫斯科参加

两次会议的亲身经历，记载了他在会议期间耳闻目睹的事实以及与会者的表现和反应，也描绘了他本人当时的处境、心情和感受。他对赫鲁晓夫背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感到愤愤不平。他预见到，这种做法将使敌人感到解恨，而在国际共运中则将引起重重疑虑、激烈舌战和弃党叛离。

今年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三十周年，也是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二十九周年，我们选登这两篇日记，供读者参考。

## 苏共二十大日记

### 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

今天就要动身了，我觉得心神不定。昨晚，我彻夜未眠，心里在想自己是否一定要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到那里去势必要应付许多事情：重新考察各种见解，碰上不友好的面孔，回答令人难堪的问题，消除各种怀疑。我想，自己不愿意去是这种内在危机造成的。这种危机在我内心里蔓延着，象影子一样跟随着我。

握手道别之后，我们就迎着暴风雪出发了。我们不得不两次停下汽车，因为防滑的铁链子不是由于没有捆紧就是由于太旧而断开了。

我们来到了乌迪内。火车要晚点近两个小时。我们必须耐心等待。车站里冷冰冰的。谁也说不上火车究竟什么时候才来。

火车终于来了。在因电灯损坏而陷于一片漆黑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我找到了斯科奇马罗和来自热那亚党组织的领导人布格利阿尼。

## 二月十日

因为天冷，我睡得很不好。通宵达旦地下雪，而且雪花仍飘落在洁白的田野上。我们来到了塞莫林山口。这里以前是苏联的检查站，而现在已经放弃不用了。

火车没有继续晚点，我们于清晨抵达维也纳。对于我们这些来自的里雅斯特的人来说，维也纳是亲切迷人的。

晚上，我们前往拉纳赫剧场。这是一座陈旧的并且以表演杂耍和发表评论而闻名的剧场。我同那些也在这里消遣的观众在一起过得十分愉快。反对苏联和反对英美的各种笑话激起阵阵的欢笑，这是维也纳人在对现在已经结束的外国占领进行报复。

## 二月十一日

我们四点钟起床，匆匆忙忙地吃过早饭便到机场去了。

我们乘飞机在三千米高的白色云海上面平稳地飞越喀尔巴阡山山脉，并于吃午饭的时间飞抵利沃夫。

我见到了国际旅行社派来的人，但她甚至都没有表示要领我们在这个机场里转一转。这个机场的建筑风格已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批评。她也许为此而感到羞愧。昨天，这些建筑还是光彩的，而今天却成了丢人的了。这类情况经常发生：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态就足于使某些东西失去存在的资格。尽管开展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还是有这种情况。

接着，我们经过基辅，最后到达莫斯科。我们原来认识的翻译 S 和 G 在那里迎候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有政治官员 D 以及据说是负责意大利问题的 S。最后提到的这个人显然并不喜欢我。也许，他还记得我对苏联的代表去年五月前往贝尔格莱德的态度。然而，他还是尽量显得彬彬有礼。他还告诉我，米高扬在南斯拉夫并且由于他们在萨格勒布博览会上拿掉斯大林撰写的所有东西而

向他们提出了抗议。不过，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现在一切又一帆风顺了，关系也还会不断改善。我默不作声，听任他讲下去。斯科奇马罗和布格利阿尼坐在车里，也都一声不吭。我们朝着离机场三十公里的莫斯科疾驰，沿着大雪覆盖的道路在树林中穿行。我们从灯火通明的高大建筑群附近驶过。我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我们沿着高尔基大街和列宁格勒大街向前行驶。我们要在苏维埃大饭店住下。

我的住房安排在四层楼上，陶里亚蒂也将住在这层楼上，不过，他是住在走廊的北头。这样，关照他的卫兵也就同样可以关照我。

天晓得我最初得到的印象为何这样使人感到不是滋味。我把这些想法撇到一边并且下楼到餐厅去。

餐厅里充满生气。它对公众开放，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在那里喝酒。其中，一些人已有三分醉意。这里所有出售的东西相当贵。这里有一支乐队，一位身穿白色服装的秀发姑娘正在唱着一首令人伤感的歌曲。我仔细端详着这些我以前来访时不曾见到过的顾客们，他们使我感到新奇。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寻欢作乐的欲望，一种寻求解脱和忘却的愿望。也许，这些都是因为我身体疲乏和神经过敏而得到的偶然印象。

## 二月十二日

昨晚，我睡得很香。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苏联的国歌把我唤醒——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忘记关掉收音机。

我们在红场上漫步，看了列宁陵墓。这是前来瞻仰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公民经常参拜的目标。列宁和斯大林紧挨着，列宁身穿俄式衬衫，而斯大林则身着制服。这是一种性格上……观点上的奇怪而鲜明的对照。这两具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都在灯光的照

射下，这场面与其说使人难忘，不如说使人感到阴森可怕。一九二七年，在安葬英国共产党书记阿瑟·麦克马纳斯以及在安葬美国共产党书记查尔斯·E. 鲁森伯格时，我曾拜谒过列宁。那时，这座陵墓是木质结构的。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愿意去拜谒这座陵墓了，我宁愿通过阅读列宁的书来瞻仰列宁。

下午，我们去迎接陶里亚蒂。他是乘火车来的，路上也受到许多耽搁。他应波兰党领导人的坚决请求在华沙作了停留。警察把莫斯科车站包围起来了，但我们还是可以进去，因为我们的翻译享有通行无阻的权利。陶里亚蒂来了，和他同行的是西西里地区党组织的助理书记布法利尼和坎帕尼亚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卡齐亚普奥蒂。车站上来了包括什维尔尼克在内的一大批苏联官员。我们亲切握手之后便返回饭店去了。

我们大家都聚集在陶里亚蒂的房间里吃东西并且进行一次内部交谈。他们曾想让陶里亚蒂单独住在一幢别墅里，但他拒绝了。他希望同我们住在一起。他知道，单独住到别墅去就等于完全被孤立起来，切断了同每个人的联系，而且还会受到严密的监视，以致连隔壁房间住的是什么人也不可能知道。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当时，他住在马内勒斯基<sup>①</sup>的房间附近长达一个月，但对此却一无所知。这里也是如此，他的房间守卫森严。整个饭店都被占领了。大批的警卫以及招待员和厨师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此时已是深更半夜。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积雪覆盖的庭院，积雪闪着亮光。风吹打着雪花，灯光也显得微弱。我想到守卫在走廊里的那批警察，想到他们在受冻以及他们脸上那种不可思议的表情，望着那空空荡荡的庭院，我脑海里闪出了坐牢的印象。实际上，我想起自己一九二二年一月的一个深夜在德国格里兹监狱

---

<sup>①</sup> 马内勒斯基(1883—1959)，曾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译注

的庭院里绕行的情景。那时的庭院、灯光和自己的心境仿佛同此时此地差不多。

代表大会后天就要举行了。谁都不谈论它，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大会的任何材料。只有斯科奇马罗紧锁着眉头，断定这次大会事关重大，将发生重大事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我认为他并不比我们和其他到这里来的人对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 二月十三日

陶里亚蒂在吃午饭的时候想拿一杯法国白兰地同我干杯。我不理解这次敬酒的原因，但他却兴致勃勃。赫鲁晓夫的助手和我们一起，他带着充满恶意的微笑告诉我，因为我是代表一个独立的政党参加这次大会的，所以我不能同意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坐在一起。南斯拉夫驻苏联的大使维迪奇也是作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察员出席这次大会。我没有作任何表示。讨论我将坐在哪里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会作出决定，而我是客人。我不了解他们会把我排到哪个座席上。

午饭后，陶里亚蒂请我们大家都到他的房间去。他建议把我包括在意大利代表团之中，并分头去访问党校和大学的学生。我和布法利尼一起被挑选去参观大学。S对此肯定不会高兴。我觉得，陶里亚蒂很理解我的处境，并且想帮助我摆脱。

开完会后，我单独出去散步。我注意到饭店被安全人员包围起来了，有时，我还发现自己随便走走也受到监视。这是为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不痛快吗？

餐厅里几乎是空空荡荡的。在大会期间，它只招待我们这些受到成群服务员包围的外国代表。乐队将为我们演奏，那位胖乎乎的小姐也将用她那刺耳的嗓音为我们演唱。这里没有集体欢庆的气氛。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事，我们在进出餐厅时相互打

打招呼,有时,甚至连招呼也不打。

我想到我们过去会面的情景。我们通常都要对最新事态发表议论,要讲讲历史事件中的一些插曲,要说说笑话,要唱唱歌。我们通常都要呆到深夜,然后才带着国际团结的感情上床睡觉。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了。

代表大会明天就要召开了。我们即将参加会议,但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了解赫鲁晓夫的报告要点,就象人们入学第一天的情景。我们并不比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了解更多的情况。也许不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尽管斯科奇马罗硬说会发生,硬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代表大会。

## 二月十四日

我们八点半钟就出发到克里姆林宫去,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在那里举行。组织和安全工作搞得非常高明,因此,任何人都未觉察到这件事。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向我们指路的交通民警。外国的代表们从一个入口处进入会场,俄国人走另外一个入口处,而苏联领导人则单独走一个入口处。在我们入场前,我注意到鲜艳的红旗挂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楼顶。列宁要求把红旗挂在那里,自那时候起,红旗就日夜在那里飘扬。在夜间,由探照灯把红旗照亮。对我来说,这历来是莫斯科最美的一幅图画。我想到这面鲜艳而光荣的旗帜是靠什么挂在这个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去的,这只是靠了数百年来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各民族都有男女老幼遭到关押、折磨和杀害,千百万人民作出了牺牲。

到进入会场的时间了。我寻找自己的座位,发现我坐在墨西哥代表的前面,紧挨着巴西代表团。当时我就明白:有人建议S一定要叫我在会议期间感到不痛快。他显然知道我过去是被墨西哥

共产党“赶出来”的<sup>①</sup>，因此指望墨西哥的代表们对我冷眼相待。我在墨西哥的时候，特别是在我被“赶出来”之后，一直到我离开墨西哥之前，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长年累月地大张旗鼓地诽谤我，在我的周围制造怀疑气氛，谴责我是个叛徒，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们甚至采用断绝政治交往的办法来对付我的妻子和朋友，甚至把其中的一些人看作是“人民之敌”而把他们开除出党。

因此，S 决定让我坐在墨西哥人的旁边，但这些墨西哥人一认出我就想用矫枉过正的办法来使我忘记过去，他们递给我太妃糖。

会议厅宽敞明亮，边上矗立着一尊列宁在发表演讲的塑像。我想找一张斯大林的肖像。人们在广场、商店和办公室里都可以看到他的肖像。令人奇怪的是，会场上连一张他的肖像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主席团的成员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入会场，每个人都起立鼓掌。我看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和其他一些人。总的来说，他们都已经上了年纪，看上去象是轮船遭大难后的幸存者。他们代表着在经历过如此之多的风暴之后仍然活着的人们。

我环视大厅，场面是感人的。我看到苏联的代表、元帅、将军和战斗英雄以及劳动英雄和那些曾在战争前线 and 工业战线上战斗过的男男女女。来宾和新闻记者 in 包厢和楼厅里就座，他们当然是同代表们分隔开的。

赫鲁晓夫宣布开会，并匆匆地提到不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的那些人，提到了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的名字。几秒钟的起立默哀。我们吃惊地相互看着对方。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奇怪的默哀仪式，进行得如此匆忙，简直就象他害怕这些死者或者说羞于

---

<sup>①</sup>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本文作者维达利曾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到墨西哥帮助墨西哥共产党开展活动。——译注



到他们一样。

接着，会议主席请赫鲁晓夫讲话，因此，他宣读了他的报告。我仔细端详着站在讲坛上的这个人：矮胖、秃顶，还有一双黑色发亮的小眼睛。直到不久以前，有谁知道他呢？他是个新出现的人物。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斯大林在世时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他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他那时谈到了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斯大林还向他的这位学生鼓了掌。事实上，正是斯大林发现了赫鲁晓夫，并且象慈父一样手把手地指导他进行一系列的工作，直到他成为党的书记。没有斯大林，赫鲁晓夫大概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

我一直用心听取这个语调单一而低沉的报告。他甚至一次也没有引用斯大林的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巴西人一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到那些自己认识的其他外国代表的意味深长的目光中显露出了某些疑虑。相反，苏联的代表们看起来是平静的，象是无动于衷。他们听这个报告，就仿佛他们是在上经济生产课一样。他们的脸上既没有激动的表情，也没有吃惊的神色。

两小时以后，我们得到了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于是，我们迅速涌向走廊，涌向楼上的小吃部。

会议继续举行。当主席团成员进入会场时，代表们按历来的习惯起立鼓掌。赫鲁晓夫在继续作报告之前呼吁代表们在领导人进入会场时不要再鼓掌。我觉得，这种做法倒有点蛊惑人心的味道。

这位报告人接着谈到了苏维埃的民主问题，谈到了尊重法制和公民权利的问题，也谈到了过去被“某个人”破坏的宪法问题。那个“某人”似乎在这个报告的结尾部分占了比较大的份量。斯大林或者说斯大林的身影似乎又出现在大厅里，我们好象都在怀念他。人人都感觉到这一点。我又奇怪又气愤：“他们为什么不点他的名

字呢？他们感到害怕吗？”这个“某人”就是斯大林，除了斯大林，不可能是别的人。坐在我旁边的巴西人向我担保说，这个人是贝利亚。

早在一九五三年的夏天，各国共产党就开展过反对个人崇拜和主张集体领导的运动。然而，那个时候，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针对刚刚被搞掉的贝利亚的。那个时期，我们引用斯大林的讲话和斯大林参加过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决定。那时，斯大林是作为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旗手出现的！坐在我旁边的人有某些理由认为，现在讲的是贝利亚的问题，不提斯大林的名字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这位报告人开始讲到他那个报告的中心内容。他继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句，并且提到“那个人”，但他的口气是尖刻的，在我看来，也是带着仇恨的。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

代表们起立、鼓掌，而我依然默默地坐着不动。我周围的人，甚至在整个报告过程中一直用墨镜遮住眼睛睡觉的那些人，都在热烈地鼓掌。

对于这个报告以及其中涉及到的新内容有种种评论。总的说来，代表们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那个表情迷人的冰岛人问我：“你听见了吗？你理解吗？那个‘某人’就是斯大林。还会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吗？”

我们回到饭店，我也有机会同陶里亚蒂交谈了几句。他的表情非常严肃，只用片言只语回答问题。他显然并不高兴。斯科奇马罗却喜形于色，因为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事态。我们每个人都不想多说话。我们脸上显露出担忧和不满的神色。

我再次见到走廊的尽头有些卫兵。当我走过通向一个大房间的半开半关的大门时，我看到地板上有一张画像，是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原来他——那个受指责的人现在就在这里。

**二月十五日**

我几乎夜不成眠。我感到口干舌燥，也许是身体在发烧。我起身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想一想昨天发生的事情。难道那些讲到“那个人”的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我相信有上千条理由认为，他们有责任，他们实际上是同伙，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为他们开脱。

我返回饭店去见自己的朋友。我们没有再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了，我们也不知道大会将如何继续开下去。然而，陶里亚蒂确实对我们说过，我们应该作为一个代表团开个会，我们可以在这次会上提出自己的问题。

我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在等待继续开会时，我们在挤满了人的走廊里来回踱步。

我环顾四周，看到许多元帅和将军。为什么在代表们中间没有二等兵、下士和中尉呢？这些军事领导人都在三五成群地进行热烈的议论。他们好象是在主持这次代表大会。

我们进入会议厅，当主席团出现时，我们大家都鼓掌，但无人起立。一切都是正常的。

讨论从一开始就是有趣的，但发言者都准备了书面讲稿。他们提到赫鲁晓夫的报告只是为了用开场白的方式表明他们完全赞同。他们的讲稿肯定是在大会开幕前的几天里写出来的。发言稿的宣读单调乏味，都是一些数字、对部长们的批评和对前景的展望。来自莫斯科、乌克兰、列宁格勒、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兹别克和斯塔夫罗波尔等地区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几乎没有人注意听这些发言。代表们不时地在喧哗，可以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坐在我周围的代表们在聊天，好象他们是坐在咖啡馆里一样。有两个姑娘在看书，有些人在挥笔写生。

接着，《真理报》主编、赫鲁晓夫的亲信谢皮洛夫开始发言。大多数发言者都没有重视政治问题，而他是阐述这些问题的寥寥无几的发言者之一。每个人都细心地听取谢皮洛夫的讲话。

接着，中国的代表带来了他们党的祝贺，他宣读了由毛签署的中央委员会的贺辞。贺辞讲到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导师，这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看来，这使主席团感到吃惊。显然，“那个人”仍然有一些影响。中国人所以讨人喜欢，正是因为他们历来心口如一。他们曾不止一次这样直言不讳而且还激怒过斯大林。他们总是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倾听善意的告诫，拒绝接受任何人的命令。朱德的讲话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点新鲜空气，因为他是以一个大党的声音讲话，这个党可以使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人得到许多教益。毛是英明的，也是胸怀坦荡和谦虚谨慎的。他具有列宁的许多品质。

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会场了。我们前往剧院观看乌兰诺娃主演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表演是精彩的。

吃晚饭的时候，陶里亚蒂兴高采烈。他告诉我，他收到了许多要阅读的材料。也许，这些材料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说明。

在我要返回自己的房间之前，陶里亚蒂要我替他给尼尔德<sup>①</sup>寄一封家信，因为他担心自己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他的信件有可能被拆看。我很高兴能替他办这件事，不过，我觉得值班的警察也在非常细心地盯着我。

## 二月十六日

代表大会的第四天。眼下，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七点钟起床；八点半吃早饭；参加大会并在会场呆到两点半；吃午饭并处理临时碰到的私事；四点半又去参加大会并在会场呆到七点半，接

<sup>①</sup> 即尼尔德·约蒂，陶里亚蒂的夫人。——译注

着，如果有我们过去没看过的演出，就到电影院或剧场去；回饭店吃晚饭；然后上床。我们同自己到会议厅时在路上见到的那些在街上漫步或者来去匆匆的人们没有接触。尽管我们很想同工人们交谈，但我们同工厂没有接触。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把满足我们的愿望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人们对这次大会的反应。

我们进入会议厅时，一个格鲁吉亚人正在发言。他说话模棱两可。他赞扬人们说过的一切，就象这一切都是出自万能的上帝之口。其他的代表接着发言，他们讲了自己所在城市的情况和自己的计划以及要求加强苏维埃制度的愿望。接着，米高扬走上讲台。我上次是在柏林见到他的。当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他在皮克主持的宴会上要求对代表大会作出评价，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他接着就发表了讲话，从而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既没有说几句鼓励的话，也没有发表一些称赞的评论，相反，他批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以及领导人。他说，这些领导人同人民没有接触，感觉迟钝，对德国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甚了了。宴会结束时，老同志皮克便起身皱着眉头走出去了。这次宴会是在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中结束的。米高扬离开时，他那张长着扁平鼻子的黝黑脸上则露出可掬的笑容。

米高扬宣读他的讲稿，有时还使听众觉得他是在发火。我环顾周围的代表们，看到苏联的代表中间有一个人，即使在我看他时，他也目不斜视地盯着我。他观察我多久了？为什么要盯着我？我每时每刻都注意到他在观察我。他是何许人？他想干什么？

米高扬的通篇发言都是对“某人”的指责。他终于在畅叙衷肠了。某个人的肆无忌惮的专制主义存在了二十年，但是，同样是米高扬这个人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过多么不同的讲话啊！在听米高扬发言的时候，我想起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离开的里

雅斯特之前，我刚刚重读过那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斯大林是共产主义的缔造者，斯大林是军队的领导者，斯大林是爱国战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集体农庄庄员，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是伟大的天才领袖，等等。“如果列宁今天能见到我们，他会多么高兴啊！”米高扬曾这样说过。

会间休息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代表发表讲话。苏斯洛夫在他们之后也发了言。自从我上次于一九四九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见到他以来，他已经变老了。当时，他和斯大林的心腹马林科夫在一起。他现在也在攻击那个“某人”，但他为什么不指名道姓呢？他攻击建筑师、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攻击宣传家还在讲述崩得分子和民粹派的陈年旧帐，攻击经济学家没有写出什么书，而且用恶劣的教条主义和书呆子的态度写东西，经常不断地引用“某人”的言论，巧妙地搬弄这些语录，等等。他们全都害怕面对现实，躲在往事的避难所里。他们靠各种语录，靠引用“某人”的言论过日子，这样就永远不会犯错误。

苏斯洛夫把赫鲁晓夫说成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一个运用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他对所有问题的解答都是正确的，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其他人似乎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在苏斯洛夫看来，全党已陷入官僚主义的泥坑。他还谈到各级委员会召开无数次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会议，干部都把时间消耗在公文上，阿塞拜疆一个集体农庄的党委书记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公文、图表和笔记本。赫鲁晓夫说过必须清除所有这些现象。赫鲁晓夫谴责了铁路运输的落后状况和对技术进步的必要性从不吭声的铁路工作人员。现在看来，思考一切并关心一切的是赫鲁晓夫了。

斯大林难道不也是这样开始的吗？他不就是这样变成某种神明的吗？是不是现在又在制造对赫鲁晓夫的崇拜呢？

我们就米高扬的讲话小心谨慎地交换了看法。我们大家都希望进一步澄清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走运的同志们在过去二十年里究竟在干什么呢？他们对一切全然不了解吗？他们是不是见证人呢？他们是主动的同伙还是被动的同伙呢？

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周围的那些人，或者那些党、警察、军队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了解一切，那些在国际组织中工作过的人，特别是基洛夫被暗杀之后在那些组织中工作过的人，也都了解大部分真相。

由于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很叫人伤脑筋，所以我觉得很累。米高扬的讲话使我清楚地看到，这里有一个逐步谴责斯大林的计划，调子一天比一天尖锐，指责的内容一天比一天具体。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对每件事都要表态，而他们却不这样做呢？这种做法的平等在哪里呢？

我顺着走廊来到那个本来是办公室而过去这几天已经腾出来的房间。我打开房门看看斯大林的画像是不是还挂在墙上。这张画像已经不在那里了，没有挂在墙上，也没有扔在地板上。

## 二月十七日

今天上午有许多人发言，但没有人提到“那个人”。我似乎觉得这个话题就讨论而言是“越轨”了。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在每个代表团内部还是提到这个问题。我注意观察来自卢森堡的那个同志的表情，他静静地同卢森堡共青团副主席坐在一起，这位副主席是同他形影不离的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看起来，他们两人都不关心代表大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荷兰来的同志及其亲属（都是党的干部）也是如此。我和陪同我的那个来自苏联共青团的同志聊了起来。

“那么，《联共(布)党史》看来也要消失了，”我对她说，“甚至连斯大林最后留下的论述苏联社会的经济问题的著作也要被清除了。图书馆将只收藏列宁逝世时已经入库的图书。那本论述政治经济问题的著作并不重要。要让你们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摆脱胆小怕事的心理(我避免用‘恐惧’这个词)，还需要时间。”

她带着迷惑不解的表情看着我，没有作出回答。我继续逼她，但无济于事。显然，那些陪同我们的人已经领受过特别的指示，不准议论任何事情。陪同我的这个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显然，如果明天再去打听斯大林的著作或者经过斯大林批准的任何东西，就会被看作是邪门歪道，无非是想要为这位老格鲁吉亚人唱赞歌。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的那本最新出版的著作被捧上了天，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定论，而如今，该著作不过是离经叛道的东西。

大会主席宣布多列士讲话。他缓步走到麦克风前，手里拄着拐杖。他的声音坚定有力，我也喜欢他那流畅的法语。他阐述了法国的形势和法国共产党的政策。他几乎是以一种挑战的口吻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代表们因此突然长时间地鼓起掌来。当他结束讲话时，他们跳上座椅，继续鼓掌，直到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除了毛的贺辞外，多列士是唯一提到这位老人名字的人。今天，这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信号，它使我感到高兴，尽管我对斯大林的敬重一天比一天削减。

又有一些苏联代表发言。最后，陶里亚蒂走向讲台。直到今天早晨三点钟，他还一直在撰写讲稿和核对译文。我怀疑他不信任翻译，当他开始用俄语讲话时，我对此更确信无疑了。陶里亚蒂一向是用意大利语讲话的。人们对他用俄语讲话兴趣盎然。他讲得很慢，声音清楚，他还不时地望望听众。



这篇讲话是全面的，观点鲜明，文字精练。我注视着赫鲁晓夫，他在全神贯注地听讲，但看起来并不热情。陶里亚蒂在他看来显然是个令人扫兴的人，因为他正在讲述的问题，赫鲁晓夫已经作为自己为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的贡献向我们讲过了。

当陶里亚蒂结束讲话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鼓起掌来。

在走廊上，所有的代表都在谈论陶里亚蒂，其中有些人走到我们的跟前，向我们打听是否有可能同他会晤并向他请教。我的那位将军朋友说：“我认为，陶里亚蒂是目前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的理论家。”

一位名叫苏尔科夫的作家在午饭休会前作了发言，他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来。

今天，契尔文科夫<sup>①</sup>和拉科西也讲了话，会议在马林科夫发言之后便结束了。马林科夫也讲到了党内生活存在的严重的不正常现象，讲到了个人崇拜和各种错误等等。但是，他当时跑到哪里去了？他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也是贝利亚的至交。

他的肖像仍然到处可见，他现在也肯定希望成为新的“人物”。也许，斯大林的肖像从那儿消失，他的肖像也会从那儿消失。我的老朋友告诉我，许多人已经要求免去马林科夫的职务。那么，其他人怎么办呢？要承担责任和分担责任的还有许多人。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历来都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的。他们这样对待斯大林长达三十年之久，从而使斯大林独揽了政治、经济和内外事务的大权。不过，他们是直接的同伙，他们也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的同志消失的情况，并且为这种镇压叫好，还写文章为一切开脱。说他们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工具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同伙。我注视着他们

<sup>①</sup> 契尔文科夫系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代表。——译注

那苍白的脸、故作镇静的微笑和失神的目光。这些人过去是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同时也是个人崇拜的牺牲品，而现在，他们是一些跳梁小丑。

在上床休息之前，我想出去散散步。明月当空，我看到了猎户座，一个使我心旷神怡的星座。我走在积雪的大街上，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我什么也不去想，只是在欣赏那皎洁的夜空和回忆自己有一次在同样的夜晚在挪威海面上见到北极光的情景。我对那耀眼的和色彩不断变幻的弧光总有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记忆，这是一幅可以透过它看到星星闪烁的晶莹幕帐，它垂落在大海的边沿上。当时，我正乘坐一艘苏联轮船从墨西哥返回苏联，这艘船由地处热带的墨西哥港启航，最后把我带到摩尔曼斯克。

现在该上床休息了，我要设法忘掉这次代表大会，忘掉我是住在这个房间里，忘掉门外有昏昏欲睡的警察，还有窗下那个使我想起格里兹监狱的积雪庭院。

## 二月十八日

今天风和日丽，仿佛同春天一般。在闪闪发光的雪地上行走使人感到舒坦。空气清新。大街似乎也变得更加亲切，一些住家的窗户已经打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顾寒冷的轻率举动，而这种寒冷在未来的几天里将让人们感受到。克里姆林宫光彩夺目，会议厅沐浴在阳光下。

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讲了话，来自北朝鲜的代表也在其后讲了话。接着，莫洛托夫发言。他脸色苍白，身穿黑色西装，系着黑领带。他看上去真象是一具已经复活的尸体。他目睹过多少重要事件啊！代表们对他相敬如宾。他从容不迫地讲话，也没有提到“那个人”。他至少在这里是尊敬这位死者的。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妻子被捕时，曾把莫洛托夫软禁起来。他为了继续担任外交部长，不

得不设法同妻子离婚。

在其他几个人发言之后，轮到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发言。我觉得他是真正的首脑，他解决了由于斯大林的逝世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的简短发言得到了听众的注意。他没有点斯大林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大名鼎鼎的“那个人”。

在会间休息时，我递交了贺辞。贺辞写得很短，什么也没说。我相信，这份贺辞会比所有在大会上宣读的贺辞都要短。倒不是因为我不想多说几句，只是因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写不出更多话语来。在写这份贺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不管用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手也不灵活了。我对此毫无办法。我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多年未见面的年老的库西宁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他该有七十岁了。他过去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见到他使我想起了所有自己在他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时认识的那些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和遭到逮捕的人都被判了罪，而且现在都死了。每当我路过当年共产国际总部的那座建筑时，我就觉得那是所有这些死者的灵魂栖身的巨大陵墓。

越南人向代表大会致贺。当越南人以清晰宏亮的声音讲话的时候，人们产生了一种伴随着军乐队前进的感觉。他们是一个年轻国家的人民派出的年轻代表，充满朝气。即使在走廊上或者在供应茶点的柜台旁，他们也是所有代表中最快活和落落大方的人。这是革命的开端，官僚主义日后才出现。

接着，卡冈诺维奇发言。他是一个口才出众的演说家，但我无法再听他的讲话，因为时间很晚，我也累了。

最后，当我们正要离开会场时，会议主席宣布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已经发来了一份重要贺辞。每个人都细心地听着，但没有鼓掌。南斯拉夫大使维迪奇坐在楼上的某个地方。赫鲁晓夫感

到十分高兴，因为维迪奇曾对他的报告表示祝贺，并且对他说过，如果他维迪奇不是大使，他就会加入苏联共产党。

铁托的贺辞宣读完了，我们大家都起立，甚至我也这样做，尽管对我来说，这是费力的。他们为这份贺辞鼓了掌。我觉得，赫鲁晓夫正在用他那双长在大脸盘上的黑色小眼睛看着我，那张脸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苍白。

## 二月十九日

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也不举行大会，但我还是一清早就起床。知道今天是星期天，我难得有这么高兴过。一般地说，我并不喜欢星期天，而是盼着星期一。电台一开始播音，我就再收听一次铁托的贺信。这封贺信确实是重要的。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同意逐步消除障碍，正如S对我说的，他们这方面也相信有可能达到完全的谅解。急于求成既无济于事，也毫无必要，而且他也有自己的难题。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象一直是朋友那样进行工作，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对全部情况想得越多，就越认识到苏联同志要负很大的责任：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文件是侮辱性的，也是挑衅性和蛮横的。一九四八年的决议即使有几分道理也是打在人家脸上的一记残忍的耳光，任何人都会受不了。一九四九年的决议完全是诽谤性的。经济和军事封锁是犯罪行为。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是毫无道理的。诽谤运动是无耻的。

就我自己而言，我深信南斯拉夫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对的，他们起来反抗也是做得对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有可能遭到杀害。

吃早饭后，我们同陶里亚蒂一起开了会。我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向陶里亚蒂提出问题。我们一致同意要求会晤

赫鲁晓夫，以便提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它现在是一个不再运转的机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机构。它只是一个充斥着无用的工作人员的官僚机构。它每周出版一期的《争取持久和平》……象铅块一样重，而且也没人阅读，纯粹是浪费金钱。所有这些情况必须加以改变，陶里亚蒂和斯科奇马罗将沿着这些思路发表讲话。

陶里亚蒂已经看过苏联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最高级会议的记录。这份记录谈到的情况很少：斯大林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人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贤明的导师。大约从一九三四年以后，他想个人包办一切，这样，他的领导就成了片面的，也造成了一些危害。陶里亚蒂用了“专制”这个词，但他说他们并不想搞掉斯大林。赫鲁晓夫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说，他原来是一个党组织的普通书记，是斯大林把他提拔到现在这个岗位上的。他是斯大林的学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其他人也是斯大林的学生，也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的会议在一致同意不久再开一次会后便结束了。在离开之前，我走到陶里亚蒂的跟前说：“你是不是真的认为他们在斯大林的问题上会就此止步呢？他们不会再往前走下去吗？”

“是的，我认为不会。”他回答说。

我走了，但我并不相信。他们会象对待铁托那样对待斯大林。他们会不顾各种反应就各种问题作出自己的结论。但愿在我们离开苏联之前，他们会派人把我们叫去，让我们知道他们打算做些什么。

布法利尼、卡齐亚普奥蒂、布格利阿尼和我去参观大学。大概在一点钟的时候，我们仓促离开，赶去参加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款待外国代表的宴会。

我们首批到达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宽敞的圣乔治大厅。大餐桌上摆满了食品，在赫鲁晓夫等人入座后，我们便开始吃饭和喝酒。

我们意大利人的座位两边是来自印度支那的代表和朝鲜人。在宴会进行期间，表演了歌舞和杂技节目，小白桦舞蹈团也作了表演。赫鲁晓夫祝了酒，接着还有其他几个人祝酒。上次这种宴会有斯大林参加，每个代表团都上台祝酒，而这次宴会则是几个代表团推选一人祝酒。过了一会儿，苏联领导人走了。

我们对宴会已经结束感到高兴。除了象陶里亚蒂和多列士这样一些领导人以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接近苏联的代表，更不用说有可能同他们讨论问题了。

吃晚饭时，我见到一位头发灰白的妇女，我们惊奇地看着对方。是的，那是尼娜，我的俄语老师，已经二十六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她的变化多大啊！那时，她是那样漂亮、文雅、爱说爱笑，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整个战争期间，她一直在前线服务，并且获得过红旗奖章。我们那时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彼此对这次重逢都十分激动。她是为了陪同挪威和瑞典的代表团才到这里来的。在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前，我又在走廊上见到她，但她这次几乎没有理会我的招呼。警卫班的一个领导人正在气势汹汹地同她谈话。我觉得，他是在训斥她。她大概违反了一个代表团的陪同人员不得同别的代表团成员交谈的规定；或者说是她同我交谈而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或者说，这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

## 二月二十日

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一个外国代表讲话时谈到了我们的老大哥——伟大的俄罗斯人民树立的榜样。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崇拜吗？不管这是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政党，或者是一国人民，难道不是对身居塔尖者的崇拜吗？我想起在匈牙利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会上，每个代表都必须表明，苏联公民是他要学习的尽善尽美的榜样。听众对所有这样的讲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几年

前，世界上的每一项新发明，各个领域中的每一项新发现，都是俄国的！我有一次听到莫斯科电台广播说，纳尔逊用来击沉西班牙舰艇的船只是用俄国的木板建造的！幸运的是，现在用这种腔调讲话的人不很多了，因为冷嘲热讽令人受不了。到了这次代表大会上，样板国和样板党又吃香了。

伏罗希洛夫老元帅出现在讲台上。他仍然是敏捷和健壮的。看起来，他既健康又能干。他宣读了他的讲稿。

我注意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妇女寥寥无几，至今只有两名妇女发言，另一方面，却有许多将军和元帅。正如我曾经对陶里亚蒂说过的，我对缺少普通士兵感到奇怪。显然，整个总参谋部都搬到这里来了，或许所有那些处置过不止一个贝利亚的人都来了。坦率地说，我觉得缺少来自工厂和工地的人民的真正声音：普通人的声音，总之，创造历史的那些人的声音。

伏罗希洛夫结束了他的发言，并且激起了阵阵掌声。总的说来，人们觉得，只要有可能，代表们就要对那些做过斯大林的同事而后来又失宠的老近卫军成员表示深切的同情。

多洛雷斯<sup>①</sup>讲了话。在我看来，她是这次代表大会上最饱经风霜的人物。尽管她的声音宏亮，但人们都意识到，在西班牙战争前后，她已经度过了十七年的流亡生活。

作家肖洛霍夫在多洛雷斯之后发了言。他取笑作家，说他们有三千七百七十三人参加作家协会，但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死魂灵”。

这是一篇很尖刻的讲话，讲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

我们已经结束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讨论。主席团不慌不忙地建议结束讨论，每个人，包括五十名尚待发言的人，都赞成这个建议。

---

<sup>①</sup> 即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共产党主席。——译注

大会还要为此通过一项决议。赫鲁晓夫认为没有必要再作结束讨论的讲话了。

晚上，住在别处的许多代表都到我们的饭店来了。他们前来观看根据高尔基的作品新改编的彩色影片《母亲》。我们已经看过这部影片。我留下来同柯都维亚<sup>①</sup>交谈，他对把矛头集中指向斯大林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表示担忧。我还见到了一位年长的女同志。我在一九三〇年认识她时，她还很年轻。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同她交谈。

“你也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吗？”

“不是。”

“你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知道，我知道一切。”

“你对此是怎么想的？”

“这个，出现这种事情确实是件好事，即使对于已经死去的人来说也太迟了，对于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来说也太迟了。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中说得对。你是否还记得这份遗嘱？列宁的意见是要撤销斯大林的书记职务，因为他粗暴、自负和盛气凌人。列宁预见到斯大林会逐渐把自己变成党的主人。这种情况正是这样逐渐发生的，他成了可怕的伊凡式人物。事实上，他比伊凡更可怕，因为他在自己的周围传播死亡，毁掉所有比他懂得更多的人，让平庸之辈和没有骨气的小丑围着他转。谁敢讲话，他就用逮捕、‘坦白交待’、死亡和流放西伯利亚来封住他的嘴。他的同伙现在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吃晚饭的时候，陶里亚蒂又顺便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斯大林是反对对他本人搞崇拜的，而且经常这样说过。斯大林在一个

---

<sup>①</sup> 柯都维亚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63年逝世。——译注



新年前夕确实十分尖锐地说过这个问题。我想，那是在一九五二年，当时陶里亚蒂正在莫斯科治病，看到斯大林如何严厉地批评那些盲目崇拜他的同志。

今天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算一算离开之前还要在这里停留几天了。我一天也不想在此地多停留。我感到厌倦和懊丧。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要发表批评性意见，要看一看消极的东西，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当发现有人和自己的意见一致时，我感到高兴，而当发现有人对这里发生的事情表示赞同时，我就感到气愤。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呢？也许，这是由于我们过着这种被整天一声不吭的招待员和安全人员包围起来的生活造成的。是由于只住着少数代表而冷清得象座陵墓的大饭店造成的呢？还是由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正常生活之外而又不能外出到市中心去同人民往来造成的呢？来自五十四个国家的代表都一致赞成现在进行的工作，他们代表了我曾在那里几乎生活过四十年并且曾为它的诞生出过力的社会。那么，我现在为何会这样呢？是我有非份的要求吗？是我的神经过敏吗？也许是我过多从个人的角度想问题吧？我最好睡觉去。也许，我在考虑问题时会更冷静和更镇定一些。

## 二月二十一日

在会议厅里，一切都是平静的。布尔加宁在用一成不变的声调作长篇大论的报告。他好象是在作财经问题报告。我没有听他的报告，而宁愿去想自己的心事，瞧瞧窗外的明媚阳光，不时推醒墨西哥党的书记。他戴着墨镜，我每次推醒他，他就递给我太妃糖。

S 前来告诉我，主席团已经决定，所有在莫斯科的合法的外国代表团团长都要向代表大会致贺。我告诉他，我不打算讲话。

“为什么不想讲呢？”他带着惊奇和颇为不满的神情问我。

“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想讲。”

我现在的心情同我那么艰难地起草那份简短贺辞时的心情一样。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陶里亚蒂，并得到这样的印象：他认为这件事无关紧要。

我们前往莫斯科大剧院观看那里演出的精采歌舞节目。我坐在一个包厢里，可以看到全部苏联领导人，他们面对着我们，但不看我们。中国人、拉美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德国人等坐在我们的边上。我坐在乌布利希身旁，同他作了交谈。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是可以预见到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我同脸上毫无表情的乌布利希交谈时，格罗提渥在听我们谈话，但一声不吭。

幕间休息时，我陪陶里亚蒂到休息室去，不是去吸烟，而是去歇歇腿脚。我们在那里发现有一大批安全人员，他们在场使陶里亚蒂感到心烦，我也是如此。我对他说，为了避免采取这种过份的戒备措施，找负责人谈谈恐怕是个好主意。

“无济于事，”他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 二月二十二日

博法<sup>①</sup>气喘吁吁地跑来并想立即见到陶里亚蒂。外国记者们正在坚持要采访这位头头，想得到他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印象。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斯大林神话的结束。他们想更多了解这个问题，也许，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我们还多。事实上，我们好象是生活在月球上一样，只是在四天之后才读到博法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和一份偶然得到的《晚邮报》<sup>②</sup>。

① 博法系意共《团结报》驻莫斯科记者。——译注

② 《晚邮报》系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报纸。——译注

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布尔加宁的报告。准备了讲稿的代表们继续走上讲台，他们每个人通常都博得一阵掌声。数字，越来越多的数字和统计资料。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次大型的生产会议，是关于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讨论，一切都是枯燥无味的。

这里的新闻报道千篇一律，如出一辙。所有的报纸都刊登同样的消息和同样的评论。这个出版物同那个出版物在我看来毫无二致。每一行的内容都受到严格的控制。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在发言。他的通篇讲话都承认过去和现在存在的许多缺点，而且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

接着，黎巴嫩的代表讲话。当他讲到阿拉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他赢得热烈的掌声。这种“道路”现在颇为流行。记得，共产党情报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意大利人由于提出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而受到过粗暴的对待。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代表曾叫意大利人感到难受。

库西宁主持了下午的会议。陶里亚蒂和斯科奇马罗没有到会。我想，他们在同赫鲁晓夫举行第一次会晤，大概是在讨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布罗夫正在作关于计划工作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他提醒人们重视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处问题，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对所有共产党来说都是有益的理论贡献。又有不同国家的代表上台宣读贺辞。苏联的代表津津有味地叫他们讲话。对他们来说，这些讲话是被数字和统计资料笼罩着的汪洋大海中的唯一“亮点”。通过这些阐述各国形势的讲话，他们了解到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的现实。

晚上，我们前往木偶剧场观看演出。他们演了名为《不寻常的演奏会》的节目。我突然在想：他们为什么不上演《一次不寻常

的代表大会》或一出短剧《今天和昨天的个人崇拜》呢？那会获得巨大成功的，群众也会蜂拥而至。

## 二月二十三日

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同陶里亚蒂作了交谈。他说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他也希望代表大会很快结束。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乘飞机回家。他想赶紧回意大利去。

几个部长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发言。最后，少先队员们来了。代表们起立，尽情鼓掌。一个少先队员致词时谈到了苏联儿童的生活并且感谢党和政府。即使在这个充满孩子气的讲话中也没有提到斯大林。他甚至在孩子们中间消失了。接着，他们列队走出会场，他们唱着歌，把鲜花扔给代表们，而代表们向他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眼里都含着泪花。

苏联和外国代表又在发言。恩西那<sup>①</sup>向大会致词。我一直觉得他是在讲那些我已经听他讲过的问题。接着，我们回到饭店并去观看电影《处女地》。

我的一位朋友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同我谈到个人崇拜问题。他是美国人，他问我这种个人崇拜问题是老生常谈还是新问题？真正要负责任的是谁？是偶像还是偶像的崇拜者？苏联人民是有教养的，他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党，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那么，他们怎么会容忍这种问题的存在呢？为什么潘克拉托娃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不讲她在这次代表大会讲的那些问题呢？相反，她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把斯大林捧上了天。我们能说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向我们把问题讲清楚呢？我们还能不能提到

---

<sup>①</sup> 恩西那系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译注

斯大林同志呢？如果他犯下了这样的弥天大罪，或许把他忘掉不是更好吗？

事实上，这位同志找不到能回答他的问题的任何人。“等一等，看一看吧。”我为了安慰他而这样对他说。

## 二月二十四日

讨论今天该结束了，但没人想这么说。显然，这是个秘密。会间休息时，走廊上的人比平时还多，有点使人厌倦的十天过去了，看到这次代表大会很快就要结束，大家都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

主席团已经就座，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人们可以看到它的所有成员。我看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白色灯光下，他们的黑色套服同他们那白晰的脸和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看上去象一尊尊蜡做的模特儿似的。

现在才是上午十一点钟。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小时过得非常缓慢。

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走上讲台。听众们，甚至主席团，都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他不时地引用列宁的语录，对他来说，好象从来就没有斯大林这个人，尽管李森科本人曾十分得宠。事实上，为了使他有机会成为苏联的头号农业生物学家，看来是斯大林把据说是间谍的科学家瓦维洛夫搞掉的。李森科对自己虽然不是苏共党员但也应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表示感谢。

外国的代表们继续走上讲台。他们大多数人都设法用俄语开始自己的讲话。这种做法使苏联代表们感到高兴，他们满意地鼓掌欢迎。

会间休息时，我同陶里亚蒂一起到设在一个大厅里的书摊去。陶里亚蒂买了几本有关艺术方面的书。我打听是不是有苏共党史和斯大林晚年论述经济问题的书。一本也没有。他们说都卖完

了。他们回答得很利落。显然，这些著作象伪钞一样停止流通了。我也许是错的，但这是我的印象。但愿下一本苏共党史会比较幸运，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和尊重事实。

我们回到会议厅。主席团稍迟一些才来。他们大概在讨论如何快一点结束这次代表大会，以便防止无限期地开下去。虽然对发言者都有时间限制，但我觉得所有的发言者却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修改苏共党章的决议也获得一致通过。接着，一个乌兹别克人发了言。

我很羡慕坐在我附近的两名乌兹别克妇女，她们都在悄悄地阅读短篇小说。她们除了议论这些小说外，从未停止过阅读。我看到其他代表中间也有这种表现，这是一种颇为令人心酸的现象。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永远叫人感到心酸。

下午两点二十分，主席团宣布，在一百零一个要求发言的代表中，已有三十七人发了言。他们建议结束讨论。每个人都一致表示赞同。布尔加宁放弃了对讨论作总结发言的权利。

又有一些代表发表讲话，他们是来自玻利维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代表。突尼斯的代表肯定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家伙，他的讲话竟然比其他任何一个外国代表的讲话都长。他先是以个人身份讲话，人人都为他鼓掌，以为他讲完了，而他接着又宣读了突尼斯党的长篇贺辞。

此时，主席团宣布收到了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辞。

坐在我附近的人都带着吃惊的神色转过脸来看我。莫斯科党组织的书记福尔采娃是赫鲁晓夫的得力助手，也是他在莫斯科市委的接班人。她用刺耳的声音宣读了这份贺辞。贺辞极短，但我

觉得还是太长了。正象对待其他所有的贺辞一样，代表们在听完贺辞时都起立鼓掌。我也起立为的里雅斯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份贺辞鼓掌。这次代表大会终于结束了。

明天将为苏联的代表们举行闭幕会议。这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常程序。

在走出会场的路上，代表们问我为什么没有上台讲话。在饭店里，甚至陶里亚蒂也好象非常生气，我从未见到他如此恼怒过。

“你为什么不发表讲话？”

“我已经对你说过原因了。”

“我那时以为你是在开玩笑，”他回答说。

“不，我并不是开玩笑。”

我再次向他解释说，我已经告诉苏联的代表：代表一个正在消失的党发表讲话会使人觉得有点可笑。

我们的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明天将去参观党校和大学。我说，我想尽快离开苏联，因为的里雅斯特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不久就要举行。我可以等到星期三，不能等得太久了。陶里亚蒂和斯科奇马罗要留在这里同赫鲁晓夫举行会晤，他已请他们不要匆忙离去。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敲打了十二响。接着，又是万籁俱寂。天在下着雪。

这次代表大会似乎已成了久远的往事，就好象从未举行过一样。我想今天夜里就离开这里。

## 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阳光明媚。其他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因此，我们也就不再谈论代表大会的事情了。当别人去采购的时候，我在红场上闲逛。经过用手势和片言只语的交谈后，我得到许可去参观列宁陵

墓后面的那个安放几个伟大革命家骨灰的地方。

午饭后，我们去参观一个工厂。我没有发表讲话，但这次倒不是因为我不想发表讲话。在这样的场合，我是很高兴发表讲话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我是来自一个独立政党的代表，他们还让我坐在墨西哥人和巴西人之间，而在工厂里，我却成了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一部分，和斯科奇马罗在一起。我没有要求对此作出解释，即使这样做，那也无济于事。我确信这不是一个失误或者一个疏忽，因为这里的一切，那怕是细微末节的小事，都是有条不紊的，都是事先经过筹划和斟酌才安排的。

今天，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本来要在红场上举行的游行活动。他们的解释是因为天气太冷。但是，今天天气一直很好。赫鲁晓夫在闭幕会议上就斯大林的问题作了长达四小时的讲话。然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陶里亚蒂也不了解。

## 二月二十六日

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天晓得我为什么会想到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三〇年，也就是在我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后的几个星期自杀的。我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简短会议上认识他的，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怎么会在这二十六年之后的这个特殊的夜晚想起他呢？一个朋友对我说过，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是因为他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诗人。我的这位朋友要我相信，马雅可夫斯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诗作源泉——内战、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已经枯竭。难道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源泉真的枯竭了吗？为了观察我的反应，我的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带着几分挖苦的口吻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许多政治上的朋友不再有那种‘源泉’了，因为他们都下狱了！”

马雅可夫斯基今天会说什么呢？米高扬说过：“如果列宁今天



能看到我们……”那么，如果马雅可夫斯基今天能见到我们，他会怎么样呢？他大概也会写出一首令人胆颤心惊的那种诗歌来吧？他的诗句曾为战斗中的战士们所背诵。伟大的列宁通过阅读他的诗歌变得更加伟大，更加高尚，因为那些诗歌并不追求偶像崇拜，而饱含着战斗性的批评。

如果苏联今天有那么多的马雅可夫斯基就好了，但他们并不存在。斯大林是不会容忍他们的。

## 二月二十七日

我和斯塔索娃<sup>①</sup>的一个朋友一起离开她的家。他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下面是他陪我回饭店时和我交谈的要点：

我们的敌人将继续开展反对苏联社会，反对我们的党和思想的活动。确实，这里出现了逐渐蜕变的问题，因此，为了避免今后重新发生这种问题，有必要研究一下造成这种问题的经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

为了恢复正常状况，恢复法制，释放无辜和恢复他们的名誉，斯大林逝世后就采取了某些步骤。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赫鲁晓夫想保全自己，但我不相信他会得逞，因为他本人是斯大林的工具，是斯大林的同伙，是拍斯大林马屁的人。

重要的是，有必要牢记，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能认为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在苏联和国际组织中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因为当时执行政策，尽管具有斯大林的印记，但都是我们大家制定出来并加以接受和贯彻的。我们大家对自己在上级机关或者下级机关以及在前

---

<sup>①</sup> 即叶莲娜·斯塔索娃(1873—1966)，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和共产国际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译注

线或者在后方所起的作用，都有或大或小以及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 二月二十八日

这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注意到他们对我的旅行分外关心。他们面带笑容，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对他们的这种关心表示感谢，但我确实不需要任何东西。

我同一位苏联朋友作了一次交谈。他要我相信，他是想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并代表党同我谈话的。

我的这位朋友说，现在有关斯大林的那些传说并不是真的，斯大林是一位伟人，是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我指出，这些传闻是他们说的，而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冷淡地向对方道别并答应再见一次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吃晚饭时，陶里亚蒂为了告诉我一些事情把我叫去。他恳切地希望我回到里雅斯特后暂时不要谈论斯大林的问题。

“那怎么可能办到呢？”

“谈点别的嘛。”他回答说。

说起来容易，不过……

现在是清晨三点钟，离开的时间快到了。

## 二月二十九日

让我们走吧！外面很冷，但是个星光闪烁的夜晚。我仰望克里姆林宫。我看到五个红星中的四个，但红旗仍挂在那里。愿它永远胜利地飘扬！愿它明天在全世界——一个消灭了所有在这里已经清除的那些丑恶现象的世界上飘扬。

我同正要回家的一位苏联代表一道到基辅去。在代表大会期间，她曾坐在我的附近，因此我们相识。她是一位教师，她问我对代表大会的印象。我告诉她，我在的里雅斯特肯定会碰到同志们

提出的连珠炮似的问题。她回答说,基辅的情况也会如此,因为普遍都感到震惊。她谈到闭幕会议和赫鲁晓夫报告的情况,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别的,而是揭露斯大林对苏联在战争开始时遭到军事挫折要负责任。她觉得,这种批评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对斯大林精通军事问题是深信不疑的。当然,斯大林不是无所不知和主宰一切的上帝,但也不能把他看作是一个不学无术和不负责任的人,对地理、历史和军事科学一窍不通。对苏联人民来说,斯大林仍然是战胜纳粹法西斯军队的象征。成千上万个战士高呼着“斯大林万岁”就义。“确实,”我的朋友继续说道,“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或者‘苏联万岁’更好些。但是,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为高呼过‘斯大林万岁’而感到羞愧,因为我们是传颂着这个名字发起进攻、在列宁格勒赢得胜利并攻克柏林的。”

在布达佩斯,我见到匈牙利共产党的一位同志,他要我至少在那里停留一天,以便告诉他代表大会发生的事情。

我无法在那里停留,因为我必须尽早地回到里雅斯特去。我们自己的党代会预定在两周内举行。

我们来到了维也纳。弗雷兹<sup>①</sup>前来迎接我。他什么都知道。这位老同志正在忍受着危机感的折磨。汽车司机和别的同志也忧心忡忡。他们问道:“这个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那些人昨天还在高唱赞歌,今天怎么可能又血口喷人呢?现在还活着的人正是要真正负责任的人。那个人虽然死了,但他比他们强一千倍。现在毁掉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同他们有什么利害关系?是为了确立集体领导吗?他们不侮辱斯大林也可以实现集体领导。他们现在应该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自己要对一切负主要责任。他们应该递交辞呈滚回家去。事实上,他们应该受到审判。”

---

<sup>①</sup> 即海因利希·弗雷兹,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译注

晚上，我离开维也纳。

尽管列车在震动，但我睡得很好。入睡前，我读了自己在苏维埃饭店的房间里写下的这本日记的一篇笔记。在这篇笔记里，我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在米高扬发言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巴西代表悄悄地对我说：“如果斯大林老人家这会儿出现在某个大窗户上，米高扬会怎么样？其他人又会怎么样？”

在莫斯科大剧院里，当我们同整整齐齐地坐在一个包厢里的苏联领导人观看演出时，一个代表就曾说过，如果斯大林这时候走进那个包厢并在他们中间坐下来，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圣乔治大厅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有人“谣传”说，斯大林曾出现在赫鲁晓夫的睡梦里，赫鲁晓夫以剖腹自杀来代替作自我批评。

\* \* \*

对我本人来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它已经引起一系列的反应：愤愤不平和拍手称快；疑虑重重和坚信不疑。我深信，这次代表大会将使我们的敌人感到解恨，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则将引起重重疑虑、激烈舌战和弃党叛离。因此，我们必须作好迎接一场风暴的准备，这场风暴将检验同志们的成熟性以及检验我们是否有能力击退进攻并通过纠正缺点错误继续前进。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仅使我感到苦恼，而且也使我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人的生活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不能再以为自己是活的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和绝对真理的保管员了。这就预示着要进行一场新的重大的战斗，也许是我们这些富有斗争精神的革命者进行过的最艰苦的战斗，但我们必须进行这场战斗。（未完待续）

# 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问题

## ——回顾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英〕约翰·高兰著

吴克良译 黄雪辉校

约翰·高兰(John Gollan, 1911~1977)是英国共产党前总书记。1975年因病辞职后,受党的挽留继续主持党纲的修改工作,并为党报党刊撰写政论文章。1977年9月病逝。

本文是高兰为纪念苏共二十大二十周年撰写的,也是他晚年抱病笔耕的代表作,原载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1976年1月号,后被收入《高兰回忆录》一书。文章认为,苏共二十大开创了国际共运取得进步、团结和多样性的新阶段,“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转折点”。文章批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党变得越来越带有行政色彩,工会只限于发挥“党的传送带”的作用,国家机关充斥着官僚政治;批评苏联在二十大后仍然在国内压制文艺创作自由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在发展民主方面放慢步子,甚至倒退。文章联系国际共运自共产国际七大以后的历史变化强调指出,国际共运的团结,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每个党都享有自主权,都有权提出本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文章认为,不能把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普遍地运用到各国党的关系上来。党际关系和政策问题，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相互协商解决，一部分党将另一部分党“革出教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本文虽系十年前发表的，但仍可为研究苏共二十大的历史作用提供参考。

今年适值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二十周年纪念，那次大会曾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和大规模镇压的情况。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是对二十年来在社会主义进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进展进行回顾的时候。因为二十大曾起了一种催化作用，推进了那些业已在苏联出现并引起重大政治斗争的重大事态，也推进了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伴随这个发展而产生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态。二十大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进步、团结和多样性的新阶段。

这次代表大会讨论到的许多广泛的问题，早已出现于世界舞台上。产生这些问题的前因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各国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经验以及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意大利共产党和我们党在一九五一年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所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一概念的发展。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既反映了这些事态，又使这些事态在苏共的崇高威望的支持下获得新的动力。

然而，二十大的周年纪念，正是对革命史上存在的一个带有悲剧创伤的严峻问题，即所谓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再审的时刻。这个问题的揭露曾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从这个

问题的揭露中，国际共运也得到了新的力量。下文所述，不是详尽无遗的分析，而是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的检查。

这样的回顾，提出了一个问题：对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作出的已历时二十年的评价是否完全适当？

对于二十大所有这些多方面的问题，必须从总体进行考察，不仅要看到罪恶方面的问题，而且，用决议的话来说，还应涉及“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多样性这些重要原则性的理论”。此外，我们可以加上统一战线发展问题。

### 开创了深远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次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开创了一个深远的进程，它并没有结束这个进程。在对这个决议及草拟决议的环境，包括对二十大本身的突发性作出评价时，这个事实是应该着重指出的。大会的政治总路线是在公开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而个人崇拜问题则主要是在秘密报告和秘密会议上加以讨论的。采取这种做法，无疑是由于大会前苏共领导内部的政治斗争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发动了坚定的后卫战，以改变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当时就预见到在其后的年代里会有一个苏维埃民主持续发展的进程，但这一进程并不是没有遭到挫折的。

主要的后果是积极的，其中包括对前一时期的某些错误的纠正，但这一进程又是充满风波的，包括在波兰出现的尖锐问题和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共同目标之上的团结，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每个党都享有自主权和为本国人民前进到社会主义提出自己的政策的权利。这个进程通

过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九年召开的三次世界性会议，以及在这之后的几年中得到了发展。

那些年头是一个困难重重、多事而复杂的时期，但是，尽管有过挫折，它仍然呈现出一幅世界在大踏步积极前进的景象。进步永远不会是一种安安稳稳的持续不断的行进过程。

一开始就说明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观点着眼于新的和发展中的事物，着眼于新与旧的斗争。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二十大以及随后出现的事态是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意义必须作为我们基本的出发点，这次革命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和最高点。自此以后，就有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严峻的考验中胜利地出现这一事实，使帝国主义想把它摧毁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这个胜利表明，尽管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有着种种罪恶，但苏联社会主义根基并没有受到动摇，因此，二十大揭露和清算这些罪恶，是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今天取得举足轻重的世界地位的一个主要因素。

## 二十年 间

二十大以来的二十年，证实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泰晤士报》世界经济评论栏中的一篇社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经济（指资本主义经济——约·高兰）是不是仅仅遭受到一次暂时的恐慌”，还是有“一个恶性更大的长期趋势”。社论在谈到苏联时说：“苏维埃社会中的安全感和计划性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地区不断出现的从危机到危机的政治和经济趋势，形成了空前鲜明的对照。”

处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发生的持续危机和社会主义不



断取得进步之间存在的这种悬殊差别，是世界事态发展的中心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经济指标的问题，还是关系到一种社会制度具有什么样的目的和内容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都源于它的阶级性。尽管它有先进的技术，但它建立在剥削工人阶级和攫取资本主义私人利润的基础之上，因此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持续性危机、日益加深的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等。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政治结构和组织结构都存在着危机，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则具有十分高尚的目的。它不仅经济上优越，而且还要废除剥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需要。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再有危机。它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展问题，就是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其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瓦解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继续迅速崩溃。在这方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突出的事例有越南革命的胜利、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的发展（尽管在智利出现了挫折）和非洲的深刻变化以及原料生产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

除此之外，欧洲还出现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国清除历史遗留的法西斯政权的进程，这一进程也是起因于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三，二十大强调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三十年已经证实了这个新论点是正确的。这三十年是一个激烈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运动都发挥了它们各自的作用。缓和进程的日益发展既是斗争的结果，又是为防止新的世

界大战而更加满怀信心地进行努力的一个起点。

此外，二十大所强调的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新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里，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党，已经达到这个阶段。我们下面还要较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然而，这些基本思想，诸如不经过内战而和平民主地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工人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多党制等等，都在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了。当然，这是一个有别于俄国革命发展的进程。

二十大的主要思想，解放的思想，已经为许多事件所证实了。二十大一一阐明的这些思想，其实是从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的客观历史可能性中产生的，它们证明了这次代表大会就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分析和决议是正确的。对于这次大会的另一个中心问题，即苏共明确指出的个人崇拜问题，出现了估量不足的情况。

### 代表大会与个人崇拜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概述如下：“在考察这一问题的时候，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

决议在论述了我已经提到过的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之后，进而论述这一历史背景。这是第一个经验，它从实践上证明了在此以前人们仅从理论的阐述中知道的许多真理。苏联“象一个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被围困的堡垒”。内战以后，苏联又经历新的军事入侵，而最严重的威胁则是三十年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迫在眉睫的战争。为决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即“谁战胜谁”而开展的阶级斗争，使这些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列宁逝世以后，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右派分子的一场激烈斗争发生了。斗争的核心是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都必须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包括长期的落后状态）进行，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改造这个国家。

于是，决议对这种历史背景作出了如下的总结论：“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里，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地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这不能不对一些民主形式的发展起不好的影响。在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进行残酷斗争的过程中，我国不得不对民主作一些限制，从我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包围形势下为社会主义奋斗的逻辑上来说，这是正确的。”

决议继续说，但是，这些限制被看成是暂时的，“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巩固以及全世界民主和和平（决议原文为‘社会主义’，见1956年7月6日‘新华社新闻稿’——译注）力量的发展”而应予以取消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苏维埃人民的“英雄业绩”。就提到的这个摘要来说，我们没有触及到斯大林畸形发展这个核心问题，当然，决议的每一部分都是与这个问题息息相关的。我们将要考虑决议的后半部分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即使就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第一部分的摘要为根据，似乎“个人崇拜”这个词的涵义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上述的这种历史背景、使用武力、工作方法、革命机构的发展以及接着发生的问题，事实上都不能用对某个人的崇拜来解释的，尽管这些提供了使个人崇拜能够滋长的体制。甚至就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根除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制度畸形化的作法，已经证明是困难的和长期的任务。

从战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这些客观情况就足以说明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性。舍此，苏联就决不能胜利地度过这

次战争。

然而,据我看来,这个分析的不足是没有明确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应以列宁逝世为起点。确实,列宁的时代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时代,列宁在晚期的演说和著述中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这种政治问题作过透彻的论述,而这些问题与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宁提出了苏维埃发展的关键问题。我认为他的继承者们并没有按照列宁设想的那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后来的严重局势。

## 斯大林的作用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苏共决议的关键部分,即关于斯大林与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决议的分析包括五个要点:

首先是他的积极贡献:“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伟大组织家,他领导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阴谋的斗争。”这是他巨大的声望和威信的基础。随后就出现了把所有的胜利都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不正确的作法”以及对他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第二是关于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这些品质是列宁所否定的。这在一九二二年列宁的信件和所谓的遗嘱中谈到过。斯大林作为总书记(他于一九二二年被任命)拥有巨大的权力,列宁讲过:“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sup>①</sup>在一九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二三年的信中，列宁说过，斯大林作为总书记是过于粗暴了。他写道：“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sup>①</sup> 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一九二四年），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但要他考虑列宁对他的批评。决议指出，斯大林初期还重视批评意见，但后来，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功绩，达到了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的地步。

事实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留任了斯大林，尽管那时他曾两次提出辞职。

第三，他开始把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建设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某些限制，变为“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粗暴地践踏了列宁的领导原则”。党的中央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不定期召开，以后就根本不召开了。“斯大林实际上置身于批评之外。”

第四，决议继续指出，斯大林关于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论点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个论点在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是正确的，但那是“在 1937 年，当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取得胜利，当剥削阶级及其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的时候，这个公式竟被提到首位。在实践中，这个错误的理论公式，成了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

最后，决议继续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的特殊地位，这些机关受到极大的信任。决议说，在很长的时期内，这种特殊地位没有引起什么危险。但是，当斯大林个人的监督代替了党和政府的监督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得更为严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6卷第 618 页。

重，“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的罪恶匪帮窃取了国家保安机关的领导地位之后，苏维埃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

有必要进一步对这些问题加以考察。

### 争论的关键问题

毫无疑问，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击溃托洛茨基分子及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我们要考虑的存在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以及这个革命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党的统一。

这些虽是要在理论上辩明的问题，而事实上也是必须实施的实际政治经济政策中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全部问题，关系到第一个和以后几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关系到建设一支现代化的苏维埃工人阶级、技术人员、专家和行政干部队伍，还关系到农业集体化。

反对派的路线失败了，革命的决定性的社会基础保留下来了，社会主义大工业建立起来了，集体化也实行了。正如《决议》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没有这一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成就确实对后来世界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革命的主力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厌恶战争的，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且由于重工业的崩溃变成散乱。列宁甚至写道，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社会地位，要使它恢复元气和发展起来，就需要时间。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间，工人阶级的人数增长到一千九百万人，后来，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进行，工人阶级的人数进而在二亿零六百万总人口中占了一亿零三百万人。

农业集体化改造了农村。那是充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期。但

在这个时期中也犯有斯大林自己在《胜利冲昏头脑》的演说中所谴责过的实行强迫和强制作法的重大错误，这使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扩大生产的资本主要来自农业，这就给其后的农业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

到一九三八年，一年内有十万以上的专家（不包括军事专家）毕业于高等院校。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二万所学校建立起来了。大、中、小学生的数字达到了三千四百万。

苏联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在英、美的历史上经过三代人才完成的社会改革而成为工业社会。这里有着意义深远的区别：这个工业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斯大林的声望和威信的增长是可以理解的。

### 斯大林关于党的概念

从列宁逝世到一九三〇年，党内讨论了各种重大问题。列宁的逝世以及随后出现的危机使团结涣散，使分歧尖锐化。反对派中有很多人转向了宗派主义，在列宁时代，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反对派都是宗派主义，或者把他们都称作宗派主义，但那时他们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手段。然而，问题在于那时没有采用国家行政措施。他们被放到公开的政治辩论中去解决，后来才把他们开除出党。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后果是严重的。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最初是逐渐地，后来则越来越明显地离开了列宁制订的党、国家和工会的发展路线。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何时召开和召开次数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在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代表大会经常而且定期举行。一九二三年列宁还在世时，举行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紧接着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举行了十三大，以后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大，一九二七年十五大，一九三〇年十六大，一九三四年十七大，一九三九年十八大。换句话说，在一九

三〇年以前的政治大辩论期间，召开了多次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和决定政策。十六大以后间隔扩大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一九五二年才举行十九大，其间相隔了十三年之久。

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但这个论据不能用来说明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三年这七年的情况。

这个问题同斯大林关于党的观念有关。例如，在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他曾主张在战争条件下，“〔在党内〕必须把民主收起来。党要动员起来，我们大概要使它军事化，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sup>①</sup>即使在内战和武装干涉的高潮中，这也绝不是列宁的思想。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到一九二三年四月间，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并定期举行了中央委员会会议。

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召开。

当然，党的团结及其政治作用与任务的问题，都是与击败反对派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斯大林的许多报告和文章都强调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但他总是补充说，这种做法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象反对派那种类型的。

随着反对派被击败，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举行的第十八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对我们党是非常有利的。”但它却带来了危险，即“党内可能滋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和高枕无忧的情绪。”这会使党停止前进，“为了不使这种情形发生，我们就需要自我批评，但不是反对派所进行的那种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页。



恶意的、实质上是反革命的批评，而是真诚的公开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sup>①</sup>

然而，事实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始至终是受到抵制的。在一九三四年召开的十七大上，斯大林曾谈到党内“害怕”自我批评。这是与党越来越强调行政化的倾向发展有关的（当然，实际情况非常需要强调团结的必要性），但也与斯大林说的党是“团结一致”的概念有关。在较早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期间，列宁在关于党的问题上从未使用过“团结一致”这个词，而这个词似乎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首先使用的。他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说：“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把党看作别的东西，只把它看作由一块材料凿成的完整的（即‘团结一致的’）组织，它有一个意志，它在工作中把思想上的各种差异汇集在一条实际活动的洪流中。”<sup>②</sup>

虽然，“由一块材料凿成的完整的组织”这个措词并未出现在他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中，但他却把它变成一个确定的原则。例如，他在一九二七年的中央全会上说过：“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统一的和团结一致的党，必须是没有派别组织和派别组织中央而只有一个统一的党中央和统一的意志的党。”<sup>③</sup>他强调团结一致的根据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无论是列宁，还是这个决议，都没有使用过这个词。列宁是反对派别活动的。一个革命的政党要有力量，就必须自觉地服从纪律和团结一致地执行决议。但是，列宁认为，分歧、辩论、步调一致地贯彻决议是一个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团结一致这个词，越来越成为顺从的同义词。当然，关于反对派所争论的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2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3页。

许多关键问题，是必须明确规定与其有关的政策的，但是，在发展问题上容许有分歧的，特别是当一个新时期到来的时候。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相反的或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现象。不应该把所有的分歧都看作是宗派的。主要的任务是取得一致的看法。

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三〇年这个时期，部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但也由于斯大林对党的看法思想僵化，因此，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使得对于新事态的讨论不能展开。这不仅使思想荒谬化、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代替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造成好象以安全之名进行大规模镇压是有一定道理的。

### 斯大林与苏维埃国家

所有这一切同有关国家、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先来谈谈列宁所说的“谁战胜谁”这个基本问题和后来的强行工业化、发展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开展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苏维埃力量薄弱的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破坏活动和外国干涉等问题。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最初论述苏维埃民主时，曾谈到要在农村摒弃旧的行政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使苏维埃“恢复元气”，务必使苏维埃由真正的选举产生，“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原则”。这表明农村中的问题严重和党在农民中的力量薄弱。他讲到需要改造国家机关，消灭官僚主义，在政府机关中提拔工人和农民，密切国家机关与老百姓的联系。他说，苏维埃国家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如果高踞于群众之上，那就会与他们格格不入。他提出这一点，特别是由于国家机关已经增加了几十万主要是非党人员，并且随着国家机关的重要性的增加，“它们对党的压力就越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

烈。”<sup>①</sup>

必须有党的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和国家是一个东西。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党是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力量”。<sup>②</sup>这是斯大林在十四大上所采取的立场。但是，领导是不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并说服人民支持这种政策呢？

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在十五大上指责“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用行政方法代替说服方法”。党的活动必须提高到“吸收他们（党员）参加解决我们党的领导方面的种种问题，不断地发扬党内民主”。<sup>③</sup>

到了一九三〇年十六大时，斯大林提到那些在国家机关中充当“阶级敌人代理人”的官僚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的破坏行为。他谈到“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但它是辅助的，不是主要的”<sup>④</sup>，同时他也讲到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命令和指令代替了“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sup>⑤</sup>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党进行着四方面的工作：开展自我批评，组织对（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清洗机关以及从下面提拔工人阶级中的忠诚的工作人员参加机关工作。”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后来发生的那些问题的苗头。真正的困难正在努力解决中，但却越来越把这些问题与阶级敌人（敌人确是很多的）等同起来，而解决这些问题则越来越凭借镇压手段（虽然总是规定不应该单纯使用镇压手段），用组织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

---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5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1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6页。

段(检查执行情况、清洗和提升)来处理这些问题,尽管还在谈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 工 会

在列宁时代,在关于工会问题的早期辩论中,斯大林曾经支持过列宁。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真正地同意列宁的看法,特别是他是否牢记列宁关于工会要发挥重大的独立作用这个观念。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过:“假如党与工会发生分裂,党是有罪过的,其结果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sup>①</sup>

在斯大林的整个时期里,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从来没有对工会概念和作用作过正确的表述,他对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论述收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论述是刻板的,根本没有涉及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创造性的思想(顺便提一下,这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会在劳工运动中的作用的形成的理解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几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用一种低沉的调子论述工会,几乎可以说是一带而过,甚至在他的重要演说《大转变的一年》和《竞赛与劳动热情》(中译本的题目是《群众的竞赛与劳动热情的高涨》,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译注)中也没有论及这些问题。

在二十年代末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于工会的注意力从保护工人的利益转到加强劳动纪律和完成生产指标方面。一九二九年五月,领导工会达十年之久的托姆斯基,由于强调工会的独立作用而被撤职。他是强调缩小工资差别的,但他同右翼反对派也有联系。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人们对工会无视劳动条件,对一些官员的专横行为,对于用任命代替选举以及明目张胆地滥用工会权力的情况抱怨不绝。列宁设想的对工会作用已经无影无踪。在一九三〇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满意地谈到了全苏工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页。

会中央理事会“……摆脱了旧的机会主义的领导”。

的确，出现这种实际上无视列宁关于工会的论述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对集中领导经济的必要性并无争论。工人阶级重新组织成为一支力量，以及后来从农村中大量召募生手来扩充工人队伍，这都是新的问题。因此，认为不需要有严格的劳动纪律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是愚蠢的。但是，这不同于把工会仅仅变成国家或党的附属品的思想。如果列宁的工会思想得到重视和实行的话，那么，局面就会民主得多，群众的创造作用也会大得多。

### 社会主义法制

同样，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权力的观点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斯大林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他曾被特别问及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判权、没有见证人和辩护人的审讯以及秘密法庭等问题。他在答复中用谈论紧张局势的办法进行全面的辩护，而回避了所提出的原则问题的细节。他进而讲到，从国内情况来看，局势是那样稳定，以至于“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是可以的”。<sup>①</sup>但是，国内的敌人与国外的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毫无疑问也是真实的。

因此，我坚持认为更加严酷和悲惨的时期是在这些年代里就打下基础的。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党变得更加集权化了。当强调批评时，总是规定批评必须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显然，党变得越来越带有行政色彩，而政治式的领导变得越来越少。工会本来能够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但却只限于发挥党的传送带的作用。国家机关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仍然充斥着官僚政治。民主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并没有为群众提供真正机会来发挥他们的创造作用。还有，如苏共决议所说的，随着战争危险的增长，给予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2页。

保安机关的权力越来越大，而民主却进一步受到侵犯。

到一九三四年十七大时，斯大林对反对派的提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说：“而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既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大概也没有什么要打击的了。大家都看得见，党的路线胜利了。”<sup>①</sup>他还提到出现“更大的偏差”的危险和存在着被打倒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复活的“沃壤”。但是，他继续说，我们不能说斗争已经结束。他进一步阐述说：“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一般领导’的空谈代替了实际的具体领导，各组织实行职能管理制而缺乏个人负责制，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对执行情况缺乏经常的检查，害怕自我批评，——这就是我们的困难的根源，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困难藏身的地方。”<sup>②</sup>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批评和分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证据。这些问题和困难被看成是可能出现的新倾向，而且也默认自我批评是行不通的。这是承认斯大林事实上已把党转化为一架管理机器，证明问题的症结主要是在组织和行政方面以及反倾向的斗争。

然而，这是社会主义获得巨大进步和社会出现巨大变化的时期。到一九三四年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荒谬化

斯大林时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荒谬化。如所预料，历史学蒙受的损害最大。哲学、科学、文化和法学也都受到影响。米高扬在二十大对此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代表大会使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发展得到巨大的新动力。

然而，除非苏联历史学家采取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态度来对待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24页。

整个斯大林时期(他们显然是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否则,对二十大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论述的了。

## 大规模镇压

到了苏联在取得更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之后的一九三九年十八大时,它也早已进入决议所描述的大规模镇压和犯罪时期了。

斯大林的报告(见《苏维埃国家的今天和明天》,莫斯科,1938年)谈到了曾造成“严重错误”的党的大清洗,他对此未作详细说明。但报告对党和国家的总发展没有进行真正的分析。他认为党比较接近下层组织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用组织手段来提拔干部的情况当时是存在的。党的教育当时是以斯大林的公式编写的《简明教程》(1938年9月出版)为基础的,它强调存在一大堆“倾向”。学习小组的方法被取消了,而教育只能集中通过报刊和讲座来进行。

然而,这正是二十大所揭露的震撼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规模镇压的时期。

这种情况发展到何种地步呢?我们不知道。只有苏共自己能够揭露镇压的真实规模,而历史则也越来越要求这样作。马克思主义是要讲真话的。不讲真话,就是让这块地盘向苏联的敌人敞开大门。不过,决议本身谈到了大规模镇压。法共史学家杰恩·埃莱斯登(Jean Elleinstein)写道:“关于镇压的精确决算表仍有待编制。逮捕的数量很大并株连受害者的家属……现在历史研究的状况要提供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论述大规模的镇压。苏联所公布的材料是非常零碎的。至于美国、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发表的报告则带有很深的偏见……—

九三〇年以前，劳改营数目不多，后来在农业集体化的条件下，它发展了。这种情况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签署的秘密通报中得到证实，该文件在斯摩棱斯克档案中可以查到。由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的大规模镇压，流放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其数达几百万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苏联史》，第二卷，巴黎，1973年，第244—245页）

赫鲁晓夫向代表大会作秘密报告是一次勇敢的行动。但这个报告是零散的，东拉西扯，缺少分析。揭露的事实当然几乎都是正确的，但揭出的事实却不多。不过，报告包含有贝利亚被捕后揭发出来的被害者给斯大林的重要信件，这就使那个时期的悲惨景象昭然若揭。

十七大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九十八人被捕和枪决。在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中，有一千一百零八名后来被捕，即占了代表中的大多数，他们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赫鲁晓夫谈到要继续审查可疑的案件，也谈到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已经为七千六百九十七人恢复了名誉，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死后恢复名誉的。这些人包括诸如科秀尔、鲁祖塔克、波斯蒂谢夫、科瑟耶夫和丘巴尔这样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他谈到把高加索的少数民族大批迁往苏联的其他地区的情况。他还提到战后的局势和现在已声名狼藉的“列宁格勒事件”，在此事件中，沃兹涅辛斯基（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库兹涅佐夫、罗焦诺夫、波普科夫和另外一些人丧命。

奇怪的是没有提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被捕和处决。然而，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说他是无罪的，他并且证实这样的报告，即纳粹情报机关把伪造的所谓图哈切夫斯基同德国最高统帅部有联系的“证据”交给贝奈斯总统，贝奈斯又把伪证转交给斯大林。有详细的证据说明，为了取得口供使用了酷刑。斯大林确曾为此辩



解,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也使用这种方法。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指导战争的叙述,除了说斯大林对纳粹实际发动进攻的日期全然无知以外,是靠不住的。不管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凡是可得到的证据都表明,他对战争总的领导和总的战略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他在最初的沉默和踌躇之后,在战争爆发时的许多演说,从方法和分析上来说都是非常出色的。当纳粹已逼近莫斯科大门的时候,他十一月七日出现在红场举行的大无畏的阅兵式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镇压的武器最初是用来整党和军队的领导的,它使国家在战争爆发时受到严重削弱。

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麦克米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引用苏联的官方材料,详细列出了军队、政府部门和重要工业部门被处决的五百个关键性人员的名单。他还引用了Z·T·塞迪克在二十二大的演说中的话。塞说,斯大林亲自签署了大约四万四千个死刑判决。很少有哪几个党受到过这种破坏性的打击。有些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在被打倒之列。

虽然这类事情的详细情况当时是不公开的,在战争前夕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种反常的情况,反映了党内和国内存在的忧虑。这表现在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日丹诺夫说,党内一些同志由于作自我批评而被剥夺权利并遭到迫害的情况是如此之多,以致人民都停止向中央委员会反映意见了。因此,决定取消大规模的清洗。他还谈到大规模清洗的“令人讨厌的特点”,原因是这种清洗具有搞运动的性质。但每件事都被颠倒了。他解释说,毫无根据地把人开除出党是那些不去清洗党的真正破坏者的两面派干的。开除所谓消极分子,结果使忠诚老实的人被当作破坏者。

他举出一个又一个人民被错误定为阶级敌人的事例，谈到要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发现敌人或其他情况的做法，谈到“与人民的敌人有联系”这个“时髦公式”。他甚至举出了这样的例子，即有个党员竟求助于一位精神病医生，搞到了这样一张证明：“(某某)同志按照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不适于充当阶级敌人的工具。”许多这样的事例在代表会上引起阵阵笑声，但这种笑声里隐藏着悲伤。

### 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是一个复杂的和难于解释的问题，因为得不到只有苏联同志才能够提供的事实。至于辩护，是不会有的，有的只是谴责。

处于法西斯主义威胁和战争迫在眉睫这种极端严重的形势下，限制民主和增加保安机关的权力是有理由的。希特勒实行军事进攻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加紧进行颠覆、侦察、捣乱和破坏等活动。这种办法首先软化了每一个受纳粹侵略的欧洲国家。不容置疑，希特勒也同样采取这种办法入侵苏联。

任何国家的安全机关都是国家权力中不容人民监督的一个部分，这种机关具有本身的一种内在力量，这也是事实。人们只需要看一看最近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揭露，这里有它们策划的许多秘密战争，有计划地推翻(别国)政府，包括推翻阿连德政府，投毒、暗杀和绑架事件，窃听、截邮和参、众议员的盗窃行为。至于英国的保安机关，也是十分稳秘，根本就谈不到人民监督。因为这些机关是在那里保护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苏联的保安机关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这些机关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取得专横的地位和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党——能够阻止大量的这种暴行或在初期阶段就予以取缔从而使局势得到控制的唯一力量，没有起到它应起

的作用。党实行这种控制的能力不仅仅因为斯大林及其亲信压制党、国家、工会的发展以及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监督而遭受严重的破坏。斯大林和保安机关的非法行为所牵涉的人远远超过了他们直接管理下的有关人员。在每个共和国和地区，相当多的党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被牵涉到了。唯一具有反对违法行为的潜力的机构(党)，被滥用来进行宣传 and 推动这个运动，造成人人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气氛。看来用不着怀疑的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列宁所重视的对保安机关实行民主监督的制度，事实上从未加以有效地运用或发展。

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是享有巨大威望的斯大林公开赞成这种非法运动。

### 蜕化的因素

苏维埃民主必须得到发展，但是斯大林的统治阻止、歪曲、妨碍这种发展，甚至在局部地区，完全改变了这种发展的方向。

陶里亚蒂对这些现象最早作出透彻的分析，他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新议论》，一九五六年五——六月号)一文中写道，最不武断的概括是，“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把个人权力逐渐凌驾于其性质本来是集体的民主机构之上，结果呢，官僚化的现象越来越多，破坏法制现象越来越多，社会机体的不同部位出现停滞状态，甚至发生局部的退化。”他坚持认为，苏联社会的大部分干部变成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懒汉，他们的批评精神和创造能力消失殆尽。

帝国主义大概已经渗入苏联的保安机关了。这种渗透是保安机关标准的工作方法。斯大林晚年大概受到了偏执癖性的折磨。

但是，我们必须着重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实际上，斯大林用与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格格不入的专横统治取代了依靠群众的力量，甚至取代了依靠党的力量。

现在已证实,为数众多的受害者是无辜的,秘密审判也是受人操纵的。这就提出了早期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开审讯和处决是否合法的问题。

除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外,他们被指控的罪行是以他们的口供为根据的。但是,尽管经过严厉的讯问,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还是否认同外国军事情报机关有任何联系。

他们被指控怀有所谓推翻政府的阴谋,其中心案件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一些将军要执行这种阴谋。由于后来查明对图哈切夫斯基和这些将军的控告是伪造的,并且在他们死后予以恢复名誉,因此,这个可能是这类审判中最重要的核心案件也就失败了。除非能进一步提出相反的证据,否则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只能被认为是清白无辜的。

当然,我们将再次听到,就象我们过去听到过的那样,这个悲剧性的问题是由于苏维埃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性质造成的。这些事件不但完全不是党和苏维埃民主制的性质的产物,而且是同它们背道而驰的,是对它们的根本原则的破坏。这些事件虽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没有也不能改变苏维埃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基础。

陶里亚蒂正确地认为,他所说的蜕化因素是局部存在的,也是严重的,在党和国家的上层比较显著,它在许多方面(技术、经济、文化、文学等)限制了民主生活、积极性、思想和行动。但是,他进而说明,这并不意味着“产生苏维埃社会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特点的并使苏维埃社会在性质上优越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苏维埃社会的基本特征毁灭了。”

苏共决议在谈到对共产党的事业和苏联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祸害”时争辩说,这“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本质”,或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关于这一点,决议赞同地引

用了陶里亚蒂的话。但在宣称发生的事情“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开展，对千百万人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发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的时候，它同陶里亚蒂关于“某些退化形式”的论点发生了严肃的争议。

这里，注意到马林科夫战后在十九大上详细地谈到他称之为党的缺点的问题，是有趣的。他指出党的机构存在的“某种危险”：越来越脱离群众，政治领导机关正在变成管理机关，用行政办法进行领导“削弱了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他说：“党的政治工作落后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在党内生活中”存在着不少不良的“而且往往是不健康的现象”；对于批评的限制，扼杀了主动性和损害了党的威信；在批评受到压制的时候，“就必然要产生象官僚主义腐化、甚至党的个别部门瓦解这样的丑恶现象”。

### 不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可能争辩说，在当时出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生硬的方法来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强行集体化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这种论点是不能接受的。不能把问题的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分开。

例如，如果让工会充分发挥列宁设想的创造性作用，工业化的进程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气氛下进行，即使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来进行，这个中央计划也会使群众的创造性和参加民主管理得到充分的鼓励。这不但不会限制发展的速度，而且会帮助工业化的进行，还有助于避免所造成的许多错误中的某些错误。最后的结果只会是更为积极的。

集体化是决不会在不产生大量的问题的情况下完成的。强行集体化中的过分行为——斯大林批准而他却不对此承担责任，是可能被制止的，从而使农村的紧张形势缓和一些，使阻力和屠宰牲畜的现象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严重的农业问题少一些。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展，由此而产生的社

会政治结构以及这个制度的各种机构的发展,在性质上都会不同。

也许,大规模镇压制度的最严重的方面,除了造成人类的悲剧以外,是它阻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使这种发展耽搁多年,并使这种发展变得缓慢和困难。

考虑到这一切,苏维埃社会的成就就更加非凡,这些成就使苏联在今天发展成为世界上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尽管群众的创造性活动确实受到限制,但是,没有群众的积极性和党的领导,这些成就是永远不会取得的。如果中央的领导过了头,这些既定的宏伟目标没有人民群众对它们的支持和信任以及不遗余力地为之奋斗,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这个时期也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和提倡其他首创精神的时期。正象决议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的辉煌胜利并不是自行到来的,“这种胜利的取得,是由于党和它的地方组织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

决议指出,甚至在斯大林时期就有反对这种“不良现象”的斗争。决议进一步宣称,有些时候,特别是战争时期,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曾受到大大的限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能够独立地作出决定,担负起各条战线的责任。

为了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民主进一步得到创造性的发展,马林科夫在十九大上所揭露的局部情况,是必须加以解决的。但在斯大林逝世前这样作显然是困难的,因为有大规模的镇压和斯大林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享有威望。斯大林逝世以后,那些感到需要变革的中央委员立刻起来斗争。这是苏维埃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需要许多年才能解决。

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是,苏维埃社会和苏联共产党具有根本性的内在力量,能够开始实行这种巨大的变革,不管别处的影响怎样,但不会在苏联境内引起广泛的社会动乱。

这不仅因为苏维埃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胜利,而且也

因为苏联人民广泛支持这种变革。

这种情况已在战争中显示出来，那时苏联人民以忘我的斗争和牺牲精神表明他们有决心来保卫他们的新社会秩序免遭法西斯的破坏。正是人民对苏维埃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巨大支持，才使这种根本变革得以实行。确实，苏维埃社会中的发展力量已经作好了实行这些变革的准备，但开始实行变革的时间是二十大。

### 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

二十大已经走上变革的道路。然而，一场大的斗争就在前头。在所有外国兄弟党的代表都没有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对个人崇拜作了严厉和直率的谴责。在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则采用一般性的措辞。看起来是要秘密进行谴责而且是逐步进行变革。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一场政治斗争正在党的领导中进行。关于个人崇拜的公开决议通过了，但不是代表大会上，而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中央委员会上，这是在各国共产党根据非常不充分的消息对此事件作出反应之后通过的。

贝利亚的镇压机器给拆毁了。斯大林逝世后就立即开始的大批释放无理监禁的无辜者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拨乱反正的工作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刑事法典改革中规定下来了。该法典规定，除经批准的法院外，任何机构均不得进行审讯和宣判。废除所谓的类推式的判决（即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人民的敌人”之类的说法。褫夺公民权利和驱逐出境也不再作为一种判决了，现在，这要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来作出决定。对于“恐怖行为”的定义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只包括谋杀国家领导人和外国的代表。

政治斗争是激烈的，也是长期的，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中央全会突出表明这种情况，这次会议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

和其他人作为“反党集团”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莫洛托夫及其支持者反对代表大会的一切重要建议，特别是有关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恢复法制、苏维埃民主、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平共处政策以及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那些建议。他们企图更换党的领导来保证作到这一点。莫洛托夫被击败了。主席团的成员是变动了，但是与莫洛托夫的愿望截然相反。原有的主席团成员只剩下六人，并从主席团候补委员中选出新的领导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九月，柯西金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支持这些变更。

一九五九年一、二月间召开的第二十一特别代表大会，当时主要的工作是通过七年计划，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打下物质和技术基础，以便能够向共产主义迈出决定性一步。设想在七年中工业总产量要增加百分之八十，同时，强调发展重工业，按实际标准计算，也计划要增加百分之四十。

一九五七年中央全会的各项决议获得赞同，但对莫洛托夫集团却没有进一步提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以很一般的措辞谈到苏维埃民主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地方机构在重大的国家事务上的职能、提高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和教育作用的重要性等。他要求全力加强工农联盟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友谊。

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它仍然没有改变那种矛盾心理，这在对待南斯拉夫态度上可以看出来。在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解散后，苏联同南斯拉夫的亲密关系已经恢复了。但是，南斯拉夫又一次被谴责为“修正主义者”。

### 斗争在继续

两年以后，在一九六一年举行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提出莫洛托夫反对派的问题，这表明了甚至在这个集团被开除



后斗争仍在激烈进行。赫鲁晓夫进一步对莫洛托夫及其支持者进行了详尽而辛辣的谴责。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二十大的决议通过同激烈的抵抗进行斗争才得到贯彻执行的，他们的这种立场“并非偶然，因为在大规模镇压的许多事件中，他们都负有个人责任。”他接着说，当党的领导开始改正错误时，莫洛托夫及其支持者转而进行公开进攻以期扭转局势，他们曾经要求召开主席团特别会议。朱可夫元帅因企图“使武装部队脱离党，反对党对苏联军队的领导”，也受到攻击。

赫鲁晓夫的报告，特别是他的答辩，当众证实了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的许多内容。

除了涉及七年计划外，他总结了在发展党的生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他断然宣称：“个人崇拜的时期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从恢复法制、结束大规模镇压制度的观点看，他的这种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而且是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但是，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证明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毫无疑问，定期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现已完全实现。他报告说，促进党内民主的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但他没有详加叙述。然而，他确实谈到，地方党组织的作用已经“加强”了，中央定期发出通报，并要求地方党扩大群众政治工作。他报告说有二百五十万新党员入党，同时透露有二十万人被开除出党——这是党内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他说，全国各级苏维埃中现有两百万名代表，此外还有两百万人自愿在常务委员会中工作。他强调了工会的重要性及其作为教育、行政和管理学校的作用在加强。正如他所指出的，工会关心劳动者是工会的首要职责；应该更广泛地吸收工会参加经济管理，要有更多的志愿工作者，而更少地依靠拿工资的干部。

因此，进步是有的，但后来的事情表明，进步是不够的，而且赫

鲁晓夫本人的领导方法遭到了非议。

通过了新党纲，我们倒是无须在本文对它进行分析。然而，纲领中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成为全民国家的概念。随着社会主义的建成，农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获得充分的发展，所有人都享有充分平等的选举权利，等等，因此，纲领宣布，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全民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这样的国家，它不是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整个社会的工具，全体人民的工具”。这是一个肯定会激起中国共产党的愤慨的声明，它随即指责苏联共产党是“修正主义”。

但是，一些陈旧的思想还长期存在。例如，二十二大决议提到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的成果时说：“苏联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竭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如盘石的团结……”。这一错误概念为一九六九年的世界会议所断然拒绝。

### 赫鲁晓夫以后的事态

五年之后的二十三大会标志着另一阶段的开始。在此两年之前，即一九六四年，陶里亚蒂发表了他的著名的《雅尔塔备忘录》，该文反映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态和仍然存在的分歧。有趣的是，《真理报》刊载了备忘录的全文。

陶里亚蒂认为，一九六〇年世界共产党会议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社会主义国家，即认为那里的一切事情都在正常进行，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写道，与此相反，“在真正的现实中必然出现的困难、矛盾和新的问题，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断地发生”。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他继续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总是觉得在领导集团中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人们

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也不知道分歧在哪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就当前的问题展开公开辩论，领导人也参加这种辩论，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有益的。”

然而，需要给予更大注意的是，“彻底改变斯大林所推行的限制和压制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统治方式”。陶里亚蒂看出存在着迟迟不前和阻力重重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已不复存在。他强调他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永远意味着工人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意味着工人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参与全部社会生活的管理。他继续说：“因此，我们欢迎一切坚持原则的立场，也欢迎表明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而不仅仅苏联是这样的一切事实。另一方面，有时候也发生一些事件，向我们显示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使整个运动受到损害。”

到了一九六六年二十三大大时，勃列日涅夫已取代了赫鲁晓夫担任了总书记。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虽然也提到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所犯的“主观”错误。勃列日涅夫继续提出创造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目标（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66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但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却没有达到，在农业方面，存在着增长率下降和不少困难，勃列日涅夫把这些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由于主观主义，造成某些错误的估计和过分的草率。”柯西金在他的报告中说，上次代表大会的某些指标，“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制订了较低的指标，尽管如此，目标仍然要使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农产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增加百分之三十。这一切还是要使苏联经济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关于更换赫鲁晓夫的问题，在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书中唯一正式提到的地方如下：“我们党的生活的一个重要阶段，可以从（一九六

四年)十月苏共中央全会看得出来,这次会议表达了党对于发展和恪守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的坚强决心。经济领域和党在组织方面的缺点,以及由于党、政府和经济机构的不合理的改组所造成的错误,正在十月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得到纠正。”

赫鲁晓夫的去职,由于本来就定下来了,因此,不论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过什么样的讨论,事先也未就有关问题展开任何公开讨论。这样,事情的发生有如晴天霹雳。陶里亚蒂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前撰述的这篇《雅尔塔备忘录》所要反映的也许正是领导阶层中存在的分裂,而《真理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是这些分歧的一种反映。

### 二十大路线的贯彻执行

即使如此,欧洲的许多党,包括我们党在内,对此表示关心,不仅关心撤销赫鲁晓夫职务的方法问题,而且关心这件事可能具有推翻二十大决议的含义。

在任何一个党中更换领导,即使在没有遇到重大危机的情况下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即使是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领导的变更,也只是稍作解释,甚至根本不作解释。

当然,二十三大无可置疑地表明将继续执行和发展二十大的总路线。除了考虑到他的年龄外,还逐渐透露出这样的情况,即赫鲁晓夫恶化了同中国的关系,在外交事务、经济改组和政府改组等方面,他都是独断专行的。关于后几个问题,后来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存在着分歧也透露出来了。

无论赫鲁晓夫个人犯有什么错误,共产党人将始终记住他在二十大上所起的历史作用。

据说,主要分歧是实行个人专断,还是恢复真正的集体领导。

二十三大在肯定坚持为和平而斗争的总路线后谈到这个问

题,它说,党委会“必须同基层组织保持经常联系,定期到基层组织考察”。勃列日涅夫在谈到赫鲁晓夫的方法时,要求“提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地方党组织的作用,充分相信党员群众,改进党内情况通报,以进一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巩固集体领导的原则。”他说,必须更加重视共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为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创造条件,以便使党组织能及时纠正任何党员背离党章的行为和制止工作中错误的蔓延。”会上还谈到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有必要举行“比苏共中央全会更为广泛的党代表的座谈会,讨论较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通过了决议,党可以象列宁在世时那样召开全党联席会议。

### 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

所以,人们会注意到,二十大以后的十年取得了进展,但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整个领导方法仍是非常集中的。

关于苏维埃,勃列日涅夫说,在遵循苏维埃“进一步民主化”的路线方面有所改进。必须给地方以较大程度的独立性来处理经济、财政和土地问题和领导地方工业。苏维埃的常务委员会必须变得更为主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报告工作必须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的既定惯例。”

因此,进步是有的,但仍有更多的事情要作。党政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党组织必须彻底消除对政府包办代替的现象……”。

关于工会,其成员现已增至八千万,强调工会要在完成国家计划,进行技术革新,负责“劳动人民的政治教育,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劳动报酬”,训练提高技术和确保安全、保健等方面发挥作用。

五年之后,一九七一年二十四大的立场是什么呢?尽管由于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而造成了紧张局势,但代表大会首先以提出争

取世界和平的大胆纲领而引人注目。

二十三大制定的五年计划大体上完成了。一九七〇年的国民收入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五十，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而不是计划增加的百分之三十。第九个五年计划又提出了一些宏大目标，工业生产计划增加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五，生活水平再提高百分之三十。这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中向前迈进的又一大步”。工人现在已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工人占一半以上。

勃列日涅夫说，党拥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名党员，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党内民主和列宁主义的准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定期举行的中央全会每季召开一次（四年内举行了十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周一次。他谈到地区和居住场所的充满生气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他说，中央委员会定期向地方党组织、积极分子和全体党员作了关于党工作的重要问题和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见《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71年）

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多数党委会都“很注意”批评意见。但勃列日涅夫接着说：“但同时，必须着重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都能从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某些领导人缺乏耐心，不懂方法，不善于仔细听取批评意见，不能正确对待批评。”

关于苏维埃，它现有两百万名代表和两千五百万名积极分子，其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地方苏维埃“在其权限内”领导辖区内工厂和经济组织的工作权力扩大了。代表们“现在定期同他们的选民会见”并向他们报告工作。据称，最高苏维埃对各部、局的工作以及对主要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的监督加强了。确定苏维埃代表的地位、权限和权利以及与他

们一起工作的干部的职责的有关法律正在制定出来。

至于工会，现有九千三百万名会员，报告说，“保护劳动人民的合法利益仍然是工会的一项基本任务”，包括加班加点、劳动、安全、休息等问题。报告说，“工会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总体制中，在吸收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从制定国家计划到管理每个企业的工作，包括生产、社会和个人活动等方面的重要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他呼吁党在工会中的工作要适当，“不要对各级工会组织进行琐碎的监督”。他的总结论是：“我们从人民群众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和内容……党所经常关心的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得到发展，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公民这个词的完全含义的公民，是一个与整个国家事业休戚相关并为这一事业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公民。党将继续坚持不渝地贯彻执行这一路线。”

## 未来的可能性

勃列日涅夫在这里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进程（“稳步地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唯一的合乎逻辑的见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有机体，每个新的阶段都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旧事物也还在影响着新事物。发展的路线不是自动产生的，它必须要经过讨论，在争辩中加以解决，而且犯错误的可能性往往就在这里。

具有先进的经济和科学的极其复杂的苏维埃社会，近二十年来已经越过了改正个人崇拜错误的阶段而进入积极发展的阶段。当然，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决定。但是，对苏联的每个朋友来说，这是一个使人密切关心的过程，也是同所有的人息息相关的。考虑到经济和社会一日千里的发展，考虑到苏联对和

平和民族解放事业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因素，这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里所涉及的是社会生活的状况。就其社会基础而论，这肯定不同于存在社会分化的资本主义的阶级政治和民主。就正常状况的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参与决策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官方把我们的政治制度说成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内阁政府”不是毫无道理的。内阁的内部工作，决策的中枢，都隐蔽在官方秘密中。工党各届政府的状况也是如此。工党的领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常规，即工党内阁不对工党会议负责，我们也看到现在的这种事实上联合的局面，即工党政府的统治得到保守党和大企业心照不宣的支持以对付工人运动。

但是，在另一方面，关于劳资关系法的斗争表明，议会外群众性的政治斗争却是能够改变决策的，并能成为影响内阁、议会和法院的一个巨大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划分阶级的社会里，英国人民在决定政策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靠进行冲突和斗争，而不是靠形式上参加决策。

在一个已然消灭了相互对抗的阶级并成为社会地位平等的社会里，对于政治生活进行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要以社会政治生活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为先决条件。

综览当前的状况，苏维埃、工会、群众团体、党、社会主义法制的作用的日益增长以及其它重大进步都起因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直接参与民主的这种发展，只有在有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样的社会根本前提才有可能。这种情况与英国和其它地方目前正展开的斗争恰成鲜明对照，这种斗争表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垄断所有制如何歪曲和限制民主制度，这种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争取产业民主的措施和某种程度的工人监督。

二十大后，变革的势头并不一直是持续不断的。在普遍取得



进步情况下,有时也有过某些延缓,甚至倒退。列宁说过没有充分了解情况就不会有民主。民主的最充分的发展要求群众参加制定和执行政策。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党内要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它包含有可能在讨论中表达各种各样的意见、不同的估计和方案以及相反的观点。

### 群众的参与

民主是多方面的,除了党参加外,也要让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非党群众参加,让社会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会参加。党的领导作用并不是说不要群众起作用。相反,没有广大群众积极民主地参加社会生活,党就不能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要做到让广大群众参加,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就必须听取群众的意见,因为,不这样怎么能有充分的作用呢?

依我看来,如前所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主要的问题是使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加。

发展的主要路线通常表现为国家的集中领导同最充分地发扬民主和苏联人民通过他们的组织和社会生活进一步参与作决定、制订政策以及行政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目前正在进行关于各项法律草案、经济计划和其他重大问题的全国性的讨论;对于经济管理的形式、权力下放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已经进行并且还要进行广泛的讨论;现在出版了一种大型的专门性的苏维埃定期刊物,其内容几乎包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从组织制度上看,现在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只能决定范围极为广泛的决策问题。在代表大会上似乎应该对提交代表大会的各种主要问题进行比较广泛的讨论。制定较短期的实际方针显然属于每季度召开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和每周召开一次的政治局会议的职权范围。因此,从党的角度上看,民主制的进一步

发展仍然要发挥从基层到中央的更大程度的相互作用。

除了别的工作，领导还要在一定情况下对各种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问题作出抉择。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发生意见分歧并做出不同的估计。毫无疑问，在苏联领导层里，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依据多数票或一致的意见做出决定。完全可以象对政策的总目标进行公开讨论一样，对这些抉择进行更多的公开的充分讨论。领导的更迭本来是民主生活的一种正常现象，而目前出现的领导更迭，不管是由于政策的执行、工作的需要还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如前所述，无论在党内作了何种程度的解释，但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做过公开的说明。人们懂得党非常重视本身的团结，也了解党在目标上的一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难以设想，当前的这种工作方法能够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鉴于苏联人民具有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政治觉悟，采取更公开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无疑将会丰富苏维埃政治生活的内容。

### **党、群众组织、国家**

对党提出的政策进行范围更广的评审，肯定会出现党的原建议没有预见到的设想和补充。非党群众团体，特别是工会进一步把它们的生活发展到这种程度，它们就能在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有关重大问题的法令常常是以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名义制定的，这种情况似乎成了符合章程的惯例。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他是直接参与外交谈判和签定条约的。但是，对于这种状况，对于党政的相对职能，我们好象还没有现成的理论根据。完全有必要进一步改变目前这样的党政关系的发展。

其他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引起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社会地位平等的社会，但同时却存在着利益的

矛盾和冲突，虽然这些矛盾和冲突不属于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熟悉的那种标准式的阶级矛盾的类型。在制定计划和施政方面也可能犯错误，从而使党和政府置于与群众或一部分群众相冲突的地位。

例如，在波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例，在那里由于生活水平的恶化，在一九七〇年发生了严重的骚动，从而导致政府和党的变动。接着，我们得知二十大后曾起过那样进步作用的哥穆尔卡本人在作出决定和进行领导时，也陷于专横武断，使用浓厚的家长式的方法。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社会在破坏它固有的民主职能时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 对不同政见的处理

另一个不同的实例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问题是因处理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前总书记而出现的。我并不打算再次对一九六八年八月当杜布切克在中央委员会里居于多数地位时发生的事件发表声明。现在已被开除出党的杜布切克，姑且不论他所坚持的原来的观点正确与否，但是目前却没有发表这些意见的公开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他的立场做了公开驳斥，这个文件的译文也已分发给外国共产党，但看不出任何有意义的材料。外国共产党人不能得到关于他的观点的文本，只有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上看到，而是否真实又很难断定。

最近一个时期的情况表明已经打算采取行政手段了。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分歧应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我们曾建议对那些主要因一九六八年事件所引起的，以所谓非法方式发表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政治见解而于一九七二年被监禁的人实行大赦。我们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的公开声明中申明：“一九七二年举

行这些审判时，我们就说过：问题不仅在于有权坚持不同的意见，而且还应有公开发表这些意见的合法手段。”

这个意见遭到了拒绝，因此，今天这个问题仍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是真诚的不打算再搞审判了。可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发表不同意见的合法权利仍然没有被承认。如果拒绝我们建议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这关系到对不同政见的处理问题。苏维埃宪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从这点上来说，在苏维埃社会里产生不同政见问题，这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认为，即使有这样的問題也是由于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必须着重指出，试图把赫尔辛基协定看作是思想上趋于同一或思想上“解除武装”的表现，那是胡说八道。思想冲突是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客观现实的反映，也是作为资本主义的阶级分野和阶级剥削的产物——阶级斗争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社会观念，是积极地为维护资本主义效劳的。官方政策与和平共处范围内的缓和是作为取代战争解决分歧的手段，它改变不了上述这些事实。

持不同政见可能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其中之一。列宁指出，思想在产生它的客观社会因素消灭以后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

但是，有些分歧可能不是由于帝国主义思想引起的，而且不同政见的用意可能不同。有些人支持在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体制内实行变革。有些过去经常支持变革的人，在遭到镇压后终而全然转化为反对派。此外，还有一些反对整个制度的人。给他们统统戴上持不同政见者的帽子，不许他们以任何合法手段发表意见，会使原来支持者感到失望。发表不同意见不仅仅是一个安全

阔。除非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意见得到表达，否则思想就会僵化。马克思主义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通过讨论和说服来使人民信服。

在苏联，在社会生活中起这样大作用的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十月革命结束了沙皇的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苏联在以色列国的建立中起了主导作用。苏联有一个单独的犹太人自治共和国。今天存在的问题仅仅影响这个国家多数犹太居民中的少数。问题的根子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斯大林过去对犹太领导人所犯的罪行（这是他对其他许多苏联人民所犯罪行的一部分）；希特勒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对犹太人产生的可怕的影响；对以色列国日益增加的关心。尽管对反犹主义作了正式的谴责，但反犹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人们有理由关心那些根据苏联法律似乎不会被控告而罹罪的人们。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残暴的侵略战争，以及对犹太人进行相当粗暴的宣传，不把犹太复国主义这种反动的政治思想和犹太宗教区别开来，这些情况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希望前往以色列的人的烦恼是无济于事的，不管谁对此应负责任，但苏联批准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前往以色列的数字是不断增加的，而且，现在又出现了对于以色列感到失望而要重返苏联的倒流问题。

## 文化问题

苏联比任何其他社会都要重视艺术的培育。在音乐领域内，苏联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世界闻名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时代遭受到官方粗暴的批评。不论这种批评是否有道理，他的第五交响曲被加上了《一个苏联艺术家对正确批评的回答》的副标题。但是，既然通情达理的批评是艺术家生活的一部

分,那么,对于音乐形式何必要有一条正式的党和政府的强制路线呢?绘画艺术也是一样,现代各种新式流派(或反动的,取决于个人的见解)似乎都不会得到官方的鼓励。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无视这些流派是在革命后的时期里盛行起来的。如果艺术作品得不到展出,它就没法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实际做法是大不相同的。希望苏联最近举办的两次所谓违反准则的绘画展览是政策上的一个变化。这种做法也应适用于雕刻艺术。人们很想知道官方的艺术家和作家协会的态度使这个问题加深到了什么程度?

牵涉到作家和剧作家的最主要的问题,如现在的情况那样,在很多情况下是同社会和政治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西方,如C·P·斯诺所说,大量具有重要的社会和艺术价值的苏联作品遭到忽视。为了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所谓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身上。至于他们的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属于通情达理的文学批评的范围。但是在考虑到他们的著作的社会和政治内容时,问题发生了,因为全部出版机关都属于社会所有,国家可以实行有效的和合法的审查。在这方面,我们要谈一下对作家的审讯问题,例如对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讯,我党对此是提出过批评意见的。

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批判性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大量产生,其中有的出版了(如杜金采夫和索尔仁尼琴),有的没有出版。在赫鲁晓夫任总书记时,出版了好几种这类的戏剧和小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斯大林等辩护的著作也出版了。在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后,这种批判性的作品出版少了。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新世界》、《文学报》和《真理报》上的讨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谴责了两个方面的过火作法。他说:苏联的现实是较为复杂的。党决不能同企图削弱意识形态和玷污苏联社会的行动妥协。“假如一个作家诋毁苏联

现实并在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敌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帮助他们，他应该得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群众的蔑视。”最公正的评论是指出问题所在。但为了发表或褒或贬的意见，就得要使有争论的作品让公众知道。

有关的作家不仅遭到公众的蔑视，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著作在国外而不是在苏联出版而遭到审讯和判罪。根据涉及这些问题的刑法条款，他们被判犯有诽谤苏维埃国家的罪行。这项法律是否应该用于这些案件，是否有必要存在，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个人的诋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作家不能在苏联发表作品，而在国外发表作品则是一种犯罪；如果作品被判定是诽谤性的，或者秘密出版从而触犯了法律，恶性循环就会由此发生。看来采取起诉的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苏联当局好象也越来越不打算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放宽一些出版的范围，或者象匈牙利那样采取自行出版的办法呢？

### 对少数意见的处理

在没有发表批评意见的合法途径的情况下对官方政策提出直接批评，如象批评对捷克采取的政策，问题就会进一步复杂化。考虑到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和各国共产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重大分歧，倘若在苏联竟毫无批评可言，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一九六九年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会议期间，苏联报刊公正而准确地发表了包括我们党在内的那些党对一九六八年八月事件的批评意见。苏联社会并未由于这样做而出现困难。如果苏联报刊发表苏联公民的批评意见，这也决不会动摇苏联社会。安德罗波夫在最近的一个报告中（见1975年6月10日新闻总署公报）说：“其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任何苏联公民，充分地感到我们有着广泛的民主自由。当这些利益在某些特殊情况上未能一致时，

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整个社会、整个人民的利益应居于优先地位，而且我们相信这个原则是绝对公正的。”是应该居于优先地位，但是，如果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保留这些观点（这是无法阻止的），但却不能公开发表这些观点，这能说是公正的吗？

当出现了某些批评者自命为苏联“公民权”的捍卫者的时候，例如萨哈罗夫就公开地而且经常地向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发表声明，于是问题就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了。另外一些同样持有批评意见的人却强烈地反对这个运动。

说到萨哈罗夫和那些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的政治观点，他们正发展到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批评，特别是反对缓和政策。例如尼古拉斯·弗雷泽在《泰晤士报》上（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谈到不久就要出版的萨哈罗夫的著作《我的国家与世界》时写道：他（萨哈罗夫）“批评美国和西方世界目光短浅而自私”，萨哈罗夫说这可能造成在印度支那的“崩溃”。他说，如果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阻止把武器运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萨哈罗夫所提到的越南的“悲剧”就会得以制止。这是一个荒谬的观点。越南打败美国是民族解放运动和自由事业的巨大进步。我们再引弗雷泽的话，他说，萨哈罗夫“为西方对本身的制度显然缺乏信心而感到遗憾”，萨哈罗夫还支持参议员杰克逊提出的旨在推翻同赫尔辛基会议有关的贸易法案的修正案。

《泰晤士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了在纽约定居的三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致萨哈罗夫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说，萨哈罗夫是天真的，对西方的看法太理想化了，忽视它的严重问题，任何一个美国工人都不会同意他对美国所作的叙述。

索尔仁尼琴的反苏观点变得如此强烈以致于他最近在赴美旅行中拒绝会见福特总统，因为美国参加了赫尔辛基会议。但是他



与声名狼藉的乔治·米尼——反对欧洲工会制度中出现的一切进步的和一体化的趋向的工会头子，都具有共同的和志趣相投的政治见解。

我们党曾一再主张对这些观点应该采取政治方法处理，不应该采取法律行动，驱逐出境，或关入精神病院。在反驳这些错误的和违反和平与缓和利益的观点方面，任何共产党人都不会感到有丝毫困难，苏联共产党人尤其是这样。这些观点不会从比世界任何其他人民遭受更大战争损害的苏联人民那里得到的任何一点支持。这些批评者将会受到人民蔑视，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当然，帝国主义会利用这样一些观点。它们现在就是这样干的。采取不同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是苏联社会有力量的标志。苏联社会目前正在解决比这些少数人的观点更大、更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问题。不过恰当地处理少数人意见本身也是一个民主发展的问题。

##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国际反应

在估量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国际反应时，我们不仅必须考查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而且必须考查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预料的那样，帝国主义者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莫不兴高采烈，彻底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大国满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陷于四分五裂。他们从来没有作过比这更严重的错误估计了。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要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必须把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国际代表大会作为起点。这次会议是在

法西斯主义横行和世界大战的危险迫在眉睫，而且很多党发展为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的群众性组织的背景下举行的。

季米特洛夫的历史性报告和随后代表大会的决议具有三重意义。它们结束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者说成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共产国际的宗派主义时期，同时它们还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人民战线策略的发展，为各国党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并在实践上拒绝对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加以区别的策略给西欧各国党和工人阶级带来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由于经济危机和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各国党在斗争中认识到在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需要实现联合，并加速实现联合。在法国，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导致人民阵线的胜利；在西班牙，在反佛朗哥的战斗中实现了人民的团结，并组成国际纵队。

季米特洛夫是一个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在国会纵火案审讯中，由于他的英勇答辩和国际压力，使他摆脱了希特勒的绞刑吏的魔爪。他在一九三四年筹备这次代表大会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共运中的这些新的事态。在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上，季米特洛夫尖锐地提出必须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概念，要求采取实际步骤以实现工人阶级和工会团结。在一九三五年代表大会上，经过充分的努力，这些思想使各国党都采取了人民阵线的策略。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对于“处于千变万化条件下”的六十五个共产国际支部的所有问题，现在莫斯科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领导了，共产国际应集中力量解决各种基本问题，并应“牺牲共产国际执委会这架庞杂的官僚机器”以加强完全有应付能力的各国共产党的工作。

在这个广泛的路线最终被采纳之前，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裂（见《季米特洛夫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文

件》，英共《今日马克思主义》月刊，1972年7月号和詹姆斯·柯鲁格曼：《季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第七次国际代表大会》，载《今日马克思主义》月刊，1972年7—8月号）。

俄国人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分裂了。要说明辩论开始时斯大林站在哪一边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完全赞成代表大会的立场，他出席了开幕式，不过没有讲话。

### 共产国际解散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党之间的一切实际联系中断了。各党在战争中开展自己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了。宣布采取这个措施的声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宣称，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指导中心已不再是有用的了，由于各国国内和国际的关系日益复杂，“任何一种国际中心在解决每个单独国家活动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

在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时，声明提到“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道路千差万别，它们的特点不同，甚至它们的社会制度也是有差别的，它们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不同，最后，各国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各不相同”。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两个重大事态。出现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而不是过去仅有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九四五年越南和北朝鲜赢得了社会主义，然后是欧洲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和古巴在较晚些时候，取得了社会革命的胜利。各国共产党已经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登上舞台，很多党获得了新的威望和众多的党员，虽然没有指导中心，但是它们在总的国际团结下而联合起

来。这些发展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困难，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新的问题，也给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带来困难。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把时针拨转回去的企图，特别是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在欧洲使社会主义倒退到杜勒斯“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发展联防和经济合作是迫切需要的。

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每个国家分别实行不同的政策。但这个问题对二十大前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极为复杂的。斯大林以及与他合作的那些人，通过苏联保安机关，把当时在苏联盛行的那种非法的镇压方法推行到这些国家。苏联发展经济方面的错误实际上也成了苏联发展经济的“样板”而加以推行。

### **共产党情报局与南斯拉夫**

一九四七年短命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了，它在一段时期内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国与意大利这两个大党组合在一起。陶里亚蒂说共产党情报局（除出版一种期刊外）只做了两件事。第一种，陶里亚蒂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为整个工人运动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方向。第二件，他认为是糟糕的，就是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他说，除最初的会议外，共产党情报局从来没有讨论过意大利的政策。对于法共也大致如此。这两个党象共产党情报局以外的其他党一样都自行制定政策。

同南斯拉夫的冲突起因于南斯拉夫主张它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立权力。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因为在本国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而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但是，苏联没有用武装干涉来反对铁托。我们党和其他党一起，错误地支持了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

主张单独发展路线的斗争在继续进行。但是，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审判中，那些遭到控告的党的杰出的领导人被诬陷犯有与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有联系的叛国罪。很多人遭到监禁，另一些人被处决。

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也很紧张。二十大的揭露，几乎使除南斯拉夫外的所有东欧国家都发生了大震动，从各种暴动一直到匈牙利这个具有深厚的法西斯背景的国家发生未遂的反革命事件。苏联最初几经踌躇，后来为了帮助匈牙利而实行武装军事干涉，当时苏联的这种行动受到了中国和几乎所有共产党的支持。

### 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影响

在不同的国家里，镇压的程度，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歪曲，对二三流人物的个人崇拜的情况，都是有所不同的。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为了清除斯大林的有害的传统，在领导和民主程序上的深刻的变化骤然出现。哥穆尔卡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成了波兰的第一书记。卡达尔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掌握了匈牙利的领导权。在别的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没有发生过审讯也没有杀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改革则是逐步进行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直到一九六八年才真正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为某些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武装干涉所制止。这次干涉受到我们党和包括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内的其他党的谴责。公审的牺牲者，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柯斯托夫和其他人在死后恢复了名誉，在狱中监禁的那些人也被释放出来。在斯兰斯基审判中的十四个被告全部被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恢复名誉，但是主要被告中的五人尚未被党恢复名誉。人们记得胡萨克本人就是不公正地遭到控告和监禁的。

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声明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概述：“建立新(社会主义)制度

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遭遇过不少困难和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明显的错误，其中就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所犯的错误。”

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就签订经济合作与相互援助的新协定进行了系统的谈判，在谈判中重申了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签订了允许苏联在战后形势下驻军的各种条约。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中国建立的混合公司的体系解散了。

### 一九五七年国际会议

在帝国主义充分地利用这种形势的情况下，鉴于冷战的日益加深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

各国共产党在俄国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即一九五七年首次在莫斯科聚会，这次会议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单独举行的当时包括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党在内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重要宣言。其他国家的党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但是，所有六十四个国家召开了会议共同通过了一项争取世界和平的呼吁书。

这个宣言概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和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

它遵循了二十大提出的许多方针：关于防止世界大战和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可能性，以及不经过内战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它又说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并且强调了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殖民战争。它列举了已经出现的“强大”的力量，并认为，只要这些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就能够阻止战争的

爆发。

宣言还说，关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使之跟上时代”，并说，这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以及万隆会议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相符合的。

它强调，这十二个党完全同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它号召工人阶级联合，号召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进行合作。它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同时还强调了互利和联合。

在评论国际共产主义所经受的很多考验时，宣言在结束时说，同危机之说相反：“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发展和巩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最近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成功，有力地说明了它们的队伍的团结一致，说明了它们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实。”

这个论断虽然从后来的事态来看过分乐观，可是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所采用方法是错误的。我们代表我们的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党单独举行会议并通过这个纲领性的宣言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声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能有两个同盟。我们主张，将来再召开这类会议和通过声明，必须使所有的党平等地参加准备和做出决定。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世界会议正是采取这个方法并根据这个精神召开和准备的。

在随后通过的支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基本路线的一个决议中，我党执行委员会指出：“这些恰恰是在我们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它显示我们党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观点本质上的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在关于各党决定自己的发展、纲领、政策和策略的自主性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虽然事实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辟了发展的新道路，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包括我党在内的大多数党提出了建立苏维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

### 新的纲领性立场

战后，包括意大利、法国和我们党在内的西欧各国党提出了新的纲领性立场。在二十大前，我们党于一九五一年通过了题为《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纲领，作为发展的基本路线，这标志着我们对于在英国的政治条件下前进到社会主义的看法同战前相比有了决定性的转变。

《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怎样走到社会主义的意见。它申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宣布英帝国中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英国争取民族独立，特别是摆脱美国控制的目标，并宣布国家主权并没有过时。它号召击败劳工运动中的右翼，号召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大多数人民组成反垄断同盟。它提出关于通过斗争创立议会多数和决心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府这个新的重要概念。它宣告“英国将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正如俄国人民按照受到他们的历史条件和沙皇统治背景所制约的苏维埃道路取得政权一样……因此英国共产党宣布英国人民可以把资本主义民主改造成真正的人民民主，把议会这个英国为争取民主而进行历史性斗争的产物改造成反映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民主工具。”它认识到资本主义甚至会采用暴力来抵抗这个人民的民主的决定，也认识到人民和政府必须准备对这些企图进行坚决的回击。



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个代表与过去决裂的纲领。还应该注意，斯大林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发表的使人难忘的演说中，在感谢各国共产党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它的早期所给予的支持，并指出没有苏维埃共和国各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就没有保证时，鼓励各国共产党在它们各自的国家里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

基于上述事实，二十大关于这些重要问题的决议在西欧各国党内受到了特别的赞同，那就是可以理解的。

从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西欧各国党的纲领都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

自从一九五一年那个历史性的起点以来，我们总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我们力求通过民主的政治斗争过渡到社会主义。其中不可缺少的是：所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要在劳工运动中实行团结，并击败运动中的右翼势力。我们的目的是要赢得劳工运动中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多数，以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我们一向强调议会行动和议会外行动这两个方面。对于民主自由的威胁来自右翼，而不是来自左翼。为了充分发扬民主，社会主义是必需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大工业和大商业、银行和地产的公有制，而且要求充分和持久发扬民主。我们的目的是在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要能保证人身自由、多党制、工会独立、宗教自由以及研究、文化、艺术和学术活动的自由。

### **我们党对二十大的反响**

对于二十大揭露的大规模镇压和犯罪，我们党内部的反响象大多数其他党一样是痛苦而又感到为难。数以千计的党员离党。我们在三十年代就接受了苏联的主张，轻信公审，不了解大规模镇压的事实。我们理所当然地欢迎伟大的进步，并表示与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同仇敌忾，可同时却很少对缺点提出批评。

回顾以往，不难看出我们是错了。我党执行委员会关于二十大教训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公开地承认了我们的错误并引以为憾，虽然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我们保护了明知是错误的那种错误政策。”决议还说：“将来必须更加严格地审查各项政策，不论它们来自何方。”但这是立足于国际团结的巩固基础之上的。

因为我们党具有工人阶级的民主基础，而且深受我国劳工运动的传统和习惯的影响，所以，从我们所考查的意义上来说，在我们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我们的党主要是以国内的斗争为基础的。二十大的成果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我们的纲领，指定了一个负责检查党内民主的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我们的民主生活。

我们继续在代表大会上和在全党内进行更为公开的讨论，但同时则保持民主集中制的要点，即一旦民主地作出关于政策决定，全党就予以执行。我们继续为实现争取左翼团结的重要战略进行更有力的战斗，并大力推进我们党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

### 一九六〇年世界会议

一九六〇年举行了真正的战后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各国党会议。八十一个党出席了会议，重要缺席者是南斯拉夫。会议的准备是民主的。

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声明，全面考察了国际形势、战争的危险和美帝国主义的作用；殖民主义的崩溃和民族解放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统一性和形式。关于各国共产党的部分比较简短，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只有少数几段笼统的论述。在缓和、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不同形式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上，立场相对保持不变。一九五七年宣言曾强调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新的声明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南斯拉夫的立场被谴责为修正主义。当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中，关于何者为修正主义，何者为教条主义，各党的意见的分歧可能是很大的。

在这次会议上围绕着关键条文的拟定，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支持下的中国共产党在起草会议上曾进行了一场相当剧烈的斗争。中国的同意是勉强的，以后不久中共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在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的问题上却走了另一条道路。结果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分裂，这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不仅仅是与苏共的分歧，而且也是与绝大多数党的分歧。

但是，由此开始，策略上的尖锐分歧所引起的问题被国家之间的分歧（边界、核武器等等）进一步加深了。毫无疑问，人民中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它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并且有过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的情况。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这些问题变成了个人之争。但是，在中国方面却把问题升级到无根据地和非马克思主义地攻击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对此，不幸的是某些苏共领导人也同样加以反击。此外，中国对欧洲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没有一个欧洲的共产党不反对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诸如此类的动乱明显地反映了中国领导内部的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们自己过去代表大会关于和平共处的决议的背离。解决这些尖锐的问题将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由于双方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谈判最终一定会举行的。至于党的关系和政策问题，必须而且也只能通过相互协商加以解决。一部分党将另一部分党“革出教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一九六九年世界会议

一九六九年各国党世界会议使各党之间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由于同中国的决裂，由于一九六八年某些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各国党进一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实体，而且在本国的群众政治斗争中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问题更复杂了。这次会议也是在各国党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民主地进行准备的。主要文件限定在阐明“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这个范围内。它包括四个部分：帝国主义、反帝力量、争取统一行动、共产党和工人党。

无疑，一九六九年会议在促进团结、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特别是支持越南等方面再一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国党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得到加强了。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不是所有的党都出席了会议。重要的缺席者有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和南斯拉夫，而且由于不同的原因，古巴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有那么一些党，它们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没有写到声明中去。还有另外一些党，包括我们党在内，没有这样做。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有不同看法。但声明正确地表达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的一致同意的原则。以往对南斯拉夫的那种谴责消失了。

关于各国党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声明要求把最大限度的团结作为团结一切反帝力量的最重要因素。声明进而指出，各国党之间的关系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团结一致和相互支持、尊重独立和平等以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基础的。声明还说，严格地遵循这些原则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所有的党享有同等的权利”。由于不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为了有效地执

行它们所面临的任务，自愿地协调各国党的行动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声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

因为每个党是独立自主的，而且只有各自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决定政策，所以，不能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普遍用到各国党的关系上。协议只能按照协商一致的办法取得，不能采用表决。

我们对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总的说来我们欢迎会议声明，我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文件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关系的原则，是可以接受的，但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些原则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会议议程对文件的主要目的所作的规定。而且，如果这样的一些问题要在文件中论及，那么它们就不应仅限于一个原则声明，而应包含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原则，从而能够得以深入地讨论在这方面已经发生的各种问题。”

### **摆在面前的伟大任务**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的加强归根到底取决于各个独立自主的政党在本国的工作和实际成效。同样，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而且必须是国际主义的。没有一个党强大到不需要同所有的党实行同志式的团结。

伟大的任务摆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不仅要制止战争，而且要在本国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

回顾过去，不论二十大带来了什么样的考验和苦难，但对我们大家来说，它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转折点，对于英雄的苏联人民来说，更是如此。他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甚至现在他们仍然遭受到本国

制度的暂存的缺陷的损害。苏联人民和他们的党——苏联共产党，有决心和力量勇敢地揭露和根除这些缺陷，是永远值得大大赞扬的。

# 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 及其经验教训

[印]班纳吉著  
梅毕明编译

1967年，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的影响下，印度其他邦的一些地区也相继开展了规模不一、程度不同的农民斗争，在加尔各答还出现过城市游击活动。领导这些斗争的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内以查鲁·马宗达为首的一批中下层干部。马宗达等人由于与该党领导存在意见分歧，后来退出了印共(马)，并在1969年另组新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以纳萨尔巴里为发源地的印度农民斗争，在印度国内外曾经轰动一时，被人们称为“纳萨尔巴里运动”。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纳萨尔巴里运动接连遭受挫折，引起印共(马列)党内发生严重意见分歧，最后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72年，各地斗争相继失败，运动领导人先后入狱，马宗达本人也被捕遇害，纳萨尔巴里运动于是逐渐沉寂下去。

1984年新德里出版的苏曼塔·班纳吉所著《印度酝酿中的革命》一书(30多万字)，是系统地介绍和评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专著。作者班纳吉为了写成此书，曾经接触了印共(马列)的一些领导人和干部，并且深入到

农村去，与贫农和无地农民生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他搜集了与这一运动有关的一些宝贵的内部文件和资料，耳闻目睹了一些事件。因此，本书是有关这一运动的具有较多第一手材料的一部权威性著作。作者在书中分析了纳萨尔巴里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概述了运动由兴起、发展到失败以及在此期间印共（马列）由成立到分裂的全过程，比较客观地评价了运动的成败，并展望了斗争的前景。作者生于1936年，1962年至1973年间，曾任印度《政治家报》记者。

## 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兴起，决非偶然。1966至1967年期间，不满情绪遍及整个印度农村。在各家报社，关于农民长期营养不良、饿死、因不堪忍受饥饿而自杀、抢劫粮仓之类消息纷至沓来。1966年夏，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向新闻记者宣布：中央邦、安得拉、奥里萨、拉贾斯坦、马哈拉施特拉、旁遮普等邦的117个县的4,660万人受到了“匮乏状况”的影响。1967年初，印度全国缺粮一千万吨。当年4月，比哈尔邦政府被迫宣布该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为“饥荒区”。印度独立以来，一个邦政府宣布本邦出现饥荒现象，这还是第一次。接着，在同年8月，中央邦政府也宣布该邦18个县为“饥荒区”。可见，当时农村形势非常严重。

六十年代中期，印度城市的经济状况在许多方面与农村差不多。由于粮食减产，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粮价暴涨。对工业品的需求减少，消费品市场萎缩。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量下降，又导致火车车皮、卡车、轮胎等交通运输工业的衰退。工业萧条和物价上涨，严重地打击了城市的工人和中等阶级。在西孟加拉邦，仅1967



年第一季度就有 2 万多工人因为工厂倒闭和解雇而失业。主要由第三产业中的白领雇员组成的城市中等阶级，也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他们甚至不得不节衣缩食。对中等阶级中的大批青年学生来说，大学毕业意味着失业。1966 年底，仅在职业介绍所登记求职的失业青年就有 91.7 万人。难怪，在六十年代，印度大学生经常呼喊人们所熟悉的一个口号：“我们要工作，不要文凭！”对现状不满的青年学生，至少有一部分人真心实意地希望改变现行制度。六十年代末，在西孟加拉等邦的城市中，青年学生成为印共（马列）运动的开路先锋，原因即在于此。当时，许多学生放弃了学业，到农村去宣传土地革命的思想，并积极参加农民武装游击队。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执政的国大党在政治上也面临挑战。1967 年初，在印度第四次大选中，国大党在一些邦内遭到了挫折。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国大党的方向变化，这也鼓舞了贫农和无地农民的斗志。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马宗达等人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以及其他邦的一些地方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早在六十年代初，当印度共产党组织上尚未分裂时，马宗达就开始在西孟加拉邦北部他的家乡宣传他的理论观点。他强调必须向农民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必须“建立一个革命党”。1964 年印共组织上分裂、印共（马）成立以后，马宗达又坚持要求他的追随者反对“修正主义倾向”。马宗达这个时期的观点，反映在他 1965 至 1967 年期间写的“八个重要文件”中。

在马宗达看来，当时党内“修正主义倾向”的首要表现是：把实现某些经济要求的工会和农会工作看成是党的唯一工作，而忘记了“夺取政权”这一主要政治目的。马宗达说，他并不反对搞工会和农会工作，不反对公开合法的群众运动。他说：“争取实现经济

要求的运动是决不会错的”。但是，他强调指出：如果“将这些运动引向经济主义，那就是犯罪”，如果“宣传经济运动会自动变成为政治斗争，也是犯罪”。他认为，当前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是搜集枪支、开展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

关于“夺取政权”，马宗达认为他的观点有别于“修正主义者的概念”。他说，“修正主义者”断言，只有通过逐步发展经济运动，才能夺取中央政权；而他则强调“地区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为此，他提到了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的著作，提到了中国革命道路，也提到了印度那加起义者把他们的解放区保持了多年的事实。他认为：在农村中由贫农和无地农民实行地区性夺取政权，然后逐步扩展这些地区，最后包围城市，这就是印度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唯道路。

可能是在1965年，印共(马)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一些派别，试图与马宗达取得联系。马宗达提出在下列最低共同点的基础上同这些派别建立合作关系：(一)承认毛泽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二)同意印度每一个角落都存在革命形势的观点；(三)同意地区性夺取政权是印度革命前进的道路；(四)同意游击战争是推动印度革命的唯一方式。可见，1967年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并不是一次自发的斗争，而是经过了思想上和策略上多年准备的产物。当1967年运动在纳萨尔巴里爆发的时候，“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触发纳萨尔巴里起义的直接原因是：1967年3月2日，在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后，印共(马)同其他非国大党的党派组织了邦联合阵线政府。西孟加拉邦同印度其他邦一样，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邦联合阵线政府成立后，曾经答应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土地改革问题。然而，由于地主阶级的百般阻挠，印共(马)在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诺言未能实现。马宗达抨击邦政府无所作为。他

指出，不摧毁国家机器和封建阶级，土地改革是实现不了的，因此他号召提高农民的“战斗觉悟”。在马宗达及其支持者的发动下，西孟加拉邦北部具有斗争传统的农民首先揭竿而起。

### 运动发源地——纳萨尔巴里的斗争

1967年3月18日，即西孟加拉邦联合阵线政府成立16天之后，在纳萨尔巴里所在的大吉岭县西里古里区，印共(马)地方组织主持召开了一次农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号召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权，通过农会组织重新分配土地，并把农民武装起来，以便粉碎地主和农村反动势力的反抗。会议还告诫农民说，他们的反封建斗争必将遇到中央政府以及邦联合阵线政府的反对，因此必须准备进行持久的武装抵抗。

西里古里农民代表会议以后，该区农民、特别是受压迫最深重的部落民积极响应号召，投入了战斗行动。3、4月间，该区各村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有1.5万至2万农民变成了脱产积极分子。农民委员会占领了地主的土地，销毁了地主的土地证，勾销了一切抵押债务，判处恶霸地主以死刑，夺取地主枪支并成立武装队伍，建立平行政权管理村务。直至5月，起义者宣称纳萨尔巴里等地的一些村庄已经成为他们的据点，外人不经准许不得入内。

1967年5月23日，第一次严重冲突终于发生了。这一天，一队警察到某村去抓被通缉的起义领袖，遭到当地武装部落民的抵抗，结果一名警察被杀。5月25日，当局派了大批警察前来进行报复。他们向村民开枪，打死9人，包括6名妇女和2名儿童。此后，起义农民与地主、警察冲突的事件日益频繁。6月12日，西孟加拉邦政府首席部长阿约艾·穆克吉向记者宣布：大吉岭县出现了“恐怖统治”。翌日，印度内政部长恰范也告诉国会人民院，说该

县“严重违法行为”猖獗。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1967年7月12日，政府在纳萨尔巴里采取了一次旨在搜捕起义者及其领袖的大规模警察行动。7月底，纳萨尔巴里起义的农民领袖詹加尔·桑塔尔等人被捕，另一些领袖也缴械投降。斗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

贯彻马宗达理论的第一次尝试为什么这样快就破产了呢？在纳萨尔巴里发生的运动彻底失败了吗？

纳萨尔巴里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卡努·桑亚尔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斗争受挫是因为存在依赖自发性的倾向。“当所有农民都武装起来、地主和其他既得利益者逃离村庄时，我们就以为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把武装起来了的人民当作武装部队。……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被一些流氓地痞的好斗态度所感动，让他们当领袖并建立武装部队。”而且，往往把袭击地主作为主要目的，忽视重新分配地主土地的任务。在军事上，斗争领导人也存在轻敌思想，使群众在敌人反扑时缺乏思想准备。桑亚尔还指出：纳萨尔巴里地区的干部曾经建议同邦联合阵线政府谈判妥协；但马宗达不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同政府谈判就是“修正主义”。总之，“由于主观上缺乏准备，策略上犯错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缺乏政策上的灵活性，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未能继续下去”。

纳萨尔巴里起义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它对整个印度农村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犹如投一卵石泛起涟漪一样，这次起义鼓舞了国内其他地区贫苦农民的战斗意志。无地农民强占土地的事件，在1966年只是零星地发生过。但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以后却象野火一样蔓延至整个印度。据印度内政部统计，从1967年9月至1969年年中，抢占土地的事件，要求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示威，要求增加农业工人工资的运动，被夺佃的分成农强收庄稼的行动，反对增税的抗议斗争，都明显地增加了。在此期间发生过上述事

件的,在阿萨姆有五起,安得拉八起,比哈尔九起,喀拉拉七起,中央邦七起,马哈拉施特拉五起,旁遮普五起,拉贾斯坦三起,泰米尔纳杜三起,北方邦五起,曼尼普尔、古吉拉特、特里普拉各一起。局势如此严重,以致印度内政部长恰范也曾经不得不警告说,印度已经开始了的“绿色革命”也许不会长久地保持其绿色。

在纳萨尔巴里起义爆发以后,印共(马)党内矛盾日益尖锐化。印共(马)领导先后开除了参加和领导纳萨尔巴里斗争的一些党员和干部。1967年11月,这些党员和干部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开会,决定成立“印共(马)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会议发表宣言,声称“革命农民斗争现在已经或即将在国内的各个地区爆发”,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尽力“促进和领导这些斗争”;并号召建立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革命党”。这样,在纳萨尔巴里斗争失败之后的几个月内,建立一个新党的基础已经由这些起义者奠定下来了。这种情况表明,虽然起义在军事上是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却在于:起义使印度的社会经济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新的转折”。1967年秋,马宗达说过:“印度有成百上千个纳萨尔巴里正在怒火中烧。……纳萨尔巴里并没有消失,也决不会消失。”马宗达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

### 斯里卡库兰斗争是更强有力的反响

在纳萨尔巴里起义爆发之后,安得拉邦的广大农民,特别是该邦东北部斯里卡库兰县的吉里江人(即山区部落民)深受鼓舞,正在准备加强斗争。吉里江人世世代代遭受地主、高利贷者和警察的剥削、压迫和欺凌。他们的觉醒使政府当局惊慌失措。警察在各地巡逻。地主在警察的保护下,对吉里江人进行打击报复,于是发生了一些冲突。为了控制局势,政府当局从1967年7月24日

至 8 月 25 日宣布在二百个村庄禁止集会和游行。

这之后不久，在 10 月 31 日发生了列维迪事件。这一天，吉里江人要在蒙丹卡尔举行代表会议。一些吉里江人路过列维迪村去开会，该村地主向他们发起了袭击。冲突中，地主打手开枪打死了两个农民。列维迪事件是该县吉里江人长期斗争史上的一个顶点，也是后来斗争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后，“吉里江农民怀着极大的愤怒，群起反抗阶级敌人。农民夺走地主的财产。吉里江人协会着手解决村内的所有问题”。

1968 年初，警察加强了镇压活动。特别警察部队进驻这个地区。同年 3 月，警察袭击了几百个村子，逮捕了一些吉里江农民，还打死了一些人。同年 9 月，对列维迪案件进行了判决，杀害部落民的被告被宣判无罪。这一判决，加上警察的镇压，更加坚定了部落民和当地共产党领袖的斗争决心。共产党革命派向农民宣传说，要想摆脱剥削，“我们的斗争就应当采取旨在夺取政权的更高形式”。同年 10 月，斯里卡库兰的共产党人派 C·特杰斯瓦拉·拉奥到加尔各答同马宗达会晤。拉奥回来后，斯里卡库兰协调委员会宣布成立。它决定立即发动武装斗争，并为此在该县平原和山区成立了游击队。

1968 年 11 月 24 日，斯里卡库兰县平原地区靠近波达巴杜的一个村庄里，农民强行收割一个富裕地主的庄稼。这就是该县游击活动的先声。但更有意义的还是次日发生的事件。这一天，在山区的佩达戈蒂里村，在当地共产党领袖文帕塔布·萨蒂亚纳拉雅那的率领下，来自几个村的手持弓箭和梭镖的 250 名吉里江人，袭击了一个恶霸地主兼高利贷者的住宅，没收了他的库存粮食和价值 2 万卢比的财产，并搜走了一些证券、票据和农民债务凭证。11 月 25 日的行动使地主和当局感到震惊。政府派出更多的特别武装警察前来加强镇压。开始，吉里江农民同警察打“阵地战”。

12月20日在阿威利地区发生的一次战斗最典型。有人看见警察前来,就上了山,把附近村庄将近500名农民都聚集到一起。他们使用弓箭和石头,还有一支土枪,有效地阻止了大约200名警察和地主进村。当警察撤退时,农民就使用弓箭和石头追击,并打死2名警察和1名警官。事后,当地共产党领袖向村民解释说,同军事上占优势的警察部队打阵地战是不利的,并说服他们必须打游击战。12月23日,警察又来了,他们就采取隐蔽自己,诱敌深入的战术。据报道,当年12月,斯里卡库兰县的吉里江人在700至800平方英里的地区内开展了游击战。

斯里卡库兰县的游击斗争还曾经一度扩展到毗邻的奥里萨邦辖下的柯拉普特县。柯拉普特县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是共产党人打游击的理想庇护所。据当地一位高级警官说:“如果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计划能够实现,则该县有可能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以D·B·M·帕特奈克和纳格布桑·帕特奈克为首的当地共产党革命派,起初想把该县的古努普尔区作为解放区,然后再把斗争逐步扩大。但这个初步计划被官方缴获。政府派出军警进行大扫荡。初步计划失败以后,共产党人又把运动发展到奥里萨邦边境的一些村庄。1969年2月28日,奥里萨邦首席部长R·N·S·狄欧向该邦议会报告说,有32个活跃的“纳萨尔巴里式的小组”正在古努普尔的森林地区活动。中央政府也感到不安。印度内政部的报告说,从1968年1月至1969年8月,斯里卡库兰县发生了86起“暴力事件”。吉里江人最初只有弓箭、梭镖、简易炸药和前膛枪,现在已经有了“较好的武器”。而且,“斯里卡库兰的起义者已与奥里萨邦境内的毗邻县的极端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斯里卡库兰的运动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比纳萨尔巴里的斗争进了一步。

斯里卡库兰的运动还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因为在斯

里卡库兰，游击战的初级阶段开始具有了所谓“歼灭阶级敌人”的特征，而“歼灭阶级敌人”又是马宗达理论中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马宗达在1969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歼灭阶级敌人”问题。他说：我们的经验表明，开展游击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缴获高级武器。必须培养能够掌握这些武器的人，否则这些武器也是无用的。“而这些人只有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通过歼灭阶级敌人才能培养出来”。同年12月，马宗达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歼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如反夺佃、强占地主土地）的“更高形式”，同时又是“游击斗争的初级阶段”。1970年5月，马宗达又说：“只有通过开展阶级斗争，通过歼灭性的战斗，才能培养出不怕死、具有完全忘我精神的新人。由于他不怕死，他敢去接近敌人，夺敌人的枪，为牺牲的烈士报仇；这样，人民军队就会建立起来。”

马宗达的“歼灭阶级敌人”策略，在斯里卡库兰斗争的后一个时期开始出现。在斯里卡库兰斗争的初期，即1968年底至1969年初，游击队和人民法庭对敌人过于仁慈。他们剥夺了地主的财产后，就把地主饶了。抓到了警察，在他认罪后也把他放跑。但对敌人的宽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警察抓住游击队员后，并不宽宏大量，而是肆意残杀。这就使斯里卡库兰的共产党革命派重新考虑对策。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领导人，他们认为：“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对阶级敌人不存在宽容和仁慈的问题。不能饶恕阶级敌人。”并且认为：要夺取政权，就不能坐等挨打，而必须主动进攻。主动进攻就是要“歼灭阶级敌人”。此后，游击队多次在数百名村民的配合下主动袭击地主、高利贷者、告密者，有时甚至袭击警察驻地。

与斯里卡库兰斗争的同时，在安得拉邦的特仑甘纳地区，以纳吉·雷迪为首的一派共产党人也在发动农民夺取和重新分配地主



的土地。纳吉·雷迪派曾经加入过“印共(马)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后因纳吉·雷迪与马宗达发生分歧，双方断绝了关系。纳吉·雷迪与马宗达的分歧在于：马宗达把进攻阶级敌人和夺取政权当作主要目标，并认为应当先歼灭地主，然后才重新分配土地；纳吉·雷迪则强调先搞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土地，在地主和警察进攻时才实行抵抗。正如纳吉·雷迪后来向记者说的那样，“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抵抗的问题；而对他们(马宗达派)来说，则是个进攻的问题。”两派虽然在战略和策略上有分歧，但在实践上，纳吉·雷迪派的具体做法同斯里卡库兰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杀地主、高利贷者和警察，进攻警察局并夺取武器弹药，袭击地主庄园抢夺粮食并销毁地契和各种票据，而这些也都是斯里卡库兰运动的一些特点。

到1969年底，安得拉邦总共有15个县有共产党革命派在活动。在斯里卡库兰县和瓦朗加尔县，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至不得不把有关地区宣布为“骚乱地区”。根据政府统计，该邦共产党革命派总共杀死了48人，其中包括地主、高利贷者、商人、护林官员和警察，向警察发动了99次进攻，并劫持了15人。被劫持者受到了人民法庭的审讯，并被判以死刑或罚款。他们夺走了大批的枪支、子弹和炸药。可见，1968至1969年在安得拉邦发生的运动，是纳萨尔巴里短暂雷声的更强有力和更响亮的反响。在印度革命的里程碑上，纳萨尔巴里象征着“武装土地革命”，而斯里卡库兰则铭刻着“游击战”的标记，表明它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 印共(马列)的成立与当局的镇压

由于1967年纳萨尔巴里的起义和1968至1969年斯里卡库兰的成就，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开展有组织的

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的阶段。1968年以后，印度各地农村出现了要求开展武装进攻的倾向。

比哈尔邦穆扎法普尔县穆沙哈里地区的农民，在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在1968年也揭竿而起。他们夺地和抢割庄稼。面对地主和警察的镇压，他们最初用土制武器实行抵抗，后来并开展了游击战。

与穆沙哈里的斗争几乎同时，在北方邦拉金普尔县的帕里地区，农民运动也转变为政治性的武装起义。农民拒绝向地主交租，废除了对高利贷者的旧债。在与地主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农民还夺走了一些武器。

在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县的德布拉和戈比巴拉普尔地区，农民向地主夺地夺枪，组织游击队，开展斗争。

总之，在短短的时间内，农民被唤醒和动员起来了。尽管武装斗争只在9个邦的小块地区内发生，但它却打破了农村的现状，威胁着国家政权。纳萨尔巴里起义并不是一个胜利的纪录，但它却是在印度开展一种新型革命战争的初步尝试。

印度各地爆发了初级形式的武装斗争，各个革命派别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这些都要求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着手准备建立一个新党。而且，“国际领导也一再提醒我们要这样做。”于是，在1969年4月22日即列宁诞辰日，一个新党即印共(马列)成立了。马宗达当选为该党总书记。但是，有少数派别(包括纳吉·雷迪派)并没有加入新党。这是因为，他们虽然也同意搞武装斗争，却不同意马宗达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所采取的策略。

与此同时，政府当局在发生农民武装起义的各个地区加紧实行军事“扫荡”活动，逮捕和枪杀农民起义领袖和游击战士。1969年9月，奥里萨邦和安得拉邦的高级警官在斯里卡库兰举行联席会

议,讨论加强两邦的联合“扫荡行动”和“情报工作”。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斯里卡库兰的运动在1970年底遭到了挫折。在德布拉和戈比巴拉普尔,当局派遣二千多军警进驻,斗争也被镇压下去。在穆沙哈里、拉金普尔以及其他地区,斗争同样遭到了重大损失。

在敌人残酷镇压和斗争遭到挫折的情况下,印共(马列)党内分歧也日益尖锐。分歧主要是在“歼灭阶级敌人”的问题上。党内许多人怀疑马宗达的“歼灭阶级敌人”策略是否正确。他们认为:首先,马宗达片面强调“歼灭阶级敌人”这一斗争形式,而排斥其他斗争形式,如开展各条战线的群众运动。其次,“歼灭阶级敌人”后来发展到只是游击队少数人的秘密暗杀行动,而农民则变成了消极的旁观者。第三,“歼灭阶级敌人”还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见到地主就杀,没有区别对待,甚至连小土地所有者也难以幸免。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马宗达的“歼灭阶级敌人”理论。

在1970年5月举行的印共(马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宗达对他的“歼灭阶级敌人”理论进行了辩解。他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重点谈的就是“歼灭”问题。他强调说,只有通过“歼灭”运动,才能造就“不怕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新人”。他反对说游击战士的丧生是无畏的牺牲,认为“只有烈士献出鲜血才能取得胜利。烈士的鲜血会激发热情,使战士变成新人,使他们心中充满阶级仇恨。烈士的鲜血将鼓舞他们逼进敌人,靠赤手空拳去夺取敌人的枪支。”谈到斯里卡库兰,他对“阶级敌人”仍然在那里生存感到遗憾,认为不把他们驱逐出去,新的阶级意识和新的信念不会产生。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断言,与那些反对“歼灭阶级敌人”的人之所以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人民的敌人”,这些人不能留在党内。

在这个时期里,马宗达越来越相信,印度各个角落里的农民都已经准备拿起武器,而不是象他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印度农民的觉

悟程度和思想准备程度是有差别的。在1969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他说：“今天，印度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触即发的。”在1970年5月的党代会上，他又说：“印度每一个村庄都能够通过歼灭运动开展游击战。”他甚至提出：1975年以前，印度有可能获得解放。他的根据是：“如果1967年的新的革命意识能够在1970年动员一千万人民，为什么这一千万人民在1975年以前的群众革命高潮中不能把五亿人民发动起来呢？”“我相信，1975年以前，印度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将谱写出一部解放的史诗。”

### 比尔布姆斗争的新经验

尽管印共(马列)党内争论正在激烈进行，该党的活动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斯里卡库兰、穆沙哈里、德布拉和戈比巴拉普尔的农村根据地被破坏了，但在其他邦的一些地区，歼灭地主和高利贷者，袭击警察和军队以夺取武器的小规模行动仍屡屡发生。拿着武器去夺取武器，以便斗争能够从靠原始武器去袭击敌人的初级阶段发展到成立人民解放军的阶段，这似乎是农村游击队要达到的主要目标。许多地方还把建立平行政权的初级形式——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70年夏至1971年底，旁遮普邦许多县的农民运动取得了某些进展。到1971年末，安得拉邦的游击队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由于他们的领袖遇害而遭到的困难，在特仑甘纳和斯里卡库兰继续从事游击活动。在比哈尔邦，虽然失去了穆沙哈里这个根据地，斗争却扩展到部落民聚居的兰契地区。但是，在1970至1971年这个时期里，与比哈尔邦接壤的西孟加拉邦比尔布姆县的斗争却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在该县，印共(马列)曾经在有些地方建立了农民政权——革命委员会，并且斗争一直维持到1971年底。

比尔布姆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紧密配合。在那里，不但农村开展“歼灭阶级敌人”的运动，城镇青年学生也在制造“红色恐怖”，捣毁大、中学校以及政府机关，以作为农村斗争的一个补充。

比尔布姆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农民群众、特别是那里的桑塔尔部落民积极支持游击队的行动。有时，游击队“歼灭阶级敌人”的行动，有几百名村民参加。例如，1971年6月19日这一天就发生了两起杀地主的事件，据报道参加的群众分别有200人和500人，他们不但手持梭镖，还有从地主和警察手里夺来的几十支步枪、手枪以及手榴弹等等。

1971年5月至7月是比尔布姆斗争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期间，该县的不少地主被杀，许多地主则逃之夭夭。警察也无能为力，他们经常遭到游击队和农民群众的袭击，武器被夺走。据统计，1971年3月1日至6月5日期间，在整个西孟加拉邦，被游击队夺走的枪支共有299支，其中比尔布姆县即占109支，超过三分之一，其他十多个县合计也不到二百支。

为了平息比尔布姆的斗争，政府不得不动调大批军队进入该县实行“围剿”。仅该县的博尔普区，就部署了7500名士兵。成千名桑塔尔部落民被投入监狱，许多斗争领导人被杀害、逮捕，有的则逃到附近的深山老林里去了。斯里卡库兰、德布拉和戈比巴拉普尔的结局，这时又在比尔布姆重演。

比尔布姆的斗争虽然又失败了，但从建立政权这一角度来看，这一斗争比起斯里卡库兰、德布拉和戈比巴拉普尔来又前进了一大步。贫农和无地农民直接参加游击行动和土地改革，这在比尔布姆比在任何其他地区都搞得更好。实践使斗争的组织者更具体地了解到应当如何去解决与建立人民政权有关的问题，诸如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民兵、实行土地改革等等。

比尔布姆斗争的规模,还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加以衡量:1967年在纳萨尔巴里,警察行动就足以把起义镇压下去;1970年在德布拉和戈比巴拉普尔,必须有警察和准军事部队的联合作战才能击败起义者;而1971年在比尔布姆,则必须调遣正规军才使斗争平息下去。政府反应的升级表明了运动的日益成熟。

### 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城市游击活动

在马宗达关于把七十年代变为“解放的年代”的号召推动下,1970至1971年,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及其周围城镇的一些青年学生开展了先是砸塑像和烧学校,后来则发展到杀警察的城市游击活动。

1969年8月,马宗达曾经劝告青年学生说,大学学生会并不能解决学生们面临的教育问题,而只会消磨他们的革命意志。他号召青年学生到工人和贫雇农中去。许多学生响应号召,离开课堂到了农村。一些学生则留在城里从事革命活动。起初,他们在学校罢考。后来,印共(马列)出版的一些小册子把教育机构说成是“半殖民地”的机构,必须捣毁。于是,从1970年4月开始,学生们打砸学校的行动进入了高潮。学生们焚烧学校的文件档案、考题试卷和桌椅板凳,捣毁图书馆和实验室。不久,学生们又把攻击目标针对着印度资产阶级政治领袖和十九世纪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塑像。竖立在加尔各答市和其他城镇公共场所的名人塑像,如甘地、拉莫汉·罗易、维迪雅萨加尔、维威卡南达等人的塑像都被砸坏了。马宗达对青年人砸塑像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说:“不打碎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不砸掉买办资本家竖立起来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来。”并且指出:“学生青年的这一斗争是农民武装斗争的一部分。”

正当烧学校和砸塑像的行动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斯里卡库兰、穆沙哈里、德布拉和戈比巴拉普尔等农村地区的革命者被杀害，另外一些被捕的同志遭到严刑拷打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使印共（马列）的人认识到，活着的敌人比死去的敌人力量更强，危害性更大，因此在城市里，进攻的矛头还必须指向警察，必须以惩治警察来为牺牲了的农村游击队员报仇雪恨。于是，在西孟加拉邦的各个城镇，大白天在大街上杀警察便成为印共（马列）城市活动新增加的一项内容。准军事部队（如边防军和中央后备警察）人员、警官、便衣警察以至交通警察都是攻击的目标。据西孟加拉邦政府统计，在1970年4月1日至11月12日期间，该邦城镇警察被打死了36人，被打伤400多人。

对印共（马列）的城市活动，政府最初只出动当地警察进行镇压，但是毫无成效。于是，政府调遣准军事部队和正规军增援。捕杀印共（马列）城市游击队员的行动从1970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当局授予军队和警察以广泛的权力，包括任意捕人。“纳萨尔巴里恐惧病”使警察变得日益狂暴，他们在监狱内对印共（马列）干部和同情者施加了种种野蛮的酷刑，甚至实行集体屠杀。他们把一些政治犯打昏后往肉里塞进子弹，然后拖出牢房扔到大街上，或把尸体吊在树上，或斩首示众等等。

印共（马列）城市游击队对军队和警察的野蛮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藐视遍布西孟加拉邦各县城镇的恐怖统治，继续开展杀警察、抢枪支弹药、处死暴徒和臭名昭著的国大党人的活动。但是，他们还把进攻的矛头对着富商、官吏以至于小商人，这就脱离了城镇中的大部分中等资产阶级。马宗达对不加区别地打击商人的行为也表示过反对。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相反，“大部分商人将会同我们合作。”当然，对那些企图危害革命的买办商人，“杀一两个可能是必然的”。

对印共(马列)城市运动的更大威胁来自城市流氓无产者的渗入。走私贩、职业杀人犯、流氓、小偷等等,这些城市下层社会的渣滓经常想方设法混进印共(马列)的运动。流氓无产者报私仇的行为往往被当作“纳萨尔巴里分子”的游击行动。警察巴不得把每一桩暴力事件都归咎于印共(马列);而印共(马列)的年轻干部,出于青年人的虚夸心理,也把这类非政治性的行动看作他们的行动,大概是为了充实他们“歼灭阶级敌人”的名册吧。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大门就这样向流氓无产者敞开了。

1971年初在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期间发生的事件,也使印共(马列)的年轻革命者消耗了他们的战斗精力。因为,在竞选期间,印共(马列)与印共(马)的原有矛盾以更尖锐的形式再次爆发出来。印共(马)指责“纳萨尔巴里分子”是与国大党结盟的“叛徒”,而印共(马列)则认为印共(马)是把人民斗争引入歧途的“新修正主义者”。其结果是,双方冲突的事件日益增加。印共(马列)号召抵制选举。城市游击队威胁要杀死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同时恐吓选民说:“谁去投票,谁将暴尸街头!”印共(马列)威胁选民的做法使它在一部分城市中等阶级中声名狼藉,而且便于敌人对竞选对手行凶并诬之为“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行动”。印共(马)领导人宣称该党有206名党员(包括一些领导人)和支持者被“纳萨尔巴里分子”杀害了。有理由相信,其中许多受害者是国大党雇用的流氓杀害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某些地方,印共(马列)的干部的确杀死了印共(马)的一些党员和支持者。但是,也有人断言,在1971年8月,印共(马)的干部在某地曾经积极帮助警察搜捕和残杀印共(马列)的党员和同情者。

加尔各答市的警察充分利用了印共(马列)城市运动中的弱点——流氓无产者的混入,中等阶级由于印共(马列)与印共(马)之间的互相残杀而对他们采取冷漠的态度。警察一方面对城市游击



队进行“围剿”、“扫荡”；另一方面利用流氓无产者充当坐探，提供情报，或把他们编为非官方的民防队，袭击印共（马列）的领导人和干部。与此同时，一度同情印共（马列）的城市中等阶级现在转而反对印共（马列）的政策，这种状况也帮助了统治阶级，使后者在1971年的邦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1971年的那些恐怖日子，西孟加拉邦、特别是加尔各答市的人们记忆犹新。军队、警察、流氓打手遍布街头。警察、密探、工贼、职业刺客以及形形色色的私人保镖到处横行。全身尽是子弹窟窿的青年人的尸体随处可见。马宗达曾经要求他的追随者向敌人复仇，但他后来也认识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这一点。1971年4月，他在一封信中说：“不可能在城市中不断发生冲突，这样做将使我们蒙受更大的损失。”同年11月，他对党的城市工作干部说：“斗争是会有起伏的。当斗争遭到挫折时，就会引起种种混乱。在城镇里工作的同志中间，混乱可能更严重些。”1971年底，印共（马列）的城市斗争终于遭到了挫折。

印共（马列）党内反对马宗达的农村斗争策略的人，由于党在加尔各答及其他城镇中蒙受的损失，而再次对马宗达提出了批评。马宗达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是否应当保存实力。马宗达强调“烈士的鲜血会使战士变成新人”，强调勇敢不怕死。他的批评者则主张保存干部的实力，不应当让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他反批评说，保存实力的论调是“修正主义思想”，因为现在是“自我牺牲”的时代。实际上，在1970年，虽然仅在西孟加拉就歼灭了将近200名阶级敌人，但牺牲的革命战士的数目比这多得多。

第二，印度是否存在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形势。马宗达认为“印度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触即发的”，因为印度全国的贫农和无地农民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他相信能够唤起他们的造反精神，使全国

各地都变成武装斗争的据点。他的批评者则认为，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对斗争的准备程度是不平衡的，斗争策略必须因地制宜。

第三，是坚持还是放弃“歼灭阶级敌人”的策略。马宗达坚持“歼灭阶级敌人”的策略，甚至警告说：反对这一策略的人不能留在党内。但批评者指责这一策略只不过是个人恐怖主义或小团体恐怖主义，而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干。因为这样搞法将使群众变为袖手旁观者，使革命失去群众的支持。

第四，如何对待潜在的敌人和朋友。马宗达主张歼灭或驱逐地主，并继续与富农作斗争。批评者则主张中立地主，反对乱杀，同时倾向于争取富农的同情。对城市小资产阶级，马宗达等人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盟军”，但又主张“通过打击他们，然后才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批评者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打击小资产阶级。

### 马宗达的自我重新评价

随着恐怖统治的日益增强，印共(马列)党员的大批遇害或被捕，党内的政治分歧以至组织分裂，运动逐步地转入了低潮。从1971年底开始，直至马宗达本人1972年7月被捕遇害这一期间，马宗达承认印共(马列)的武装斗争“遭受了挫折”，并对他过去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重新进行了评价，对革命的前景进行了预测。尽管遭到了挫折，他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并未破灭。

马宗达曾经预言：印度在1975年以前将获得解放。对此，他在1971年12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曾经说过，我国在1975年以前将获得解放。……这是一种政治判断，我并不固执己见。”他承认“1970年的革命高潮”已经不再存在，群众的政治觉悟现正处于低水平。这样，他过去关于革命可能速胜的说法被修正了。

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马宗达也修正了他过去的看法，这就是“歼灭阶级敌人”的策略问题。1969年，他认为“歼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这就是说，他那时还默认其他斗争形式。可是，1970年在党代会上，“歼灭阶级敌人”的策略被看作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形式。1971年底以后，他对这个问题又改变了说法。他说：“只告诉贫农和无地农民知道歼灭阶级敌人，那将是经济主义。”“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而不是歼灭阶级敌人，虽然歼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今天，武装斗争是主要特点。”所谓武装斗争，就是夺取武器并把农民游击队武装起来，而不是沉迷在“歼灭”策略上。

马宗达过去片面强调“歼灭阶级敌人”，而排斥其他斗争形式，如开展各条战线的群众运动。而在这个时期里，他却一再强调要在印共(马列)有影响的地区就一般的经济问题开展群众运动。他认为，提出“抢夺阶级敌人的庄稼”之类口号，有利于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一旦遭受挫折也可以有个依靠。

过去，马宗达自认为“革命权威”，容不得不同意见。而现在，他对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采取耐心的态度了。在这个时期里，印共(马列)内部在策略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经达到了激烈的阶段。同志之间的关系已由隔阂发展到公开斗争。“纳萨尔巴里”这个口号在1967年曾经是团结革命派共产党人的口号；而在1971至1972年期间，它却使他们走向分裂，而且这种分裂的深刻程度，在印度共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马宗达眼看着由他倡导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正在仇恨和恐惧的气氛中瓦解。马宗达的忠实信徒们不能容忍党内对马宗达“革命权威”的挑战，他们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斥为“反革命”。马宗达则一再提醒他的信徒们说：提出问题的人并不都怀疑党的指示是否正确。“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时必须耐心。支持反修斗争的人大多数都是忠诚的。

要允许他们有机会接受再教育。”关于“革命权威”问题，马宗达说：“在意见发生分歧时机械地搬用权威问题是不对的。……我们决不能用下命令的办法把权威强加于人。只能通过实践经验和政治讨论使大多数同志逐步地理解问题。盲目服从是有害的。”

马宗达承认斗争已经遭受挫折，但他又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印度会出现“全国性的自发的斗争高潮”。他抱怨印共（马列）党组织的发展跟不上形势。他认为，如按印共（马列）领导的斗争目前这样的发展速度，那么“我国甚至到 2001 年也解放不了，还谈得上在 1975 年获得解放吗？”因此，他主张利用即将来临的自发的群众斗争高潮，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确立党的领导权。他说：在印共（马列）有影响的地区开展的斗争，能够成为其他地区斗争的榜样。“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某些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话，那么在革命高潮时期，其他许多地区就有可能自发地去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我党的自觉领导将会导致武装革命的高潮。通过这样的武装革命高潮，我党的领导权就会逐步地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同时，他也主张“在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包括最广泛的人民阶层在内的统一战线”。

然而，马宗达还没有来得及讲完他的全部意见，因有人告密，他于 1972 年 7 月 16 日在他的住所被捕，并于 12 天后即 7 月 28 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由于成千上万印共（马列）积极分子的被杀或被关（直至 1973 年，被关在印度各地监狱的印共（马列）积极分子和支持者共 3.2 万人），由于他们的城乡基地被摧毁，再加上马宗达之死，可以说纳萨尔巴里运动至此算告一段落了。

## 运动失败的若干教训

在 1972 年宣告结束的印共（马列）运动的这一阶段，可以归纳

为建立贫农和无地农民通过武装游击战争实行地区性夺取政权的思想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印度部分农村中的部分农民采取了游击行动并建立了初级的人民政权，而城市中的部分青年则向现行制度的支柱发动了袭击，以支援农村斗争。

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实行地区性夺取政权并保持住“解放区”，可能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在有外国领土作为后方的本国的一隅之地夺取政权。象印度东部的那加和米佐就是如此，那里的本地民族起义者反对中央政权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有关外国对起义者采取友好或者中立的态度，那就更好。夺取政权也还可以在交通不便、政府无法管辖的心脏地区进行。象中央邦的昌巴尔深谷地区就是如此，那里历来是土匪的天堂和王国。

第二种选择就是：在山区和平原同时建立许多块农村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散布在广阔的地域内，从而分散敌军的力量，而且城市工人阶级应当采取行动予以配合。这些散布在各地的农村根据地必然是不固定的。实行这一战略，重要的不在于个别根据地的得失，而在于是否能够逐个地对敌人作出决定性的打击，从而逐渐地改变力量的对比，以便建立稳固的“解放区”。

不论采取哪一种战略，要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一支正规的常备军。

印共(马列)选择了第二种战略。它设想在印度的每一个角落(不论其地形在军事上是否有利)都会爆发农民武装起义，而且起义从一个村蔓延到另一个村，势如排山倒海，最后压向政权的中心——城市。尽管印共(马列)的干部具有献身精神，而且勇敢坚定，但该党在几个方面是失败的。

首先，第二种战略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农村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的迅速发展。但是，印共(马列)的斗争并没有超越游击战争的初级阶段，即“歼灭阶级敌人”，搜集武器，建立游击队，在革命委

员会领导下就经济问题发动农民群众等等的阶段。而且，这些斗争也只是在若干小块地区内进行。至于该党所规定的更高阶段的任务，则一项也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就是：使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的人民解放军，把游击战争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去，动员城市工人去帮助和领导战斗中的农民，武装农民并把他们组成民兵，建立革命委员会来管理根据地，有效地袭击敌军以破坏其战斗力。

第二，印共（马列）在争取实现其初级阶段目标的过程中犯了某些重大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党内的不团结，脱离群众，最后并导致了大批干部的被杀害。该党中央、特别是马宗达的领导作风同这些错误密切相关。马宗达有几个弱点：一是眼光短浅，缺乏全局观点，不了解印度全国的形势，而设想印度每一个角落都是“一触即发”的；二是由于他的信徒们大树特树他的“权威”，使他盲目自负，拒不承认他制订的策略有误；三是“国际领导”的宣传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武装斗争已经在印度全国爆发，从而使马宗达以为他的策略已经得到认可，拒绝党内批评。到了1971年底、1972年初，马宗达已经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但他并没有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马宗达的信徒们后来几乎毫无例外地激烈批评马宗达，但他们也与马宗达一样，不肯承认自己也有过失。

第三，印共（马列）领导忽视抓军事和敌军工作，因而未能达到在军事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目的。印共（马列）的许多领导人片面强调政治宣传工作，而不注意抓军事，唯恐犯“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强调政治的结果，一是放松建立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二是过低估计敌人的军事力量；三是忽视在政治上争取敌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印军士兵大都来自贫苦阶层，他们与农民有密切的联系，许多军官也来自下层。士兵薪俸很低，存在不满情绪，不时发生兵变。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印共（马列）领导对低薪士兵中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视而不见，不去对他们进行政治宣传，以便在敌军

中开辟阵地。

上述三个因素使印共(马列)无法实现它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这一主要目标。

印度并未被任何外国直接占领，因此在这里进行的任何武装斗争都应当有别于越南的或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也不存在赤裸裸的独裁统治，因此它所进行的斗争也应当不同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斗争。印度现在实行的是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共(马列)应当吸取过去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制订出一整套灵活的策略以逐步夺取胜利。

对印度统治阶级的进攻能否获得成功，将取决于几个方面同时展开的斗争能否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几个方面就是：通过持久的农民游击战争在农村中进行地区性夺取政权；在城市里掀起工人罢工斗争高潮以破坏经济和瘫痪政权机构；至少使部分军队保持中立甚至把它争取过来。但是，印度广袤的农村终将决定革命的命运，农村千百万群众终将在进步与反动的较量中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1967至1972那些暴风雨般的年代表明：印度农村的宁静只是一种假象，它背后埋藏着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群众的怒火。这些怒火是终将炸毁旧制度的正在燃烧的导火线。

## 希腊将走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道路？

〔美〕马克里迪斯著

钟冰摘译

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党相继在南欧五个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希腊是其中之一。另四个国家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81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以帕潘德里欧为主席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结束了希腊战后三十五年来右派一直垄断政权的局面，组成了希腊历史上第一届社会党政府。在1985年6月的选举中，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获胜，继续执政。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两次大选中，以社会党和共产党<sup>①</sup>为代表的左翼力量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得到大约60%选民的支持。为什么希腊的左翼力量能够超过右翼力量？为什么刚刚在1974年组成的自称马克思主义党的社会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短短几年内就能一跃成为执政的第一大党？它上台以后将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

---

<sup>①</sup> 希腊现有两个共产党，一个是得到苏联支持的老党——希腊共产党（又称“国外派”），一个是1968年因政治分歧从希腊共产党分裂出来，坚持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的“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前者有党员约七万人，后者有党员约七、八千人。——译者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布兰代斯大学政治系教授罗伊·马克里迪斯所写的《处于十字路口的希腊政治》(Roy C. Macridis «Greek Politics at a Crossroads—What Kind of Socialism?»1984,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一书,联系希腊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对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讨,对我们了解希腊以及南欧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党的性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共分七章,现逐章摘译如下。

希腊的民主前景如何?在1981年大选中获胜的社会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将会采取哪种模式?是采取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模式,还是奉行第三世界的一党制,抑或走拉丁美洲的独裁主义道路?这些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 一、导 言

南欧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迅速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发展很快,古老土地上的“波利斯”(城邦)现在已成为庞大的、向四面八方伸展的特大城市,那里居住着贫困程度不同的“城市村民”。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很快的。在四十年的时间内人均收入增长了三倍。农民的人数急剧下降。很多人享受到现代化的一些好处(保健、交通工具、安逸、教育和娱乐),他们的一些需要得到满足,从而又刺激了他们的贪欲。一般说来,“欲望的形成”已超过了“欲望的满足”。

整个南欧,尤其是希腊,政治上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快和极不稳定的,因为这种发展来得太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

破坏了僵硬的政治和社会的寡头统治，迫使他们勉强同意发展群众参与的机构和制度(如全国性政党和群众性政党)。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希腊才恢复民主。1974年以前统治希腊的独裁专制结构垮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宪法、个人自由、自由选举、结社自由和政党自由，总之，是希腊(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往没有经历过的一定程度的多元主义。由于政治参与的势头和影响受到长期的延阻，使新建立的民主机构与制度脆弱和不稳定。结果导致合法统治不断发生危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使这个危机更加尖锐。

本书在于探索新建立的民主制度的性质及其脆弱性和不久以前(1974)成立并在1981年大选中获胜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帕索克”)的特点、组织和意识形态。“帕索克”向已建立的权力体制提出挑战，它许诺要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它在许多方面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的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相似。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它又同西方的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运动一致，宣称它坚持民主和多元主义。

本书的主要假设是，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可能走两条不同道路中的一条。第一条是走可能称为西方社会党模式的道路，它坚持在1974年制定、至今仍严格遵循的现有宪法范围内的公民自由权利和民主进程。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类型，它需要在重工业、贸易、保险等领域实行有选择的社会化；通过实行地方分权重新组织国家的管理机器；加强工人、农民和其他人参与企业、农场和其他生产单位及管理机构的管理与监督；以及对教育实行全面改革。现代化将适应国家的迫切需要，并将尽一切努力来限制外来干涉的直接影响，减轻国家对外国(特别是美国)援助的依赖。如同密特朗的社会党一样，国家的考虑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希腊将(有条件和有保留地)继续留在欧洲和大西洋联盟之内，但将尽

一切努力增加它的联盟的多样化和取得支持、援助及军事物资的来源的多样化。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将越来越往中间派的方向移动(它由此已取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并将继续从中间等级的开明人士中吸取力量。

第二条道路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是一条将会使希腊逐步走向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它将会使这个国家如果不是在形式上就是在实质上成为一党制的国家。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它的领导试图通过渗透和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分权将使这项工作比较不费力气),以及通过对上层决策中心(目前唯一鞭长莫及的是共和国的总统直辖机构)的中立化、清洗和最终加以控制,来巩固他们的地位。对关键的部门如内政部、司法部和国防部将进行重要的人事更换。不论是否实行地方分权,市和厅局一级的彻底的人事更换势在必行。换句话说,对上层和基层将采取相同的战略。同样地,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企业和合作社里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以及他们将要求工人和农民在管理企业和合作社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将是表明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渗透和控制达到什么程度的另一个重要迹象。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走向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于它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如果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朝着一党执政的方向行动,它必然会抛弃西方的社会民主政府的模式;也必然会遵循第三世界模式的路线,坚持独立和不结盟。根据防备土耳其这一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美国援助的不可靠性,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在希腊,美国的亲以色列又亲土耳其的立场同希腊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之水火不相容,新的领导将会合理地调整它的政策。它也将会反对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渗透并割断同大西洋联盟和共同市场的关系。民族主义将会使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并使它控制基层和国家机

器的努力合法化,直到使反对派默不作声。

有一系列力量显然将会抵制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上述努力。首先是希腊共产党。它对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城市、农村地区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和在农村、工人、学生中间发展力量的做法特别敏感。第二支力量是同前多数党——新民主党有联系的各色各样的社会知名人士。第三支力量是各种行政管理机构——政府文职人员、大学教授团、司法人员和高级军官,他们将反对清洗,他们的反应或者默许将清楚地表明这种清洗的企图的程度和范围。最后一支力量是共和国总统的直辖机构和亲信,目前他们还不受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控制,当1985年6月某日选出新总统<sup>①</sup>时,他们对于任何试图削弱或控制总统直辖机构的努力将会特别敏感。

然而,最重要的单独的可变力量是希腊共产党。如果它的力量更加壮大(有迹象表明这是可能的),它就会成为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试图建立一党政府而不同共产党结盟的强有力的约束因素。根据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民众主义政党(populist party)的性质来看,应当抱认真的态度看待它在中间等级、官僚机构甚至军方的帮助下,变为中间派或甚至变为建立专制制度的右派的前景。同样地,利用对外政策(亦即在国际争端中玩弄手段,主要是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可能为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导建立专制政权提供借口和使他们得到支持。最后,保守的反对派(新民主党)的立场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它仍然组织涣散,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就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强行建立一党制。

---

<sup>①</sup> 新总统已于1985年3月选出。原新民主党总统卡拉曼利斯下台,新当选的总统萨采塔基斯是一位以公正闻名的法官,得到帕潘德里欧的支持。——译者

## 二、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独裁的社会主义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明确地把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和政权(大部分在西欧)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加以区别,我始终牢记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希腊的社会主义运动究竟属于哪一方面?我还打算把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Authoritarian Socialism)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民众主义阶段,其主要目标是取得政权;巩固政权的阶段,主要是维护权力和新政权的合法性。

西方社会党(欧洲地中海地区除外)接受民主政治的原则:政党多元化、反对派的权利、个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承诺“轮流”执政——如果在野党在自由大选中获胜,就组织新政府。这些原则早在列宁主义出现和坚持第三国际二十一项条件的共产党形成以前,就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我认为,正是这种对民主的承诺,而不是他们所建议实行的经济与社会哲学和结构改革,是西方社会主义同其他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西方社会主义依然坚持民主和多元主义,并谋求通过公开辩论、说服和自由选举来实现他们的全部经济与社会纲领。

其他多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权,特别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权,则朝着独裁主义的方向行进。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独裁主义已表现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进行控制的三种形式(一党制、主张中央统制经济的官僚机构、军队)之一,同三者有不同形式的结合。

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按照西方的模式)还是独裁主义的(不论它表现为何种形式的独裁主义),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素养、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水平,以及它对世界经济相应的独立或依赖的程度。这些因素对于研究希腊和欧洲地中

海沿岸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政治素养 (political culture) 这个词用来表示人民对他们的政治制度、政府及其政策的态度和倾向的复杂性,也用来表明这个政治制度受到拥护的程度,政治结合和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政治制度中能起的作用。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尚未形成和合法化,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试图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他们往往不是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而是反对宪法。他们不接受现有的政治公式,而是提出新的政治公式。因此第三世界的所有社会党都采取一种固有的激进和革命的立场。

经济发展水平是任何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形成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机构和制度,没有这些机构和制度,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发展不起来的。这些机构和制度包括全国性政党、代议制议会、普选权、工会和公共教育。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结社自由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会,高度分化的工人阶级,发展中的白领阶层和领取薪资的中间等级,尤其是,相对的繁荣和福利立法大大缓和了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阶级冲突,而这种阶级冲突正是革命夺取政权所必需的。相反,西方社会主义普遍是进化的,是一个说服和政治选择的问题。

一般说来,独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独裁主义形式是产生在经济比较不发达的社会里。许多这样的国家至今还很落后。它们缺少工业化的资本,缺少采矿业、运输业、住房建筑业和生产基本的生产资料方面的投资。

一个国家经济独立或依赖的相对程度,是直接影响社会党据以行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趋向的一个因素。第三世界国家和南欧国家,由于经济上的依赖性 or 半殖民主义地位而有着程度不同的特点。有些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才进入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尽管这些国家有庞大的商业阶级并在某些工业部门有重大的发展，它们仍然依赖于西欧、美国（最近还有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它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生活资料，但有些生活资料特别是耐久消费品的生产则十分落后。尤其是它们在经济上负债累累，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本构成的现实前景。它们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迫切需要的是在国内寻求资金或向外国借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需要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以降低国内的消费和削减福利救济与福利事业。工业化的迫切需要要求通过压制工会的法律和发扬强调延缓消费和实现国家长远目标的思想。

在第三世界以及最近在南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它提出许多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对社会的看法。首先是社会公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设计一个没有冲突、和谐和健全的社会。他们从平均主义的伦理出发，反对地位、财富、资产和收入的差别，主张消除特权和少数人的统治。

第二个看法（与社会公平不无关系）是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在许多国家里，社会主义似乎是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必然结果。

第三个有力的看法是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主义将会提供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和鼓励因素。由于实行社会主义，新兴国家可以不用经历资本主义在西方所造成的社会动乱而实现现代化。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实质上主张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阶级冲突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是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过程，而不必采用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所采用的方法。由于实行社会主义，新兴国家将会使经济发展同本国的文化习俗和部落团结调和一致。

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分为两种形式或两个阶段，是由于调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和福利主义的思想意识同经济增长需要之间的矛

盾。这两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民众主义阶段，随后是巩固政权或维护政权的阶段。

民众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抗议运动，它联合各种不同的集团和阶级以实现全面和根本的目标。它可能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大约近三十年来，第三世界的多数民众主义运动（但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如伊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把社会主义同本国所继承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这些民众主义运动大多数（不是全部）利用党作为动员和取得政权的工具。不论它们贴的是什么标签，是民主的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们的结构、组织、成员和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

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众主义者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论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承认政治多元主义和反对派；后者则不承认。前者代表并促进市民社会及其一切组成部分，包括私人经济领域。后者则把这一切置于党或国家（往往是二者）的控制之下。从民众主义阶段（党在这个阶段起着主要作用）向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阶段（党在这个阶段成为辅助力量）的过渡是不明显的。单一的党同国家互相争夺支配权的竞争，可能要继续一个长时期。

### 三、希腊的政治力量

1981年10月18日，希腊举行议会选举。结果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取得压倒的胜利，获大约百分之六十的选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十二次议会选举，这个时期希腊经历了内战（1946—1949年）、军事独裁（1967—1974年）和从君主立宪制度（1946年9月1日）到共和国总统制（1974年12月9日）的转



变。

1944年解放以后，特别是1950年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希腊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显著地改变了城乡人口的比例。今天，受雇用的农民人数不到30%，而象雅典、萨洛尼卡、帕特雷这样的城市则发展迅速。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希腊人居住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希腊已成为比较繁荣的国家，1981年的人均收入已上升到每年4,000美元。就业人数增长很快，不过大多数是在第三产业部门——多亏旅游业及其有关服务行业的发展。

国内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开始对希腊政治产生影响。自从发动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在1974年垮台以后，这些变化更增加了势头。1981年的大选和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党自居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可以说是上述变化的顶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希腊政治历史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每个阶段的党派政治和选举政治都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从1944年12月雅典之战开始，实际上一直延伸到1961年。头几年几乎完全致力于破坏和解散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游击政府和民族解放军（二者都是共产党控制的）。这个时期希腊国王回国；外国（1947年以前是英国，以后是美国）进行赤裸裸的干涉。然而由于有美国的大量援助，经济建设进展很快。

根据杜鲁门主义、大西洋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激励政治领导人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是反共主义。它的最公然的表现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在学校、大学、政府机构、新闻机构、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强制推行民族主义和公民的正统观念。

在整个这段时期，政党林立而分散，时而结盟，时而分裂。例如在1950年，有十八个党参加竞选，占领舞台的还是那些老资格的

领导人——人民党的康斯坦丁·查尔达里斯，自由党的维尼泽洛斯，中间派政治领导人新联盟的尼科拉斯·布拉斯蒂拉斯，以及帕潘德里欧<sup>①</sup>（他领导的党被称为“帕潘德里欧党”，在选举中获14%的选票）。这四派共获大约79%的选票。如果要组成一个得到多数支持的政府，至少需要其中三派联合起来。在1951年的大选中，亚历山大·巴巴戈斯将军领导的右翼集团获得44%的选票，以布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集团获得23.5%。这两位将军在议会中占多数，但他们合不来。中间派集团获得略多于20%的选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左翼第一次参加竞选，但统一民主左翼只获得7%的选票。于是不得不在1952年举行新的大选。这一次，在美国大使坚持之下实行多数制。巴巴戈斯将军获胜。他获得49.2%的选票，在总共300个议席中占有240席。以布拉斯蒂拉斯和维尼泽洛斯为首的中间派获得34.22%的选票，统一民主左翼力量上升，获得大约10%。保守力量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并一直掌权到1956年。简单地说，第一个阶段是由军队、王室和保守的政界名人组成的小寡头政治集团，在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下进行统治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1956年的议会选举开始，妇女第一次参加投票。它的特点是改革政党制度，由两大党竞争统治权。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把右翼的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组成新的政党“全国激进联盟”，它在大选中赢得47.5%的选票，在300个议席中占有165席。另一方面，中间派和所有的左派力量联合组成“民主联盟”，它赢得48.2%的选票，但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他们在议会中只得到132个议席。卡拉曼利斯随后在1958年和1961年的大选中继续保持自己的力量和多数派地位。然而左派和中间派仍拥有

<sup>①</sup> 现任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的父亲，前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译者

大约半数的选民。

到1961年，政党似乎从分散状态走向联合。人们开始普遍反对五十年代的压制法律。反共主义已不再能够提供一个可以胜任的思想阵线。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开创了一个自由化的时期，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冷战已为不稳定的缓和所取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新的集团和新的行业开始极力要求进行国内改革和自由化。他们对君主的作用和王室的势力提出挑战，并提出其他争论点。

这个“开端”导致乔治·帕潘德里欧在1964年大选中以53%的得票率获胜。现在自由中间派能够管理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和控制军队。但它却同得到军人支持的君主政体相对立。1967年4月军人进行干预，建立了军人独裁政权，暂时中止了自由化的趋势。军人政府自1967年4月统治希腊直到1974年。它的垮台使国家恢复到以前的状况。流亡者回国了；公民自由权利恢复了；各种政治色彩的新闻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政治犯被释放了；各政党和政治领导人喜气洋洋地重返雅典。随着1974年军人政府的垮台，希腊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六十年代所碰到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它自1827年独立以来所碰到的问题：如何走向议会民主和使希腊的国家独立地位变为稳定的政治制度。

1974年以来，希腊举行了三次议会选举和一次关于国王复位问题的公民投票。在1974年10月和1977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中右集团和卡拉曼利斯的领导仍居于优势。同戴高乐十分相似，卡拉曼利斯要求并得到稳固的多数。他的新民主党（成立于1974年9月）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发展组织，并在军人政权倒台后不到十个星期就为大选作好了准备。其他政党也是如此。这个迹象表明，军人政权对现有的政治阶级并未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中间派联盟，由安德列亚斯·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新建立的全希腊社

会主义运动，甚至老的共产党派别，也都活跃起来。无党派人士和来自左的或右的极端分子寥寥无几，他们只获得不到3%的选票。只有四个政党参加全国竞选。

在1964年赢得多数的中间派联盟缺少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前领袖乔治·帕潘德里欧。

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如果团结一致，可望获得10%的忠实选民的支持。

以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左翼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它是安德列亚斯·帕潘德里欧在1974年9月初创立的。他无疑认识到对军人政权的反应会转向强烈的左倾和反美，并希望加以利用。他决意以新人出现，并许诺一夜之间实现社会主义。他精心地选择靶子——北约组织、亨利·基辛格、希腊军人、多国公司、驻希腊的美军，偶尔还有以色列。他第一次保证要割断同其保护者美国的一切联系，并避免同西欧和共同市场建立任何一体化的联系，以保障希腊的独立。他警惕地注视着塞浦路斯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希望这个岛屿不受北约组织的牵连和控制。他极力主张对希腊军队进行严厉的清洗和废除军人政府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但他往左走远了，主张对工业、卫生、教育甚至贸易采取广泛的社会化措施。他支持给予地区和市以行动的主动性和自由，男女平等，保障工作的权利，以及坚持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他的纲领包含有1972年由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精心制订的法国共同纲领的部分内容、西欧极左分子的纲领所提出的要求和瑞典福利法律的某些现实。它比共产党的建议还要左。后者马上指责帕潘德里欧冒险和不负责任。他们认为希腊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甚至连社会主义的前提也还没有具备。

1974年大选的结果也是一种温和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表现。希腊完全没有学习意大利、葡萄牙或甚至法国的样子。卡拉曼利斯

和他的新民主党在全国赢得大约 55% 的选票，在议会的 300 个议席中赢得 220 席。中间派联盟获得大约 20% 的选票，居第二位。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大约十年前它赢得差不多 53% 的绝对多数，这个第二位是够可怜的了。无疑 1964 年的中间派选民的过半数和相当一部分新选民都转向卡拉曼利斯的党，另一小部分则转向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当时人们对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还很陌生。它只获得 13.6% 的选票，居第三位，在议会中只获得 12 席，而中间派获得 60 席。帕潘德里欧在城市和工人中间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他的党吸引的乡村居民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落后地区的选民要多于发达地区的选民。共产党获得大约 10% 的选票，而且明显地是来自城市。在萨洛尼卡、雅典、比雷埃夫斯和其他城市，共产党的选票都超过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只是在乡村和落后地区的力量薄弱。他们在议会中只得到 8 个议席。

1977 年 11 月 20 日的大选实际上是左派和右派选民的重新排队。在同一领导之下的新民主党，只赢得未超过半数的多数票，比上一届下降 13%。事实上，该党的背叛者大约有一半转向极右翼的民族阵线（它是新民主党的合作者）。因此，该党的实际损失没有超过 6% 或 7%。如果把新民主党、民族阵线和中间派联盟的选票加起来，1977 年中右的力量约占 55%。在左翼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共产党选票的稳定（10% 左右）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后者从 13.6% 上升到 25.3%。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选票有许多直接来自中间派，可能有一部分直接来自新民主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党和其他左派的选票已从 1974 年的 25% 上升到大约 35%。

1977 年竞选的争论点同 1974 年基本上是相同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同共产党互相拒绝合作，但他们在关于土耳其和塞浦路斯问题上则重弹相同的有力的民族主义口号；双方都利用群众

对美国和北约组织的不满情绪，都强烈反对希腊加入共同市场。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帕潘德里欧继续喊得比共产党更左，主张结构改革和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化，而共产党还不愿意赞同。新民主党坚持原来的主张：繁荣、充分就业、民主、政治与社会的安定。

1980年选举新总统时，卡拉曼利斯是唯一候选人。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300名议员的三分之二的选票才能当选。如果达不到三分之二，必须在第二轮或第三轮的投票中至少获得180票才能当选。否则就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卡拉曼利斯在第三轮投票时获得183票。新民主党、民族阵线和一些中间派投了他的票。其他政党弃权。于是这位73岁高龄、最孚众望的领导人就任了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他保证做全体希腊人的总统并保持“超党派”。

#### 四、1981年大选——向左转

1974年至1981年之间，民主的实施情况要比希腊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得到保障。大选在没有发生互相指责对方弄虚作假的情况下举行，并就宪法的改革、选举制度、重要的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以及最重要的关于希腊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决定。议会制度进行顺利。第三次大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举行的。

长期以来有两大派势力是互相对立的，这就是主张西方化的一派和传统主义派。前者主张迅速现代化、改革和政治民主，而后者则坚持传统的民族的家长式统治，也就是近来的独裁主义。在左翼政党的心目中，现在西方同资本主义和多国公司有联系，并受美国经济与战略利益的支配。右翼集团已转变立场，越来越亲西

方，并表示依附于共同市场（在设法使希腊加入共同市场之后）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军队和教会（传统主义的两大支柱）以及中间等级则摇摆不定。经过几十年来屈从于西方（最近还有美国）的利益之后，中间等级第一次开始从希腊人的感情和特性出发来看待他们自己的利益。军队在受北约组织和美国控制了三十年之后，也开始在塞浦路斯被侵略和爱琴海受到土耳其威胁的面前，重新考虑他们自己在国家中的作用。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党的领袖帕潘德里欧本人是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回国以后采纳了传统主义者的许多主张，同时又主张最全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其中有许多主张是有意迎合中间等级的开明人士和新的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专家中的优秀人才。帕潘德里欧成了新民族主义的战士，他巧妙地把许多希腊人传统的忠诚同其他人的西方现代化观点融合在一起。他反对共同市场和北约组织的态度不仅对传统主义者（包括教会和军队中的许多人）有吸引力，而且对许多商人、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和帕潘德里欧一样在西方受教育，并急切想掌握他们的社会的命运）也有吸引力。它对左派也有吸引力。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抵抗运动的遗产。抵抗运动虽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得到人民（特别是在农村）的广泛支持。抵抗运动给人们留下了实现更为光明、美好与平等的世界（一个完全希腊人的世界）的回忆和梦想。同一切抵抗运动一样，它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运动。美梦依然存在，然而雅典之战以及后来的内战却把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的过火行为使它脱离了许多曾经积极参加运动的人。

很难确定抵抗运动的精神在1981年大选中的作用。但如同法国社会党在那一年取得胜利一样，这次希腊大选和希腊左派的

胜利，是过去提出的口号的反响。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竞选运动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左翼也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提出关于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包罗万象的保证，它表示要让人民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和实行地方分权。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反对现行的政权体制并向一切非特权阶层的希腊人发出呼吁。它许诺要把混进政府及其行政机构中的那些先前受到德国人庇护后来又受到外国保护的人清洗出去，以便永远结束“寡头统治”。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宣告实行独立的希腊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迫切性，并颂扬希腊的过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我们自己要当家作主”。

社会公平、民族独立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主题，使抵抗运动的梦想复活了。帕潘德里欧在大选前夕的演说中，保证他们这一代要实践抵抗运动的梦想，而不再重犯抵抗运动领导人四十年前所犯的错误。为什么中间等级团结在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周围，这至少可以部分地加以说明。

希腊的中间等级有两大特点：第一，他们没有能力来保障希腊的独立——他们接受并往往恳求外国的保护；第二，他们未能建立可行的民主制度，不论是象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的世袭君主制，还是象法国那样的总统制。中间等级一贯对自己的希腊人身份感到不安，他们不愿意成为希腊的一分子，他们没有根基，在欧洲等地到处漂泊。同样地，希腊中间等级的经济利益同欧洲工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成了后者的代理人。这就是买办资本主义。中间等级在危急关头总是转而采取右翼的反民主的解决办法。1944年希腊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和中间等级可能达成和解的一线希望也消失了。帕潘德里欧和他的社会主义运动经过大约四十年之后，能否使希腊的资产阶级回到国家的怀抱，请求和得到他们的参与和支持？这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摆在选民面前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独立。帕潘德里欧宣称，希腊内政外交完全独立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这种独立的要求表明同过去一刀两断。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次大选似乎是前所未有的维护希腊民族统一的机会。

纲领的第二部分是社会主义。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党，致力于经济的社会化。虽然该党没有详细阐明，但它显然设想把部分的贸易、工业和矿产资源实行国有化。这一计划在正常情况下会吓坏希腊中间等级和中间等级下层的许多人。然而就在希腊大选之前四个月，密特朗和他的社会党在1981年6月法国的选举中获胜，为帕潘德里欧的帆船吹来了一阵新鲜强劲的风。帕潘德里欧很快利用社会党在法国的胜利，把自己扮演成“密特朗式的社会党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将遵循西方社会主义的模式。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坚持民主，但有两项重要的改革。一是对国家机器实行地方分权，这又是一项为满足雅典地区以外的选民而有意采取的措施，一是民众直接选举政府。这两项措施等于实行直接自治，不仅在地方、市、州一级，而且在企业、工厂和各种公共权力机构。帕潘德里欧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目标是建立农民合作社，因此自治也可能推广到农村。

共产党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区别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希腊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事务方面似乎更加激进。它要求希腊立即坚决和完全地退出北约组织；要求美军撤离希腊，关闭所有的美军基地；要求希腊退出共同市场，使“希腊的国家利益不为帝国主义服务”。它要求拆除在希腊国土上的核武器，并赞同勃列日涅夫关于希苏签订在战争中不使用核武器条约的建议。在经济方面，希腊共产党似乎要比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温和些。它的纲领要求对公有和国营企业实行民主化，要求把社会化扩大到能源和一切进

口企业。此外，还包括地方分权、人民参与经济和行政管理，增加退休金、公共住宅和发展教育和义务教育。希共还要求实行不折不扣的比例代表制，改革宪法，以取消授予共和国总统特殊的和个人的权力。

新民主党提出“复兴”的纲领。该党自从深孚众望和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卡拉曼利斯当选共和国总统后，上层领导人之间齟齬不和。新民主党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贵人和老板们的政党。该党领导在执政的七年间，使希腊在欧洲保持最低的失业率，促进经济现代化（使希腊人均收入提高到与西班牙相同并高于意大利的水平）和使希腊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成员。美中不足的是，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高达22—23%，成为选民心目中最严重的问题。城市生活条件和服务越来越差，环境污染已成为地方性流行弊病。教育设施不足；行政机构臃肿，效率很低；尤其是贪污盛行。新民主党继续对其朋友和支持者施以恩惠，提供津贴。它在执政七年之后，没有解决的问题积压成堆，怨声载道。

1981年10月18日大选的结果是希腊左派取得空前的胜利。亲苏的希腊共产党获得10.9%的选票，欧洲共产主义的希腊共产党（国内派）获得1.4%的选票，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获得48%的选票。左派总共获得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同样空前的是中间派的衰落。在军人政变集团接管政权之前的1964年，中间派联盟在已故的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领导下曾获得53%的选票。1974年为20%。1977年下降到12%左右。到1981年，各中间派别总共的票数只有3.5%。

所谓的右派也遭到重大挫折。1974年新民主党获得54.37%的选票；1977年新民主党和另一个右翼集团“民族阵线”分别获得41.84%和6.82%，共为48.66%。在1981年大选中，新民主党（已同民族阵线合并）只获得36%的选票，丢了13%。

从1977年到1981年,从中右转向左翼的选票共达25%左右,事实上全都投给了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半数以上(至少有六十万票)来自新民主党和民族阵线。

1981年大选的选举制度同1974年和1977年一样。议会300个议席中的288席按全国人口分配在56个选区,其余12个议席(国家议员)按选民力量比例分配给获得17%以上选票的政党。1981年的唯一差别是允许各政党推出比分配给各选区议席数多一、二或三名的候选人。这个选举制度对大党有利。在上两届大选中,这个选举制度对新民主党有利;在1981年则对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有利,它得票48%,却有172名议员当选,占总议席的57.3%。希腊共产党因得票在17%以下,未能从12名国家议员的席位中分配到任何议席。它虽然获得超过10%的选票,但在议会中只占有5%的议席。如果按照彻底的比例代表制,议席的分配应当是这样的:新民主党108席,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44席,希腊共产党33席,中间派9席,希腊共产党(国内派)3席,其他党派3席。换言之,这将使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未能获得绝对多数的议席,而要被迫去寻求同共产党或中间派进行某种合作。

## 五、1981年是一次关键性选举 还是抗议性投票?

有些人会争论说,1981年的选举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因为它打破了1946年至1967年之间存在的政治支持与政治联盟的坚固的结合体,而产生了新的结合体。

现有的坚固的结合体是哪些部分组成的呢?首先是中间等级和传统主义势力(即农民、教会、军队和王室)的合作。他们内部和互相之间存在着冲突和摩擦。对左派的共同恐惧把这些集团拴在

一起，他们一般排除工人（左翼）和农民真正参与政治。解放以后存在的民主政治具有寡头政治集团的一切特点。

1974年以后可以容易地看出一些破坏稳定的力量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军人政权的原始作风和残忍野蛮，以及它在土耳其突然袭击塞浦路斯面前表现无能为力和麻木不仁，使军人的信誉扫地。军队同其他上层人物分离，从而打断了过去把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锁链。

第二个破坏稳定的力量是君主政体（这是另一个强有力的环节）的消失。还有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心理上和政治上的现象的根本变化，一句话，就是现代化。七十年代初期，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开始产生日益增强的影响，在一个人口九百万的国家，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五十万。他们构成了游民农民、游民无产者和游民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混杂集团，他们与城市居民有共同的想望，而没有城市生活的享受，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到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或成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同时仍保持农民的感情。

另一个强大的破坏稳定的力量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充分就业，它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住宿和满足许多人的需要，同时也激起了他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欲望。相对地说，需求与满足之间是能够保持平衡的。然而1974年以后，寡头政治集团越来越难以保持这个平衡。对卫生、教育、娱乐、闲暇、城市交通运输、住房以及退休金的要求和想望开始超出了可用的资金，或者更确切地说，超出了寡头政治集团愿意提供的资金。如果寡头政治集团能够团结的话，是对付得了这个挑战的。但是由于国王流亡在外，军队信誉扫地，许多政界上层人物，包括新民主党领导人在内，对军方不再抱有幻想，寡头政治集团已分崩离析。中间等级的背叛以及谋求政治上的自由组合，经济上的改良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改变，为新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基础。

1974年以后，政治的运用方法也开始改变了。政党数目减少但组织更为健全，他们开始谋求和争取众多的党员和拥护者。裙带关系已为集团的考虑所取代，任人唯亲已为任人唯贤所取代。在大学、警察、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的独裁主义与“拔尖子”的做法，越来越难于掩人耳目和逃避公众的批评。

最后，缓和切断了寡头政治集团所寄托的稳定的组合的另一个联络环节。它使反共主义成为过时，并使希腊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地位改观。随着反共主义的过时，在东方地平线上重新出现一个新的强烈和深刻的统一的主题，这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威胁引起了一切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并为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口号和选民的支持。公众对土耳其占领塞浦路斯的重要部分，以及对美国未能或不愿意强制实行一项可以被接受的解决办法，强烈地感到失望，民族主义很快就转变为反美主义乃至反欧主义。寡头政治集团的团结被摧毁了。从1974年到1981年，在希腊政治生活中，有着比1945年以来任何时候更多的运动和更差的秩序。

因此，可以认为，1981年的大选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它使过去支持寡头政治集团的大多数选民获得机会，转而效忠于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使其他选民中立化。更重要的是，它为新的集团提供了取得政权的机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只是未能得到城市工人的选票，这些选票都投给了希腊共产党。这种力量的重新组合使保守派陷于孤立，削弱了新民主党对一些铁杆保守派—君主政体拥护者和各式各样的右翼分子的支持，他们中间许多人对独裁主义的解决办法仍然依依不舍。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全国性的群众党，一个有高度纪律的党。党的思想（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通过国有化和国家干预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社会主义把大多数被剥夺社会基

本权利的下层集团联合起来，如果经济得到发展，它将会吸引工人。它还对中间等级的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阶层有吸引力。民族主义对他们也有吸引力。自然，它对大多数传统主义力量和军队也有吸引力。

希腊1981年的大选也可以说是一次抗议性的投票。选票的数字表明有大量选票从中右转到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方面。中间等级的一些选民被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与经济的思想和计划所吸引；另一些人则为它的民族主义的号召所吸引；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新民主党剥夺了他们的正常官职或者因为他们不喜欢新民主党的领导人而转向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地，从新民主党转向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选民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他们赞成对土耳其、美国和（特别是许多传统主义者）对欧洲采取更加明确的肯定国家的权力与独立的立场。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民众主义和独裁主义含义的民族主义，它吸引了许多过去支持军人政权的人们。军队中的许多下级军官和下级教士都抱有这种民族主义观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间派和右派的一些比较开明的集团——工程师、文职人员、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认为帕潘德里欧体现的是西方专家治国论的思想。希腊的专家治国论者转向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是希望能够参与最适合希腊需要的发展经济的社会管理工作。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纲领的第二个主要点是社会主义，它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对不同的集团有吸引力，他们中间有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穷人和边远地区的人们。然而社会主义也遭到许多投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票的人的反对。先前举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选民对该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并不认真对待。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竞选口号，意在吸引左派或使许多人不去投共产党的票。社会主义吸引了许多选民，

但又使许多人漠不关心、疑虑重重或十分反感。社会主义是一回事；而有各种人民参与和起作用的机构，以及国家机器实行地方分权的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文职人员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反对社会主义；农民对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工人可能不愿意因为管理他们自己的工厂而模糊了阶级界线；小资产阶级、个体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不理解社会主义。如果真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它将会使那些对社会主义前景从未认真看待的许多选民离开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大选之前摇摆不定而后来倾向于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若干集团——军队、下级教士、知识分子阶层和大学生，他们的成员和选民可能重新考虑投谁的票。

最后，是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阶层问题。这个新党的组织、结构、纪律和成员是产生于和取决于它的领袖。它同多数抗议性运动一样，是一个领袖党。削弱领袖的形象就是削弱党，也就是削弱团结各个组成部分和选民的象征。一旦帕潘德里欧出缺，没有理由认为现阶段这个党的结构和组织能够产生一个新的领导。

根据上述论点，1981年大选选票的转移不可能转化为政治力量稳定的重新组合。来自传统主义者和右翼分子的支持不可能持久。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自由改良主义者和受社会主义鼓舞的选民之间可能发生分裂。这种分裂可能在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发生，并且只有在经济问题加剧时才可能明显。而且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纲领中的民族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也可能出现不可调和。被它的民族主义纲领所吸引的力量和被它的民众主义的一揽子保证所吸引的力量之间的联盟可能四分五裂。同样有关的是那些投票支持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自由中间派之间也可能在对外政策方面发生冲突。对土耳其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政策和继续采取强烈的反大西洋或反欧洲的态度将会疏远许多人，经济困难和

加重中间等级的负担会疏远他们所有的人。如果农产品价格下跌，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上升，失业人数增加，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许多人会把这种衰落归咎于帕潘德里欧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很容易地看到农民和中间等级下层完全改变他们的投票和支持。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1981年大选中所聚合的政治力量之间是如此互相抵触和水火不相容，他们不大可能继续给予支持。如果按照现行选举制度举行议会选举的话，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如果它想取得胜利或组织政府，它就必须谋求共产党的合作，这种合作或者是在选举之前商妥互相投票和结盟的形式，或者是在议会中组织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因此，共产党在获得合法地位不过十年之后，就已经成为我们在评价未来发展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腊共产党在希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它同所有的共产党的共同特点就是唯第三国际（即莫斯科）之命是从。它在城市地区得到工人的支持。差不多同西欧各地的情况一样，希腊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起飞是随着希特勒的部队入侵俄国而开始的。它同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一样，在组织民族抵抗的斗争（1941—1944年）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控制着主要的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军），这支军队在1944年已控制了全国，1944年12月，民族解放军试图夺取政权，但由于英国军队来到雅典而受挫。希共领导的游击队在内战（1946—1949年）中作了孤注一掷的努力以求取得政权，他们表现了惊人的坚韧毅力、组织能力和冷酷无情，然而美国给予政府部队的大量援助使他们夺取政权的目標未能得逞。

抵抗运动和內战之后的第三次机会于1974年来到了。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并出人意外地赢得差不多10%的选票，还有大约2%的选票归于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一个从亲苏的希腊共产党分裂



出来的欧洲共产主义党。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党，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和反美的党，威胁着共产党在左翼中间地位的上升。毫无疑问，帕潘德里欧的意图也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承认希共是一支“民主力量”，一个“进步的因素”和真正的“改革的工具”。他们让共产党加入大有成功希望的事业。共产党一方面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保持距离（他们确实怀疑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袖的革命证书），一方面又希望从左翼的表面团结中得到好处。他们对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自称单独代表左翼提出质问，坚持只有两个“兄弟党”的合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民主，并实现改革。他们答应给予支持与合作，甚至暗示要参加政府。

希腊共产党在1982年10月（议会选举一年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sup>①</sup>。它在希腊政治史上第一次成为一支有份量的选举力量。如果它能赢得20%的选票，它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友好关系将会发生根本变化。目前，根据1982年12月召开的希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希共将在基层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合作，以消除其追随者的反共偏见。它将力求吸引所有那些对政府不满并主张实行真正改革的人，同时指责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履行它在竞选时提出的关于内政外交的保证。总之，共产党的战略是维护和提高其合法地位，加强组织和发展党员，在地方政府中无孔不入，以等待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削

---

<sup>①</sup> 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全希社运在雅典等大城市损失7%到9%的选票。在第一轮投票时，全希社运在21个城市获胜，共产党10个，新民主党39个，左翼阵线65个；在第二轮投票时，左翼阵线赢得142个（大部分为全希社运），全希社运单独赢得15个，共产党28个，新民主党17个。全希社运由于得到希共的支持与合作，才取得优势。

弱或其领导人步履维艰。“善于等待的人，将得到最大的收获。”

## 六、当前的趋势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执政两年后的政绩可以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些答案：按照西方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或者说，它是不是在走向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它的民众主义阶段是否即将由巩固政权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阶段取而代之？我们在评价政府的政绩和当前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时，至少有以下三个基本考虑：（一）政府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是否尊重多元主义或正在走向独裁主义？（二）党和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三）全希腊社会主义选举的民众主义阶段是否同以往一样牢固，或者是它已有脱离这个阶段，朝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

国内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使得政府很难履行就北约组织问题所作出的保证（即退出北约组织和撤除美国基地），或者就继续参加北约组织的条件和保持美国基地的条件进行真诚的谈判。理由很简单：如果政府签署同意保留基地的协定，它将会失去许多左翼的战士并遭到希共的挑战。如果政府退出北约组织和撤销同意保留基地的协定，它将会失去美国甚至共同市场的经济与政治支持，没有这些支持，它的经济就无法维持下去。它也将失去温和派选民的支持。

经过漫长的谈判，一个同意维持美国在希腊的基地的新的五年协定终于在1983年7月签订了。帕潘德里欧把这个协定看作是结束了希腊的依赖关系，声称如希腊政府提出要求，这些基地在协定的期限内可予撤除。协定签署之后，他在向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称该协定是“撤除在希腊的美国基地的历

史性协定”。它标志着希腊独立的开始。他重申希腊将奉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他企图以这种态度来讨好要求立即撤除这些基地的左派和共产党人，又讨好赞成维持这些基地的中间派和温和派的追随者。但他显然未能如愿以偿。前者认为这个新协定是过去的政策的继续，是公然违反帕潘德里欧在竞选时所作的保证；后者则认为帕潘德里欧关于结束依赖关系的话言之过早，容易引起误解。

这种矛盾还可能继续下去。任何关于北约组织和基地的决定，将会破坏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团结，把前者推向共产党，而把后者推向新民主党。另一方面，如果不作出坚决的决定，就会逐渐损害来自左的和中右方面的支持。

政府对外政策的成绩明显地是摇摆不定的。在内政纲领方面也显示同样的矛盾。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没有进行多少重大的结构改革。没有实行新的国有化。道理很简单，因为能源、运输、电讯、银行和航空等大企业已属于公有成分，由国家机构经营。希腊的大多数私营工业企业是小型的，私人投资微不足道。在农业方面，发展农民合作社是为了减少中间商的利润和压低物价。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航运业——继续逃避政府的管制，因为多数希腊人拥有的船舶是在国外注册的。总的说来，改革仍然是党的格言。但它没有做多少事情来缓解希腊的主要困难。污染仍很严重（特别是在雅典），通货膨胀率似乎下跌了2%至3%，现在平均为20%；失业率已上升到10%左右；投资减少了，贸易逆差继续增长。如果没有共同市场的大笔贷款和津贴，没有旅游业，希腊的经济状况将更加困难。政府正开始重新考虑它的政策，学习密特朗的榜样，赞成采取紧缩措施和提高生产率。

总之，可以从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加强政治控制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的轮廓。党已经渗入而且有时取代了决策机构，

党的领导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建立统一的进行政治控制的机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是强大的和组织健全的，它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实践进行活动，不允许党内成立派别或持不同意见。它在农村和青年中间特别活跃，现拥有十七万以上的党员。尽管如此，党内和政府人员（包括部长）之间仍有摩擦。政府和党的各自的作用是界限不清的。前者应该作出决定并贯彻执行，后者应该动员群众的支持和制定方针政策供选民选择。然而有迹象表明，党和领袖继续凌驾于和控制着国家和政府部门。领袖加强了对党内的控制。州和地方单位的任命需要得到他的批准。只要稍有不同的意见，他就可以随意予以撤职。党代表大会的辩论都是事先组织好的，除了领导上强加的一种倾向外，没有任何别的倾向。上层有斗争，也有私人派系和小集团，有些矛头是指向帕潘德里欧的。但迄今还没有发生过足以影响广大党员的严重的派系冲突。党凌驾于议员之上，议员要遵循党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和领袖的指示。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战斗性不如希腊共产党，\*纪律也不如后者严格。但它的党员人数较多，且有政府对党员和地方代表的偏袒，使它成为强大的群众运动。

民众主义的巧言令色使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1981年赢得大选的胜利。但这些华丽辞藻同号召投资从而在国外大量举债、在国内实行紧缩计划（包括冻结公共开支、物价和工资）的稳定的经济政策和维护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帕潘德里欧可能不得不对许多要求置之不理，并坚持紧缩政策，同时向国际货币市场寻求贷款。他可能不得不把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华丽辞藻置于从属地位，甚至超脱他自己的党，而寻找其他方法来建立他的领导和使他的超凡魅力一成不变。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个人的政府。他个人的办公室（总理的小内阁）的建立，法律授予他有

权按照他喜欢的次序把他的候选人列在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名单上,以及该党议员在议会中作用的减弱(他们在准备和制定法律方面已逐渐失去一切主动性),这一切都是走向个人政府的重大步骤。

地方选举的结果更加强了主张中央政府统制经济者的诱惑力。选举结果表明,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选民和大概相当一部分党员倾向于共产党,另一些人则可能转向中间派或新民主党。如果现代化要畅行无阻的话,对于继续吵着希望得到满足的要求(他们得到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就必须加以控制和制止。一个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党对共产党采取敌对的态度决不会是第一次,帕潘德里欧也决不会是采取这一行动的最后一个人。

选民对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已减弱。中间等级也在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前面提到的自由改革使许多人感到满意。然而,其他人则对高税收、德拉克玛(希腊货币单位)贬值、缺乏充分的投资机会、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享有优先权、未能治理一些最恶性的污染、未能解决城市运输(特别是在雅典)以及希腊对外政策与防务方面的摇摆不定,表示大失所望。

农民继续支持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共同市场的津贴中得到好处,而他们把这归功于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他们是否继续给予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今后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也决定于农民合作社涉及的范围和具体政策。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微小干预都将会挑起不利的反应。另一方面,工人似乎都追随希腊共产党。政府试图通过一些立法措施干预工会和限制罢工的权利,必将加剧工人的抗议和反对。政府的紧缩措施也是如此。

但归根到底,农民或工人都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起关键作用的是庞大而混杂的中间等级的下层。这个阶层包括学校教师、神

职人员、下层文职人员、小店主和人数众多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特别是旅游业从业人员。他们从政府早期通过的福利措施中得到好处，可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又使他们得到的一些好处化为乌有，而失业使这个阶层的许多人遭到损害。这是一个特别变化无常的阶层，其中许多人是过去三十年来从农村迁到城市来的。他们失去了原来的根基而未能扎下新的根基。他们的第二代有许多人上了大学。正是这个庞大的阶层对民众主义的口号特别敏感。他们不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等级的下层与中间等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是在社会上和思想上同工人农民比较接近。对现政府的敌视把他们联结在一起，而职业和地位的不稳定又使他们容易接受极端主义的解决办法。表面看来，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得到他们的支持，但这种情况已越来越有局限性和不稳定。

## 七、结 束 语

我们在本书开头时提出的问题：希腊将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至今还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

我们缺乏适当的历史观点来对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和思想传统作出判断，因为它刚刚满十岁。但是某些特点还是很清楚的：

一、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继续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党。

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自称为阶级的政党，而自称超越阶级、面向全体非特权阶层的希腊人。它把“当局”同“人民”严格区分开来。

三、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缔造者在塑造这个党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一个领袖党。

四、它向人民提出的许多保证，总的要点就是改革：对经济和

社会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对福利措施基本上重新分配，对希腊的外交政策进行重大改变。

五、关于人民参加政府的问题，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对人民作出彻底的保证。它许诺实行地方分权和通过人民委员会使人民直接参加政府。

六、民众主义同反对北约组织、土耳其和共同市场的民族主义的主题相结合。民族主义和有关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主题在希腊往往具有强大的动员群众的效果。它也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平均主义和反对当局的民众主义口号一样，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意识形态。

同第三世界的社会党对比来看，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它的领导人的声明许诺实行政治多元主义，似乎仍停留在西方社会主义传统的范围以内。

如果说社会主义在希腊是新事物，那么独裁主义则是希腊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军人独裁政权上台又下台了。但希腊还没有经历过建立在一党制基础上的独裁主义政权，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似乎是能够为维持这样一个独裁主义的政府提供组织和支持的唯一群众性政党。

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其吸引力依然是很大的。我们注意到，党的控制和领导人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许多趋向表明，独裁主义最有可能是他们要走的路。至于它究竟是采取一党制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是二者结合的形式，现在还很难说。这两种模式的独裁主义社会主义（党或国家）最终的选择将取决于它们发展的具体政治环境。最重要的将是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超凡魅力和深得人心，经济状况，共产党的力量和策略，以及最难预料的东南地中海的国际形势。

我们应当清楚地注意到，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取得胜利，主要应当归功于一个压倒一切的统一的主题，即民族主义。希腊人不必到地图上去寻找他们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就能将他们团结在党和领导人的周围而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它将会得到希腊共产党全力的爱国主义支持，使中间等级回头，并使新民主党中立化或瓦解。它将会稳定武装部队中可能存在的任何摇摆，并且得到教会的祝福。